

## 目 录

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纪实 .....	陈培烈 (1)
根治海河十四春 .....	董一林 王克非 (33)
我所知道的道清铁路 .....	张冲霄 (50)
应尚才与粤汉路 4—8—4 型机车 .....	应建之 (73)
回忆南口战役 .....	刘翼飞 (79)
河南战役 .....	刘翼飞 (90)
滦东战役逸事 .....	林宪祖等 (104)
蒋桂战争中的冯玉祥 .....	黄建平 (115)
天津羊圈业始末 .....	穆静芬 (122)
敌伪时期天津的屠宰场 .....	刘家才 (128)
天津牛奶业发展述略 .....	李若愚 曹梅村 (134)
天津的牲畜集市交易一瞥 .....	王受朋 (139)
天津基督教联合会概述 .....	霍培修 (143)
回忆天津的联青社 .....	杨肖彭 (158)

质疑·订正·补充

对《原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部分

史实订正·····徐宗尧(169)

关于天津出大殡的陋习·····迟 叟(179)

·以史鉴今·

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经营管理·····乔维熊(181)

·小资料·

金溪河大桥修复记·····新 宣(49)

津门名刹大悲寺·····冯桓璜(157)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46——50辑总目录·····(192)

# 引滦入津工程建设纪实

陈 培 烈

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从此滔滔的滦河水源源流入津门，天津有了一个可靠的水源，天津人民喝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峡谷影蜿蜒，潜形阅古今，何不夹风云，与世作甘霖。”这是元朝诗人高顺贞的《吟滦河》诗，寄托了滦河水为民造福的遐思。700年后，前人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引滦入津工程从查勘北线到建成通水，作者有幸恭逢其盛，爰作纪实，以飨读者。

## 英明的决策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春旱秋涝，境内河流众多，海河流域各大支流均在天津附近汇流后入渤海。水同天津的衰盛祸福息息相关。

建国初期，天津治水以御洪为主要目标。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战国至今，天津洪灾有五百多次。现在四面钟、劝业场一带墙壁上还嵌有1939年天津被淹时的水位标志，当时和平路上可以行船。1954年8月下旬，解放后第一次特大洪水向天

津袭来，洪水量远远超过了1939年，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奋力抗洪，保住了天津没有被淹。这次防洪，反映出天津周围主要河道上的堤防不够坚固，防洪能力差。据此，市人民政府制定了3年规划，主要是加高，培厚各河堤防，加固海河堤岸，加强市内雨后积水的排除工作。1956年，又一次大洪水袭来天津，除了金钟河下游比较紧张外，其余各河安度汛期。1958年，我市在海河口修建了海河闸，并在海河两岸开挖了两条排污河，实现了“咸淡分家”和“清浊分流”，这是解决我市用水的一项治标措施。

1963年，华北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洪水，250多亿立方米洪水，从大清、子牙河系涌来天津，情况非常危急。天津人民凭借牢固的河防工程并采取有效的分洪措施，经过40多天的英勇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津浦、京山铁路和天津市区的安。但通过这场洪水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防洪标准仍然偏低。毛泽东主席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从此，天津治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根治海河的规划中，天津治水的方针，由防洪为主，转变为“蓄泄并重”了。

海河是潮汐河道，在解放初期，天津用水基本上靠上游来水。由于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用水都有限，所以依靠各河的基流便可以解决问题。解放后，人民政府修建了官厅水库，岳城水库及人民胜利渠引黄济卫工程。遇到干旱年份，可以从水库送水给天津。后来又修建了库容量达40多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天津用水更有保障了。但是，在天津就地蓄水问题一直未解决。实践证明，一味依赖上游水库是靠不住的，从岳城水库、官厅水库向天津送水，路途较长，远水难解近渴。从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到南运河上游卫河向天津送水，因黄河水含

泥沙较多，引水渠很快被淤，沿途农田托碱，问题亦不少。

随着岁月的推移，天津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业生产不断发展。城市用水量相应增大，而上游地区为发展农田灌溉修建了许多大、中、小型水库，各河下泄的水量不断减少。如密云水库建成后，因上游小水库建得很多，来水减少，每年蓄水量一般只有20亿立方米左右，分配给天津的水量不过6亿立方米。遇丰水年，天津在汛后可以利用河道基流维持几个月，但到平水年则在11、12月即要引用密云水库的水了，在干旱年份更要提前引用。

天津的用水矛盾突出了，因此，在根治海河的规划中，把蓄水提到了和防洪同等的地位，这是治水方针的一大转变。

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连年干旱，各河汛期来水很少，有几年汛期，即使雨后，河道也没有出现洪峰，北大港水库蓄不上什么水。天津用水除了大量抽用地下水外，唯一依靠是密云水库，用水极为困难。长期抗旱节水成为八十年代头等大事，也成为影响天津这个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大问题。

在用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压缩工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停止粮田用水。但由于存蓄在海河水里的水受海水倒流的影响，变成了咸水，所以每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天津人要喝咸水。1980年汛期后，严重缺水的前景再次重现。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为解决缺水的问题而多方筹思对策。市水利局长刘浩、市公用局长刘肖岩，鉴于滦河的潘家口水库已拦洪蓄水，引滦南线工程虽已开始兴建，但进度很慢，为济天津之急，提出了修建临时引滦入津工程的设想。市水利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郭振范，制订了经遵化县引水入蓟县于桥水库，利用“引于入津”的临时工程使滦河水流入市区的方案。市长胡启立、副市长吴振听

了汇报后，即于10月11日亲赴现场查看。经过研究，认为引滦入于桥水库的临时工程，投资较多，工程量大，且又时届冬令，到来年春季用水，施工期只有3、4个月的时间，难以完成，因此放弃了临时引滦的考虑，决定当年冬天引黄河水济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但经过此次查看，不少人觉得引滦入津改走拟议中的临时引水线路好处很多。当时我建议作进一步的勘测工作，以提出比较方案。以后市建委的陈新秀、吴同文同志写信给市领导，建议改变引滦入津原来确定的路线，主张走遵化、蓟县、宝坻的路线。

1981年4月8日，吴振副市长在研究天津用水问题的会议上，指示市建委抓紧研究一下引滦入津改变走向的方案。市建委副主任王葆珍，立即组织有关单位的技术负责同志于4月14日至17日到当时正在施工的引滦工地、邱庄水库视察，并查勘了引滦到遵化境内的黎河穿越分水岭地段。在与引滦南线施工单位负责人座谈后，了解了工程进展情况及今后的安排。24日又组织现场查勘的技术人员座谈，并由我主笔撰写了《关于引滦工程及沿线路现场查勘情况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引滦南线工程进展情况，并依据施工单位安排，估计最早能在1985年完成。接着介绍了查勘引滦改走拟议中的北线地段的情况，并对两条线路的优劣进行了比较，

(1) 从取水保证率及水质要求看，引滦入津走原定路线(以下简称南线)，我市收到的滦河水，其水质、水量均无可靠保证。因为河北省内的引滦水道沿线已有35万亩水稻灌区，还乡河两岸还有100多万亩低洼地待水种稻。因此灌溉季节，处于引水末端的天津市有收不到水的危险。另外，新唐山工业区的城市污水未及处理，直接排入还乡河，引来的滦河水将被严重污

染，水质恶劣。改走遵化、蓟县一线（以下简称北线），则收水率高，水质有保证。

（2）从投资方面看，引滦南线是一次性投资，全部工程建成后，才能发挥引水到天津的效益，改走北线，则可全面规划，分期投资、分期实施。第一期工程打通穿越分水岭的隧洞，滦河水即可居高临下，通过隧洞进入黎河，流注于桥水库，再沿已有的引于入津的临时线路，流到天津市内，早引水，早受益。

报告最后建议马上动手赶做北线方案的扩大初步设计，与南线作技术经济比较，报请中央、国务院、水利部审核，并提出开凿隧洞投资估计2亿元，两年时间可以完成通水。

1981年4月29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召集市长办公会，副市长李瑞环等6位领导参加，听取了市建委的上述汇报。5月8日，市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同意引滦入津改走北线的建议。李瑞环同志携带建委的报告，连夜去北京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天津用水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藩、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水利部长钱正英、副部长冯寅、交通部长彭德清、财政部副部长武博山、河北省副省长张克让、水利厅厅长张子明、唐山行署专员张一萍。出席会议的天津市负责同志有黄志刚、胡启立、阎达开、吴振、郭春原，李瑞环、王光英、刘晋峰等。会议决定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1）对天津城市用水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天津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天津城市的用水问题直接关系到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能不能充分发挥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也关系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大局。

(2) 对华北水资源的方针。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突出地反映了华北水资源的不足。我国七大江河的年径流，总量约为二万多亿立方米，其中海河与滦河流域只有二百八十多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年水量为321立方米，农田亩用水量为188立方米，都是全国最低的。根据华北水资源的现实情况，必须采取以下方针：第一，要认识到水资源对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工农业计划及城市发展计划，必须考虑水源的可能性。第二，城市要坚持节水方针，大力节约工业用水，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用水的水平，不能以牺牲生活用水来发展工业。第三，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首先确保城市人民生活 and 工业用水，对农业只能兼顾。如遇严重枯水年份，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要首先保北京用水。潘家口水库要首先保天津和唐山两市用水。第四，要根据水源情况，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用水少、产值高、商品率高的农作物，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民尽快富起来。

(3) 滦河水量的分配及引水线路。在潘家口水库可分配水量为19.5亿立方米的条件下，分配给天津城市用水全年毛水量10亿立方米。从潘家口水库到天津的输水，要保质保量，花最少代价得最大效益。天津提出的改走北线方案，有其优点，由水利部帮助天津立即动手，做北线的勘测设计工作，尽快拿出比较方案，经水利部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后，再行实施。

1981年6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的会议纪要》，确立了引滦入津北线工程的英明决策。

### 快节奏准备

引滦入津工程开始准备就是按照快节奏进行的。在万里副



总理召开天津用水会议的第二天上午（即5月16日），水利部长钱正英会同吴振副市长就在天津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召集有关单位研究准备工作。考虑到这项工程是引水、输水、蓄水、净水、配水等项目组成的大系统工程，必须在已经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综合规划。同时，认为穿越滦河与海河两流域间分水岭的隧洞工程，将是整个工程的咽喉，制约着工程的工期，必须立即进行隧洞沿线地带的勘测工作。为此决定由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帮助天津市做勘测工作。要求该院迅抽调队伍、设备，从6月底开始，进入迁西、遵化县境内，进行地质勘察、测绘及地形测量等工作。天津市政府立即组建引滦筹备机构，要求在一个月内提出设计任务书。

1981年5月22日，市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以王葆珍同志为组长的天津市引滦工程筹备组，抽调公用局副局长关学中、水利局副局长张永平及邹继伟、陈培烈等20人组建办公室，立即在解放北路市政府第四招待所开展工作。

为了使引滦全线的勘测工作同步进行，又动员了天津市所有勘测单位，集中力量进行工作。全体勘测人员破除了“三伏天不上山，三九天不打钻”的惯例，艰苦奋战，先后共完成地质测绘232平方公里；钻孔815个，总进尺16093米；取试样6778个；标贯试验2977次；断层带测井100米；做土、岩试验7583个；作坑槽探996立方米；物探纵横断面39条24000米；完成平面控制测量达591.3平方公里，纵横断面测量592公里；水准测量743.9公里，地形图测量101.5平方公里，满足了规划设计的需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样大量的勘测工作，在我市是没有先例的。

在引滦工程筹备组工作的工程师有：王作鸣、万么俊、

杨世斗、李方平、陈新秀、颜廷俊等。他们一方面搜集地质、测量、资料和图纸，同时进一步对重要问题作深入调查。以前也曾提出过引滦入津走北线的方案，但因开凿分水岭隧洞的工程难度大。另外，据称在黎河有一处喀斯特大溶洞，形成一个大漏斗，滦河水引入黎河将会漏走，达不到引水入津的目的。筹备组认为弄清黎河大漏斗问题至关重要，于是商请市水利设计院派出以胡济民工程师为首的调查组，沿黎河进行实地踏勘。他们搜集了黎河两岸所有水井的水位变化情况，比较之下，发现沿河的水井水位上涨时都上涨，下降时都下降，这一现象充分说明黎河不存在大漏斗的问题，从而坚定了走北线的信心。还有隧洞地段的地质能否成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隧洞地段几乎全都是片麻岩，岩性复杂。根据钻探资料，隧洞洞身绝大部分都在弱风化及微风化岩层内，成洞条件较好，但要穿过近50米长的断层破碎带，虽比较困难，也不影响成洞。

从于桥水库引水到天津的线路，以前修建的临时工程是借用农田用水渠道。今后长期向城市引水，就应考虑城市用水专用渠道。经宝坻县副县长刘志礼与筹备组的陈新秀多次实地踏勘，提出了从蓟运河上的九王庄开始，挖专用引滦输水明渠，把滦河水引到北郊区的新引河，再倒入北运河，经屈家店闸，流向海河。

引滦入津线路全长五百余里，沿途将建设许多输水建筑物，安装大量机器设备，万一发生故障，如何保证市区用水是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为此考虑了在近郊新建一座中型水库，平常蓄贮一定水量（以能供天津城市一个月的用水为度）。在 upstream 输水发生故障时，可以有比较从容的检修时间，而不至于市内用水出问题。

天津郊区农田因历年来灌溉水源不足，多引用城市排出的污水灌溉，引滦输水明渠沿线许多地段，以往大量引用北京排出的污水灌溉，因而土地污染严重。为保证滦河水不受污染，应在近郊用地下密封渠道送水到市区自来水厂。

关于引滦的时间，也进行了研究。对天津来说，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比粮食、电力等更重要。引来的滦河水一定要充分发挥效益，不能浪费。考虑到雨季海河上游可能来一些水，因此，雨季少引或不引滦河水，以丰补枯，在旱季可以多用一些。另外冬季引水沿途损失太大，也不宜引水。是以全年引水时间定为7个月，引水建筑物的规模，按此考虑。

以上与引水有关的几个问题经研究并有结论后，筹备组立即组织市水利勘测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天津设计院开展规划工作。从潘家口水库到于桥水库一段，由市政天津院承担。筹备组综合两院规划的意见，经过组织会审，撰写了设计任务书，其主要内容是：

(1) 引滦入津近期内要实现的目标是尽快把潘家口水库的水引来天津。近期要求完成的工程包括：穿越分水岭的引滦入黎工程；整治黎河；改善引于临线工程。

(2) 从长远看，城市水厂的水源采用暗管输水是有效措施。修建暗管可分期分段进行，实现由明渠输水过渡到管渠结合的输水方式。

(3) 提出了第一期三个项目工程，即引滦入津隧洞工程，黎河整治工程及改善引于临线工程。并确定于桥水库以上的输水建筑物为二等二级，次要建筑物为二等三级。输水渠道上的建筑物为二等二级，次要的为二等三级，临时性的为四级。为确保天津供水，全线工程抗震设计烈度均按8度考虑。

1981年7月11日，天津市建设委员会提出了“引滦入津北线工程设计任务书”。8月1日，水利部批复后并提出以下意见：

1. 设计中应研究总体规划，包括最终规模、工程措施、投资估算等，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近期工程的设计工作。

2. 同意引滦入黎两条线路的比较。

3. 于桥水库运用条件将有改变，其增加的工程措施应作为引滦北线设计的组成部分。

4. 要求抓紧进行工作，于年底前提出初步设计。

所以，引滦北线工程必须快节奏地开展设计工作。为达到两年内引滦入津的目标，估计总的设计周期不到一年，而提出初步设计的时间最多不过5个月左右。

1981年8月11日至1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京津用水紧急会议。根据当时京津出现的水源危机，提出了三项措施：

1. 大力压缩用水和厉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

2. 引黄济津。

3. 全面加快引滦工程建设。要求北线做好地质勘探工作，要精心设计。

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引滦入津北线工程建设的指示，力争尽快把滦河水引入天津，于9月4日给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写报告，请求将引滦入津工程交由天津全权负责。9月12日，万里副总理在北京向天津市负责同志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同意引滦入津北线工程全部权力和责任交给天津负责的决定。9月25日，国务院发来了正式批复，内容为：

1. 为加快引滦入津工程的建设步伐,早日解决天津市用水问题,国务院同意此项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等由天津市负责审定,并组织实施。

2. 引滦入津工程所需投资由天津市解决,所需材料亦由天津市调剂安排,不足部分报国家计委解决。

3. 建设中要努力做到按科学办事,认真做好勘测设计,保证工程质量,在此前提下力争加快建设速度。要注意勤俭节约,努力降低工程费用。

国务院的批复与授权,使引滦入津工程从可行性研究、规划阶段进入了实际行动阶段。中共天津市委于9月27日发出通知,建立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由李瑞环副市长任指挥,市建委副主任王葆珍为常务副指挥,王中兴、朱森荣、钟炳辉、杨毅、汲乃英,关学中,张永平、谭丁迅、郭英奇、许有二为专职副指挥。副市长刘晋峰、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吴志远、某军副军长王嘉祥、建委副主任徐天祥、计委副主任卢金发、经委副主任姜其宪、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院长冯闻智、蓟县县长王树亮等兼任副指挥。引滦入津工程在这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指挥下,快节奏地进行设计及施工准备工作。

## 冲破常规

基本建设有法定程序,必须遵守。过去那种不顾一切地蛮干、打乱仗的做法,已经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应当坚决摒弃。但是引滦入津是火烧眉毛的事,一切行动的节奏越快越好。如果机械地按照法定程序去做,那就意味着设计、施工要按常规办理,快三步跳不起来。

引滦入津工程分19个部分:

1. 分水枢纽工程 设有两座分水闸, 设计流量分别为80立方米/每秒及60立方米/每秒。

2. 隧洞及其上下游连接工程 隧洞总长为12394米, 其中洞挖部分长9666米。开挖施工斜井17条, 总长2038米。

3. 黎河整治57.6公里。

4. 于桥水库大坝加高1.2米, 灌浆长1430米。

5. 州河整治11.2公里。

6. 开挖专用输水明渠64.2公里, 设计流量为50立方米/每秒。

7. 修建钢筋混凝土倒虹吸工程12座, 总长2781米。

8. 建提升泵站3座, 设计流量50立方米/每秒。

9. 建水闸5座。

10. 建桥梁43座。

11. 农田水利修复改造工程102项。

12. 新建库容量5000万立方米调蓄水库一座。

13. 尔王庄泵站至市内宜兴埠泵站的钢筋混凝土输水暗渠25.97公里, 设计流量19.1立方米/每秒。

14. 宜兴埠加压泵站及输水钢管10.67公里, 设计流量12.73立方米/每秒。

15. 新开河水厂工程, 第一期产水能力每日50万吨。

16. 建35千伏变电站6座, 总容量为56800千伏; 110千伏变电站2座, 总容量为94500千伏; 220千伏变电站一座, 装120000千伏变压器一台。架设220千伏线路15公里, 110千伏线路32公里, 25千伏线路98公里。

17. 通讯工程干支线437公里。

18. 水文及水质监测设施。

19. 引滦入塘沽的管道及泵站。

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设计任务，据当时中国市政工程天津设计院的几位负责人估计，仅就于桥水库以下的输水工程而言，不包括农田水利修复工程，抽调200人来设计，周期至少两年，也就是说要到1984年才能施工，更不用说通水了。怎么办？实践证明，只有冲破常规，才能赢得时间。

第一，冲破基建单位向设计单位委托设计的常规，变为向设计单位抽调配套的人员到引滦工程指挥部来集中搞设计，一切听从指挥部的安排。在水利部、城建总局的支持下，向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中国市政工程天津设计院、成都设计院、兰州设计院、长春给排水设计院及天津水利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共抽调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全线土建设计任务。电力、电讯工程交由天津市有关业务单位承担设计。农田水利配套工程交由有关县水利局承担设计。天津市自来水公司也承担部分设计。

第二，冲破三段设计常规，改作二段设计，要求初步设计做得细一些，全线工程的具体位置、规模都在初步设计中定下来，并且由设计人员到现场落实工程地点，不再变动。为了使全线工程协调配套，指定天津水利设计院为负责从潘家口水库到于桥水库全线工程的技术总负责单位；市政工程天津院负责于桥水库以下全线工程的技术协调工作。

第三，冲破设计单位坐等设计资料的常规，改成设计人员走出去，到勘测单位、到有关县水利单位去索要资料，勘测单位取到多少资料就拿来用多少，陆续取用，不等整个勘测报告出来再动手设计。

第四，冲破多单位分头审查设计的常规，改成有关审查单位集中在指挥部共同审查，有问题在会上一次解决，由市建委发文批准。重大问题，如引水隧洞的线路、于桥水库以下的引水线路则由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会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审定，免去了用公文申报的办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冲破常规的措施，从而赢得了时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引滦入津工程与通水有关的113项设计任务，不仅及时为施工单位提供了图纸，而且使这一工程赢得了国家质量金奖。

组织引滦入津工程的施工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天津市委制定了十六字施工方针，即“齐头并进，突出重点，洞成水通，逐步完善”。工程实施的指导思想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越快越好，尽快把滦河水引入天津。

充分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决定着工程的进度。施工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征用土地、组织施工队伍、准备工程用料及设备。

国家兴建基本建设需要的永久性工程用地及临时性施工用地，已有法令可循。但是在执行中常常发生因对征地费用及附带条件有不同意见而扯皮，有的一拖就是几年不能解决，引滦入津工程不仅在天津市辖区内的有关郊县农村征用土地，而且还要在河北省辖区内的迁西县和遵化县征用土地，估计困难会更多。在国务院的关怀下，在水利部的帮助下，确立了征用土地“先用后赔”的办法，打破了以往先讲好赔偿条件再用地的常规。引滦全线一共征用永久性占地七万多亩，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最长的两个月，最快的只用了十几天就能占地开工了。

组织施工队伍前，考虑到引滦入津工程的项目众多，分布



在二百多公里的一条线上，有利于组织单位参加会战。因此，引滦筹备组开始向有关施工单位作摸底调查，了解这些施工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施工队伍素质，技术设备能力及施工信誉等，以便能更好地按工程的特点、要求，把任务适当地分配给施工单位。

在决定施工单位时，又破格约请了驻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请他们承担开凿引水隧洞的任务，不少人对此抱有很大的疑问，野战部队是一支有强健体力的队伍，做些卖力气的土方活没问题。他们虽有工兵营的建制，但设备简单，技术力量薄弱，能胜任吗？指挥部派技术人员对部队进行战前培训，为他们讲解开凿隧洞有关的操作技术及规程，他们的军、师、团、营首长同士兵一起聚精会神地听课，亲手操作机械，认真学习，一丝不苟。他们没有框框，对推广指挥部决定的先进技术，总是积极去做，而且不断改进，有所创新。解放军野战部队不仅胜利、出色地完成了开凿隧洞的任务，而且创造了人民军队在和平时期参加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好经验，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肯定。

参加引滦工程施工的队伍有解放军3支部队，有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的第一至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机施公司及安装公司；天津市第一、第二市政工程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市水利工程公司，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市电力修建公司；送变电公司；北京市机施公司；中国石化公司第四建设公司；石油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交通部一航局第一工程处及遵化、蓟县、宝坻及武清等县的施工队伍。全线施工人员经常在七万人以上。

工程用料的供应，也是打破常规。建材局、物资局、运输

公司、铁路局都派负责人集中到指挥部办公，工程材料送到工地。过去，将工料的指标拨给施工单位，由施工单位去提取材料，自行委托运输，既费人力又不能保证使用的时间。引滦工程的工料供应办法，方便了施工，对保证工程快速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引滦工程总计用料440多万吨，其中砂石料为380万吨、水泥37万吨、钢材11.5万吨。此外还有各种设备2776台套。

运输是做好材料准备的关键手段。根据引滦工程施工点多、运距远、时间紧等特点，早安排，赶在施工前头。铁路部门除统运到津的物资以外，又为引滦组织了300多个专列，完成运量七十多万吨。市交通局专业汽车投车共11.67万个车班，运行19万个车次，完成运量达133.85万吨。各县交通局及各施工单位的汽车也投入运输行列。公路完成的总运量达314.7万吨。

由于施工准备工作快速、有效地进行，到1982年5月便具备了全线开工的条件，引滦进入了实战阶段。

根据“洞成水通”的建设方针，要求尽快完成的工程有113项。其中难度最大的是隧洞工程，这是整个引滦工程的咽喉所在。另外，于桥水库以下专用输水明渠上的3个泵站以及明渠与几条大河交叉的倒虹吸工程也是重要部分。隧洞工程需要在1981年冬天来到前，做好工地“三通一平”，待冬天来到，已经转入地下打斜井工程。承担隧洞施工的两支解放军部队于1981年11月11日进驻隧洞工地现场，边搭工棚，边搞“三通一平”。12月12日，首先开挖5号施工斜井，到1981年底，15条斜井有14条全线开挖，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与此同时，承担倒虹吸工程、泵站等施工单位的队伍也开赴现场。1982年2月

21日，引青入潮倒虹吸工程打响了开工第一炮。紧接着北京排污河、郎园引河等7条倒虹吸工程、州河整治、大张庄及潮白新河两个泵站和尔王庄水库等六十余项工程到1982年5月10日左右，都具备了开工条件。

1982年5月12日，在遵化县运动场举行了隆重的引滦入津全线正式开工典礼。水利部长钱正英受万里副总理的委托，参加开工典礼并讲了话。她指出，引滦入津工程从直接意义上讲，是为了解决天津城市用水，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天津如果因缺水而停产，不仅影响到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人民日用消费品的供应，而且会影响全国许多工厂不能开工生产，国家将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这项工程是全国性工程。她要求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厉行节约、安全施工，把这项跨流域的综合性大型水利工程，夺取全面胜利。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副市长兼总指挥李瑞环出席了大会。李瑞环在讲话中向参加工程建设的各级干部和全体人员提出五点要求：

1.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项工程非常艰巨复杂，如果没有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做保证，单靠金钱是搞不好的。要树立一种精神，改变那种离开钱办不成事的不良风气。

2. 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在工程建设的一切环节中，都要提倡尊重科学、讲究科学，把革命胆略和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把科学态度和冲天干劲结合起来。设计上力求做到先进、合理、经济。施工上积极推广经过试验的、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和操作方法，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

3. 广泛开展劳动竞赛。

4.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和指挥人员一定要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亲临一线，实行面对面领导。

#### 5. 搞好团结协作。

引滦全线正式开工后，按四个战役组织施工。第一战役以“迎十二大、向国庆献礼”为口号，狠抓隧洞等关键工程的进展。第二战役是在工程提前完成的可能性愈见明显时，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将引滦提前通水的目标公布于众，另一方面号召加快建设速度，开创引滦新局面，做为贯彻十二大精神的实际行动。第三战役是在1983年3月上旬开始的。提出了“7月完工，8月试水，9月验收，国庆通水”的具体目标，要求全线再次掀起施工高潮。1983年6月中旬，鉴于113项通水工程的重点已突破，难点已攻克，如期通水的大局已定，于是组织了大于40天的第四战役。要求全线干净、利落地完成所有通水工程。

1983年7月底，引滦的113项通水工程胜利完工，施工战斗胜利结束。从1982年5月正式开工到全部完工，历时1年2个月又20天。在工期上实现了大突破，这是按常规施工万难做到的。主要的工程进度如下：

1. 引水隧洞322天全线贯通。
2. 4座泵站工期最长的457天，最短的208天。
3. 尔王庄水库围堤长14.3公里，工期440天。
4. 专用输水明渠土方1200万立方米，52天完成开挖任务。
5. 铺设大口径钢管14公里，工期175天。
6. 两座110千伏变电站，8个月建成正式送电。

有关通水的工程，共完成土方3460万立方米，石方167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63.7万立方米，完成建筑面积50973平方米。

## 地下长廊

引滦入津输水隧洞东起迁西县大黑汀村西引滦总干渠0+500里程处，西行穿鞍寨沟、横河谷地，沿单薄山脊经山西村，北转坡，在景忠山麓穿滦河、黎河间的分水岭<sup>6</sup>，过张老峪沟、鸡冠山，于遵化县境内的接官厅村连接黎河谷地，是一条深深的地下长廊，有如一个无限伸延的城门洞。洞净高6.25米，净宽5.7米，可以并行两辆解放牌汽车。它总长12.39公里，其中打洞开挖的隧洞段长9666米，明挖的隧洞段长1724米。埋深大部在40~60米左右，个别洞段埋深超过100米。在沟谷处埋深较浅，但也在10米以上。洞身经过的东部地表岩石风化层厚10米左右，西部较深，一般在20~30米之间。隧洞要穿过两个大断层的交汇带，长44米左右，岩石破碎，为施工最困难地段。

由于天津需水孔急，国务院要求在1984年汛前，即用两年半时间建成通水。隧洞是整个引滦工程的咽喉，洞成水就通到天津了。为了在两年内打通隧洞，就如何施工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引滦隧洞长十余公里，如果从一头开挖，全部打通需要30年时间。从两头同时开挖，也要15年，不能那么施工，必须沿洞段开挖许多施工斜井，每个斜井可以产生两个工作面。把一条隧洞用斜井截成许多短的洞段。许多工作面同时开挖，这叫“长洞短打”。按照这个施工方案，在隧洞沿线根据地形，选定了开挖15条施工斜井的地点，使15条斜井产生30个工作面，连同两端共有32个工作面可以同时开挖。

铁道兵承担的施工段长8773米，开挖斜井11个，长1643.7米。按当时国内开凿隧洞每天进尺的水平估计，一般是每天进

尺1米，这样打斜井一共要150天，开挖正洞要380天，还有大量内部衬砌工程要做，因此任务十分艰巨。铁道兵部队在开赴现场前，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开展了“八大讲”（大讲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大讲引进天津是保证经济起飞和促进全国经济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重大措施；大讲天津人民盼水急切的心情；大讲工程会战的形式和具体任务；大讲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大讲铁道兵的光荣历史；大讲天津市人民政府对铁道兵的关怀。）讲得干部、战士个个心明眼亮、精神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81年11月11日，部队进驻施工现场后，立即展开劈坡开路、平地建工棚、打井引水和架设电线等准备工作。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第5号斜井就破土动工。天津驻军各级党委齐心协力，以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一切服从工程建设的需要，发扬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在雪地里就餐，在冰地上测量。到12月底，15个斜井有14个进入洞内开挖，最后一个斜井在1982年1月18日也开始进洞开挖了。

由于斜井在严冬到来前动工，从而带动了其他各项工作。施工单位迅速调动后续部队到施工前线，物资供应工作也紧紧跟上，大批施工装备及物料运到现场。铺设铁路支线、架设高压电线等工作也迅速铺开。1982年2月20日，第5号斜井首先达到正洞位置，从此进入了正洞开挖阶段。

通过试验，开挖正洞逐步推广和采用了光面爆破、锚喷支护、全断面掘进、非电导爆系统等新工艺，加快了掘进进尺。由于推广以钢代木，节省了两万多立方米木材。在通过大断层破碎带时，采取密布孔、打浅眼、少装药、放小炮等措施，并采取加密和加长锚杆、锚喷挂网、花管导水等措施，胜利地通过

了大断层破碎带。

在开挖第9号斜井时，遇到了多次塌方。考虑到8、9两斜井间的正洞长638米，9、10两斜井间的正洞长571米，都是比较长的洞段，为了不使9号斜井因处理塌方而耽误工期，影响正洞开挖，决定增挖两条斜井，其位置分别在8、9两斜井间和9、10两斜井间，因此，正洞全线的开挖工作面增加到36个。在这么多的工作面同时开挖，洞内导线测量稍有误差，就会造成隧洞各段穿“套袖”，即各段的中心线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者中心线的高程不同，相互间连接不上。如果差错较大，将会造成隧洞要挪动中线的重大损失。因此，隧洞内外导线控制测量必须非常精确。为此，请冶金工业部勘察总公司、天津市测绘处两支专业队伍，分别对17个斜井和正洞内导线进行复核测量，并采用光电三角高程仪复核洞内水准点。由于洞内外的控制测量工作认真、细致、准确，隧洞全线贯通后量测，隧洞中心线横向误差最大值为33毫米，高程误差最大为16毫米，大大低于规范要求的横向差 $\pm 100$ 毫米、高程差 $\pm 50$ 毫米的规定。在36个作业面同时开挖的隧洞，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是非常难得的。

引滦隧洞遇到大小断层176条，发生了20至200立方米的塌方16处，为了克服顽石，战胜塌方，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天津驻军某部副部队长王嘉祥年近花甲，在战争年代曾多处负伤，右手致残。他指挥部队开挖隧洞每月至少有20天蹲在工地。施工遇到难处，他冒着危险，每放一炮进去看一次，白天放炮白天去，夜里放炮夜里去，把个人的生命同引滦联在一起。副师长左尔文年过半百，身体有病，常常天不亮就下工地指挥掘进。曾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立过二等功的贾

颖民，带领连队出色地完成了施工任务，光荣地参加了天津市“五一”劳模座谈会，副指导员王荣镒在1号斜井大塌方时，他让战士撤离危险区，自己带着两名共产党员冲了上去，排除了险情。3号斜井处于强风化区，石质疏松，开工后曾多次发生塌方。一次因爆发震动，近20立方米的岩石从洞顶塌下来。将3根钢支架压弯。指导员王云建、共产党员阮泽胜、张明俊、赵士勤带头冲进险区。排险时有三十多次零星落石，有人负伤了，但坚持不下火线，干了两小时。一次铁道兵某连的安全员看到掌子面上掉碎石，他知道这是塌方的前兆，立即通知战士撤离现场。正在打风枪的班长刚转身要撤，发现里面还有一名战士，他立即冲过去，一把将那战士猛甩在自己身后，脱离了险区，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班长头顶上一块大石头轰地落了下来，紧擦他的腰部落地。11号斜井是大淋水段，战士们形容这个施工段是“滴水象水帘，小溪水潺潺，积水没过膝，挖碴实在难。”顶部悬石一捅就掉，小塌方时有发生，一个工班的30名干部、战士在水帘洞内，不顾水淋，穿着背心干。新兵孟宪起为淘除作业面前的积水，连抬头的功夫都没有，一个工班楞把一个新铁桶的桶帮磨穿了。

广大指战员一心扑在引滦工地上。驻津解放军某部培训的一批施工技术骨干大部分是老战士，约有三千名老战士已到退伍期了。部队决定让他们延期退伍，继续为引滦工作一段时间。号召一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打通引滦隧洞，誓不退伍。”有的推迟婚期，有的缩短假期。引滦全线，传颂着许多美好的故事。

驻津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建设地下长廊的战斗中，共放了27万余发炮，通过断层18条，排险2125次，战胜塌方、滑坡二



百多次，并创造了作业面日进尺6.8米的好成绩。全师有614人主动推迟假期、婚期，近六百人探亲提前归队，二千五百余人次带病坚持施工，有2人光荣牺牲，32人受伤致残。铁道兵部队放炮63.8万次，通过大小断层239条，战胜大小塌方三千八百多次。全师有二千九百多人主动推迟婚期、假期，有一千五百多人探亲提前归队，三千六百多人带病带伤坚持施工。有19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两支施工部队奋勇拼搏，为天津人民办好事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天津人民心间。

1983年3月28日下午2时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时刻，经过322天的苦战，引滦地下长廊全线贯通。当最后一炮震天动地地轰响后，一股强大的气流从斜井洞口径直冲出，人们不顾浓烈的硝烟味，扑向隧洞最后一个豁口。两侧的指战员跳跃着、欢呼着，“贯通了！”“胜利了！”的声音，在景忠山下久久回荡。

1983年8月15日，引滦通水开始。试水以40立方米/每秒、60立方米/每秒、75立方米/每秒三级流量逐级增大的次序进行。当日上午10点钟，潘家口水库和大黑汀水库提闸放水，以每小时5公里的流速，缓缓流入地下长廊。11点13分，聚集在隧洞出口处的人群高呼“来啦，来啦！”滦河水宛如卷起的千堆雪，从隧洞出口喷涌而出。从此，这条地下长廊，将滦河水源源不断地输入津门。

## 引滦创新风

1982年5月18日，我市红桥区本溪路小学学生温元元把自己平时积攒的14元零花钱，亲自送到指挥部，支援引滦工程建

设。孩子的诚意和热情，表达了我市广大群众对引滦入津工程的重视，大家都以为这个工程做贡献为荣，各行各业都给引滦工程开绿灯。

引滦入津工程中的潮白新河、尔王庄及大张庄三座泵站需要的立式轴流泵及同步电动机，共有4种规格，27套机组设备。天津发电设备厂承担了这些重要机电设备的制造任务。该厂没有制造过单机流量为10立方米/每秒的大型立式轴流泵，而且原来的年生产任务已经作了安排，但为了引滦工程，该厂不顾技术上、生产上的困难，毅然承担了全部的制造任务。因为水泵的质量问题，一位车间主任曾被撤职，最后终于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市区的商业部门，贴出醒目的大字报，将商品优先供应引滦战士。水产部门宁可让市民少吃一轮鱼，也要把鱼送到引滦第一线。市内奶粉、恒大烟供应紧张，但在引滦前线的供销店里，随时都可以买到。蚊帐、蚊香、雨鞋等用品，源源供应引滦战士。

迁西县和遵化县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河北省和唐山地区党政领导下，不仅承受了土地和经济物资的牺牲，而且无私地支援大批生活物质的供应，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极大地鼓舞了引滦战士的斗志。

另一方面，引滦建设者英勇拼搏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天津人民。各界纷纷组织慰问团到施工一线去慰问参建人员。天津市委、市政府三次组成大型慰问团。市妇联组织全市妇女开展了“献巧手，表寸心”活动，象战争年代支援前线那样，亲手制做各种慰问品，装满了12大卡车送到引滦工地。本市及首都文艺界的许多艺术家和著名演员也多次深入工地进行慰问演

出。

妇联慰问团回市后，向广大妇女传来了在滦河工地艰苦的引水场面及解放军以不怕苦，不怕死精神奋战隧洞的感人情景。在市人民银行的三千多名女职工中，出现了一个学习解放军，开创新局面的热潮。为表达对解放军的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她们纷纷缝制慰问品，她们想到燕山山区天寒地冻，怕战士们冻坏脚，就动手做了一双双棉袜子，考虑到山区石头多，怕战士们穿软胶底鞋硌脚，便缝制了有17层新布的厚鞋垫。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平区解放路分理处的王学敏，在她精心缝制的针线包上，绣上“饮水思亲人”五个字。河北区十字街分理处一位在歇假的女同志，把自己当年结婚时穿过的红色的礼服剪下一块，缝了针线包送给引滦战士，以表达她的一腔热情。

引滦牵动了娃娃们的心，河西区佟楼小学五年一班的28名小学生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指挥部转达。信中说：“引滦工地上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的行动，使我们懂得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体会到党非常关心天津人民！我们决心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向你们汇报。”南开中学18名少先队员捐献了手套和口罩，并附上一条红领巾。他们在信中说，“一条鲜红领巾，献给在引滦工程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寄托我们深切的怀念。”

引滦战士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天津评剧院一团的创作人员，他们深入工地搜集素材，创作并上演了现代戏《滦水情》，受到各方好评。

引滦新风劲吹义务劳动开挖输水明渠土方工地沿线。1982年9月3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引滦工程明渠土方义务劳动动

员大会。李瑞环同志在大会上说：“引滦入津工程全线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巨大成果，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这既是改造自然界，也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现，每一个工程建设者的思想都受到检验，精神得到了陶冶。希望几万参加义务劳动的大军，以引滦战士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风格。当前社会上存在一股‘一切向钱看’的很不好的风气，这和党的十二大精神格格不入。我们要通过义务劳动，振奋精神，冲击这股歪风，用实际行动建设精神文明。”引滦输水明渠是解决天津人民吃水的重要工程之一，市委、市政府动员后，全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各区、县、局相继建立以主要领导组成的施工指挥班子，广大民兵、机关干部、驻津解放军指战员积极报名参战。

引滦输水明渠北起宝坻县的九王庄，自北向南，到北郊区的大张庄。穿越潮白河、北京排污河和永定新河，全长64公里。全渠平均挖深4至6米，土方量为1200万立方米，分配给全市24个区、县、口来施工。工程所在的宝坻县、武清县和北郊区负责在施工沿线打13眼机井、配套3眼旧井，解决劳动大军的饮水问题；架设64公里高压输电线，安装69台变压器，解决施工用电问题。此外还负责工程沿线的拆迁工作。

引滦水到津后，只能解决城市人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近郊园田用水，农业用水问题依然不能解决，但郊县的农民群众并不因未能直接受益而对义务劳动挖明渠土方有异议。当时正值农村秋收秋种的紧张季节，他们妥善安排，把完成明渠土方作为大事来对待，力争提前完成任务。

市内各区、局都各显神通，组织年轻力壮的职工，借用机械设备，尽快进入工地，深恐落在别人后面。市工交系统的施

工段长9华里，土方55万立方米。这个系统的职工对挖土方缺乏经验，但他们决心克服困难，为引滦出力。这个系统的各单位，组织了党团员为骨干，思想、作风、身体三过硬的万名职工，携带一百五十余台施工机械投入了开挖土方的战斗。天津警备区承担施工段长1624米，土方24万余立方米。他们决心大干20天，拿下土方，向国庆献礼。市财贸系统广大职工，担任着供应全市人民煤、米、油、醋、茶和不胜枚举的生活日用品的重任。他们一方面坚持做好日常供应工作，一方面抽调了四千五百多名骨干参加义务劳动。他们决心担两个重担，力创引滦工程和保障供给双丰收。

1982年10月11日，天津市党政军的领导同志来到明渠土方工地，同战斗在那里的九万多名工程建设者们一起参加了挖土方的义务劳动。

在党的十二大强劲东风吹送下，百里明渠工地上，盛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有婚后即上工地的新郎，有父子、兄弟同上阵的佳话；有的负伤不下工地，说道：“伤重不动引滦心。”引滦工地是义务劳动的工地，又是改造人的好场所，有16个被社会称作“浪子”的青年，在明渠工地不畏艰苦，挥汗战斗，干得十分认真，人们说，真是浪子回头了。

工地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经过10万劳动大军的努力，仅用54天时间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70天，取得了两个文明双丰收。

## 引滦入津门

1983年8月15日，引滦开始试通水后，证明全线各项工程

均能满足通水要求。8月24日上午11时，试通水胜利完成。引滦工程指挥部决定于9月5日正式放水，使全市人民在9月11日饮到了滦河甘露，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9月12日，引滦入津通水庆功大会在市体育馆隆重举行。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秦基伟、乔石、田纪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亲自到会祝贺。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引滦工程为加速我国重点工程建设，闯出了新路子，创造了新经验。他说：“引滦入津工程的胜利，说明我们中国人民是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打出许多象引滦工程这样的漂亮仗，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大会表彰了先进单位63个，先进集体639个，先进个人3265名，立功人员3100名。

为了纪念天津驻军及铁道兵战士在开挖引滦隧洞工程的突出贡献，在大黑汀水库建立了纪念碑，于9月9日揭幕。为纪念引滦全线战士的丰功伟绩，在市内三岔河口竖立了一座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于9月11日下午揭幕。为向全市人民进行教育，并介绍引滦入津工程的全貌，9月14日在水上公园展览馆原址，举办了引滦入津工程展览开幕式。与此同时，组织力量编写了《引滦入津工程基本经验》及《引滦入津》的技术总结。基本经验有8条：（1）使重点真正成为重点，把引滦工程成为天津的第一号重点工程，把它喊响，搞得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让重点工程深入人心。（2）建立坚强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指挥体系。市政府赋予指挥部以指挥建设的充分权力。（3）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主要是在权责一

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4)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工程的始终，同时要抓好施工队伍的生活。(5) 严格实行科学管理和科学施工。狠抓以控制综合进度为中心的计划管理。积极推进先进技术，改进基本工艺。(6) 依靠人民军队这支重要的骨干力量。(7)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参加引滦工程的勘测单位有18个，设计单位有20个，施工的县团级单位有42个，承担设备制造的大厂有14个，这些单位相互协作，完成了工程建设。(8) 坚持正确的工作方法和良好的工作作风。1984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将此经验联合批转全国。《引滦入津》技术总结分三卷：《组织管理》、《隧洞工程》和《输水工程》作为内部资料在全国范围内交流。

有关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后的经济效益如何？市重点工程指挥部与南开大学组成“引滦经济效益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对重点行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根据得到的数据，群众的反映，运用对比分析和替代推算法，得出的结论是：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后，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概述如下：

1. 避免了1983年引黄济津的巨资消耗，以及引黄给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引黄沿线带来土地返碱的农业损失，消除了引黄前清理引水渠上大量泥沙的负担，估计可节省投资2亿元。

2. 结束了天津人民长期饮用苦涩水的历史，有益于人民健康，方便了群众的生活。

3. 解决了因供水不足，水质不好对天津工业生产的威胁。这种威胁表现为工业生产数量上的限产和有关产品质量低劣，残品、废品率很高。

4. 有利于园田种植，对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有保证。

5. 对天津市的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6. 可以减少地下水的开采，有效地控制市区地面因过量开采地下水而发生的沉降。

7. 恢复了海河的排水功能。海河不再用作天津用水的存储河道。

8. 为城市绿化创造了条件。

9. 引滦入津工程实际投资10.73亿元，按每年收水7亿立方米计算，每立方米的一次基本建设投资为1.53元。而1981年、1982年两次引黄，平均每立方米的代价为0.7元。两次引黄河水的代价，相当于引滦一次性基建投资。

10. 引滦入津工程的建设周期为1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两年竣工。按单年利润8%计算，两年利息有1.785亿元。两年间又引黄两次，需3.4亿元，因此提前两年通水，相当于节省5亿元。

11. 引滦使天津有了稳定的水源，通水以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天津城市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得到进一步恢复与发展，这包括各个方面对内对外的交往与交流。随着天津的发展，引滦将越来越显出其历史价值。

由于引滦入津工程的建成通水，天津市严重缺水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这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宏伟事业。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代表天津人民的共同意愿，在引滦工程纪念碑上，勒石以铭。文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四周年之际，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七百七十万天津人民饮水思源，勒石以铭。



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华北地区持续干旱。全市人民节水保水，成绩卓著。为解决天津城市用水，加快四化建设，198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兴建引滦入津工程。这项跨流域工程，自大黑汀水库引水，穿燕山余脉，使滦水西流，循黎河入于桥水库，经州河、蓟运河，转输水明渠，注尔王庄水库，引入市区。途经迁西、遵化、蓟县、宝坻、武清、北郊，全长234公里。筑有隧洞、泵站、水库、水厂、暗涵、明渠、管道、倒虹、桥闸、电站等工程215项。1982年5月全线开工，至胜利建成，历时一年四个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89208部队和天津驻军52859部队，承担了最艰险的开凿隧洞任务。人民子弟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顽强拼搏，科学施工，为天津人民建立了丰功，创造了我国开凿输水隧洞的奇迹。21名引滦工程建设者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亲临工地视察。国务院有关部委积极指导帮助。河北省迁西、遵化两县人民做出重要贡献。全国23个省市给予大力支援，168个单位参加会战，5万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全市工农商学兵和干部十多万人参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引滦入津的胜利实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有改天换地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力量，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光辉灿烂的前途。

引滦入津，造福人民。滦水滔滔，千秋永志。

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公元1983年9月立

为了永远纪念21名为民造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在河北省迁西县境内的引水隧洞九号斜井口，树立一座石碑，将英烈的姓名、籍贯、年龄及所属单位镌刻在碑上，让后人凭吊。

引滦入津工程还给天津带来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引滦精神”。具体地说有6条：（1）为民造福的伟大思想；（2）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3）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4）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5）团结协作的高尚风格；（6）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这些可贵的引滦精神，无疑将在今后的天津市建设事业中，永放光芒，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欢庆引滦通水，作者有曲一首《十二月》带《尧民歌》，词曰：

“烟雾里众山隐隐，水库面碧波粼粼，喜看那清流滚滚，穿越了隧洞深深，真个是白练如银，问何人引到津门？

海河欢笑满城春，同唱引滦好精神。甘泉名茶且细品，饮水思源教后人。根本，矢志为人民，科学加干劲。”

# 根治海河十四春

董一林 王克非

海河，起自天津西的金钢桥，东至大沽口入海，全长七十多公里。它的上游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五大河流和三百多条支流。这些河流象一把巨型的扇子斜铺在华北大地上，组成了海河水系。海河水系流经的地区叫海河流域，其范围：西起太行山，东临渤海，北跨燕山，南界黄河。包括北京、天津两市的全部和河北省的大部，以及山东、山西、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全流域面积265000平方公里，山区、平原各占50%，耕地面积一亿八千多万亩。

## 昔日海河 洪涝为害

海河水系的许多河流，发源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山区一般海拔一千多米，坡度陡，支流多，源短流急；平原地势平缓，河水流速慢，河道不仅被泥沙淤积，而且河道狭窄，尾闾不畅，又无入海出路。上下游河道之间，泄洪排涝能力相差几十倍甚至一二百倍，上游的洪沥水又多汇集天津市海河后，经大沽口入海。所以汛期海河不能承受泄洪排涝，造成河道决口漫溢而注入各个洼淀。如天津郊县的黄庄洼、大钟庄洼、里自沽洼、大黄铺洼、七里海洼、贾口洼、台黄洼、北大港等，河

北省境内的白洋淀、东淀、文安洼、宁晋泊洼、大陆泽洼、大浪淀洼、献县泛区、梁各庄泛区等洼淀，经常滞洪积水，年复一年，人民流离失所，民谣流传着：“淹了文安洼，十年别回家”，是为洼淀人民遭受水患后的写照。

海河流域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全年雨量分布极不均衡，夏秋7、8月份，上游山区经常发生暴雨，每逢暴雨顺流而下，再加下游平原的淤涝，排洪排涝不畅，即造成十年九涝。据历史记载从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间，先后发生较大水灾387次，平均一年多就有一次水灾；旱灾407次。春旱秋涝灾害交错发生，也造成土地碱化。河北省黑龙港地区的47个县，占全省耕地面积1/3的土地严重碱化，常年是春天白茫茫（土地盐碱），夏天水汪汪，种地难得苗，见碱难见粮。城市人民同样遭受洪水灾害，1725年至1939年的二百多年中发生大洪水13次，其中有4次洪水波及北京，有8次大水淹了天津。1801年水淹天津旧城墙砖26级，水深3.9米。1890年海河流域连降暴雨，永定河、大清河决口漫溢，北京城受到洪涝侵袭。1939年7月太行山一带山洪暴发，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河流多处漫溢决口，使116个县受灾，淹没了四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受灾人民三百余万，死伤12000人，京汉、津浦铁路冲毁160公里，洪水冲进天津市区，水深1至2米，街上行船长达月余，14000户的房屋倒塌。

建国后，于五十年代，在海河水系曾修复和兴修一些水利工程，仅河北省在上游较大支流上修建容量在一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就有18座，在下游开挖了减河，整治加固了河道堤防，各地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同时，也掀起了治水热潮。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排洪入海能力比建国前增加了一

倍多，对防洪除涝治碱发挥了作用。但由于旧有的一些水利工程长期失修，河道淤积，甚至遭到破坏，虽大力修复，仍标准很低。加上新修筑的水库工程，在“大跃进”的口号下，上得急，上得快，工程质量差，遗留不少问题，未能改变中下游河道狭窄、无入海出路的情况，洪涝灾害仍然不断发生，五十年代大的洪涝年就有1949、1954、1956、1959年4个年头。每当大洪涝年份，淹没耕地一般都在2000万亩至3000万亩，严重时达5000万至6000万亩。1963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中南部太行山东麓地区连降暴雨，造成近50年来特大洪水。据记载旬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的笼罩面积达5390平方公里，超过600毫米的达42000平方公里，最大七日降雨量高达2051毫米。海河南系一次降雨总量577亿立米，产生径流量302亿立米，相当1939年洪水的两倍多。罕见的特大洪水，使漳卫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系洪水猛涨，西部山区漫过京广铁路的洪水流量达78000秒立米，使狭窄的中下游河道根本不能承受，洪水一到，四处溃决，平地行洪宽达百里，使104个县、市受灾，二千八百多个村庄的房屋被洪水荡毁，死亡5030人，牲畜伤亡52000头，桥梁闸涵被毁207座，有的通讯线路和京广铁路部分路段被冲毁。

### 根治海河 绘出蓝图

海河流域洪涝成灾，给人民带来苦难，对此，毛泽东主席极为关注，特在1963年11月17日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这一伟大号召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愿。

早在民国7年（1918年），北洋政府设置顺直水利委员会编制过《顺直河道治本计划报告书》、《永定河治本计划》，

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萧条，无法实施。但这两个计划书为以后的治理规划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建国后，自1951年开始，各有关部门也曾制订过以防洪为主的分河系规划，如河北省水利厅于1952年编制了大清河流域治理规划；水利部设计局于1953年编制了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从1955年到1957年水利部又着手对整个海河流域进行规划，拟订了《海河流域规划》（草案）。当时，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在中央农业部、林业部、交通部、电力工业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中央气象局等部门和有关省、市的协助配合下，抽调技术干部二百余人，勘测人员一千多人。这支勘测技术队伍，在负责人须恺、崔宗培、江国栋等总工程师和苏联专家尼古拉耶夫等指导下，进行了气象、水文、土壤调查、地质钻探、土探、河道测量等大量工作。这是一次海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对流域内的防洪除涝、农田灌溉、城市供水、航运、发电以及山区水土保持等都有全面安排，并且把防治洪水，解除涝灾列为首先解决的问题。规划拟订在上游山区各主要河流修建大、中型水库四十余座，以利拦蓄山区洪水；在中下流适当利用洼淀滞洪，同时进行河道整治或开辟减河，使各水系自成系统；在平原地区进行除涝类型分区，并安排有除涝渠系及排水出路。这些规划设想都为1964年全面规划奠定了较好的工作基础。

1964年，中央水电部遵照“一定要根治海河”的要求，在北京成立了海河勘测设计院，由丁适存院长、冯寅总工程师和郭起光副总工程师等负责海河流域规划工作。这次规划参照历次的规划资料，根据1963年洪水情况，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期间水利建设的经验教训，于1964年9月提出

《海河流域轮廓规划意见》（讨论稿），转年拟订《子牙河防洪规划》和《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

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省市还完成了徒骇河、马颊河、黑龙港、运东地区等除涝规划，确定以海河流域南系1963年型洪水，北系1939年型洪水为规划治理的标准，贯彻上蓄（山区修建水库），中疏（整治扩挖疏浚河道），下排（开拓新的入海通道），适当滞洪（利用旧有洼淀滞洪）的防洪方针，近期以排泄为主，排滞兼施，洪涝兼治。

《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主要对海河流域山区水土保持和各条行洪河道的治理和骨干工程作了详细的安排。其中对中下游防洪河道的治理有：扩建和新挖子牙河、滏阳新河、漳沱河、独流减河、赵王新渠、潮白新河、北运河、永定新河、漳卫新河、卫运河、卫河等14条骨干行洪河道；对平原除涝河道的治理有：宣惠河、南排河、北排河、清凉江、老漳河、索芦河、江江河、小白河、龙河、天堂河、徒骇河、马颊河、德惠新河等17条；还有一些支流河道治理和除涝配套工程，山区水库续建、扩建、新建工程，以及宁晋泊、大陆泽、白洋淀等滞洪区整修工程。

规划治理的几十条河道，都有疏浚、扩挖或局部裁弯取直、提高防洪除涝标准的问题，因此有的河道变化较大，工程比较复杂，有的是几经修改才定下来。如子牙新河，如果扩挖，势必切断黑龙港流域的沥求排泄，有形成新的贾口洼淀的危险。如果不扩挖就不能解决上游漳沱河、滏阳河及其他十余条支流洪水下泄入海问题。当时河北省副省长谢辉带领技术人员到江苏省参观新沂河，学习处理洪沥水矛盾的方法。最后确定把号称72连洼的黑龙港流域从上到下的9条河道联起来，形成两个排水系统直接入海；修建子牙新河与滏阳新河，为子牙河系的

洪水开辟入海出路，子牙新河河道断面采用两河两堤型式，使洪沥分流，各走各的道，改变过去洪沥水争道互相干扰的状况。按照这一设计规划治理后，子牙新河自献县起，在沧县兴济镇北穿过南运河、津浦铁路，于天津市北大港新老马棚口之间入海，全长144公里。南北两堤相距2.5公里至3.6公里。开挖深水河槽填筑北堤，南堤外开挖北排河镇筑南堤，北堤高于南堤1米，深槽右侧加筑滩地埝，形成子牙新河主槽，可下泄9000秒立米。这样不仅没带来新问题，而且历史遗留下来的排水矛盾，也相应得到解决。

### 组织动员 付诸实施

规划确定后，遂即组建了根治海河指挥部。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副省长阎达开任总指挥，天津市副市长王培仁、河北省副省长谢辉等任副总指挥，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兼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地、县、公社等各级党政军机关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等部门，相继抽调上万名干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指挥系统。省、地根治海河指挥部设有中共党的组织，行政领导设有正副指挥、正副政治委员，办事机构设有办公室、政治处，工程、后勤、供应、计划处等。县、公社采取军队建制形式，组成团、连、排（班）。县为团级，设正副团长和正副政委，下设办公室、工程、后勤、政工等科室。公社为连级，由公社脱产干部一至二人担任连长、指导员，并建立临时党支部。排（班）长从民工中选拔。各个连队还选拔二至三名心灵手巧的民工担任施工技术员，负责落实指挥施工技术。

各级根治海河指挥部，负责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工队伍，领导指挥民工组织按照统一规划和工程设计标准进行施工。



在根治海河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极其关注工程进展，及时给予治河大军鼓励与支持。周总理亲自审定海河治理规划，并且关切地指出：要在中下游开辟排洪入海通道，彻底根治海河，解决洪水泛滥所造成的水患问题。李先念副总理每年都要听取海河情况汇报，并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参加研究审查海河的计划安排，要求把根治海河所需要的资金和物料列入国家计划，指示有关部门尽先落实投资，尽先解决钢筋、水泥、木材等材料，尽先安排运输，保证根治海河工程顺利进行。197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一篇有关《河北省治理海河处理白洋淀措施不当，水产资源遭到破坏》的报道。周总理看后当即批示：“在讨论长江葛洲坝后，也要谈一下海河水利工程，预约河北、天津管水利的同志来京讨论。”1972年11月14日，水电部召集了有河北省、天津市、保定和沧州地区，以及安新县、任丘县负责同志参加的“白洋淀问题座谈会。”周总理在听取河北省负责人汇报时说：“白洋淀的问题，你们两个县（安新县、任丘县）可以搞统筹嘛，为什么那样对立？任丘要求少围埝，你（安新县）就多围一点，为什么有倾向性？也难怪，都是要把本县搞上去。千里堤决口淹几个县？千里堤不能决口，上边决口也不好。”又说：“你们（河北省）现在是把水排除了，……出口找到了，可水都跑走了。你们蓄泄结合起来才好。光蓄不对，光泄也不行，还要蓄。”这些指示对根治海河水利工程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各级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一年两季随民工进入施工场地具体指挥落实施工任务。特别是地、县指挥部的全体人员与民工一样在工地上搭席棚、建炉灶，吃住在工地上。连、排干部就与民工同吃、同住、同施工，而且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

乐在后，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干。

由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严密的组织指挥机构，仅河北省于1965年冬季组织发动84个县，四十九万五千多民工投入黑龙港地区的水利治理，取得了首战告捷。当号召出工治河时，各地男女青壮年踊跃报名，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争出工，兄弟姐妹齐报名。河北省阜城县漫河村穆大娘在旧社会流浪讨饭双目失明，饱尝了水灾之苦，1965年秋，她听到根治海河要人出工，就替儿子穆宗新报了名，并拿着讨饭的破篮子给儿子讲家史，讲过去遭水害的情景，勉励儿子一心去治河。宝坻县厂家窝村李俭大爷的大儿子李庆贵，在治河工地不幸牺牲，这位老人又把二儿子李庆琛送到工地，叫他接过哥哥的小推车继续完成治河任务。根治海河是远征施工，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本来不动员妇女出工，可是广大青年妇女坚决要求出工治河。蒿城、玉田、静海、临西等县和保定市民工团先后组成“红姑娘排”、“铁姑娘连”一次又一次地参加根治海河战斗。

根治海河连续大干14个春秋，从1965年冬季开始到1979年，每年都有三五十万人南征北战，有重点、分阶段地对中下游行洪河道和除涝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治理：

①自1965年冬至1968年春，先治理了海河流域南部黑龙港地区的宣惠河、老漳河、索芦河、老盐河、南排河、江江河、徒骇河、马颊河及任河大干渠等排沥河道。接着新挖了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扩挖了漳沱河、滏阳河中游河道等排洪河道。

②1968年冬至1975年春，治河大军转移到海河流域北部，治理了独流减河、大清河南北支、永定新河、北京排污河、潮白新河、青龙湾、北运河、蓟运河、还乡河、龙河、捷地减河等排洪河道。同时加固了中部和南部的漳沱河北堤和南堤，治理

了漳卫新河、卫运河、卫河等河道。

③自1976年冬至1979年春治理了唐山大地震时震毁的河道和输水干渠，疏浚了清凉江，扩挖了北排河、滏东排河和老沙河。还进行了一些支流的除涝配套工程。

此外，对山区在“大跃进”时期修建的21座大型水库，进行了续建、扩建和加固，提高了这些水库的防洪标准，由原来可防百年、三百年一遇大洪水，分别提高可防五百年、一千年一遇大洪水。这些水库的库容、发电量、灌溉等综合效益也都有增加。与此同时，还增建了滏阳河支流沙河上的朱庄水库，滦河上的潘家口、大黑汀水库，还对沿滏阳河的宁晋泊、大陆泽和沿大清河的白洋淀等滞洪洼淀区进行了整修。

根治海河14年，总共新挖和扩挖34条骨干河道，总长三千七百多公里，修筑防洪大堤四千三百多公里，开挖疏浚了270条支流河道和十五万多条沟渠。在河道上修建了六万多座桥、闸、涵洞。在中上游修建大中小型水库一百七十多座，总库容二万七千多亿立方米。这些工程的建成，改变了过去五大河流汇集天津入海的局面，加大了入海通道，使排洪排涝能力比1963年提高五倍多，比建国前提高10倍。

总之，14年中，按照根治海河统一规划，一条河一条河地治理，一般都是当年施工，当年完成，当年受益。如潮白河在治理前洪峰超过200秒立米就漫溢决口，或向沿河的七里海、大黄庄洼分洪，1972年开挖了潮白新河后，一次上游泄来洪水洪峰达800秒立米得以安全下泄入海。黑龙港系经过治理后，1969年7月下旬有2000平方公里，降雨量超过了20年一遇的标准，暴雨中心区日降雨量420毫米，但淹地减少了80%左右。1972年汛期，地处黑龙港地区的静海县贾口洼，一次上游来水

115秒立米，很快通过扬水站配套工程把积水排出。经过14年的综合治理，海河流域的水利条件，工农业生产，城乡人民生活。都发生很大变化。洪水有了下泄入海口，淤涝有了排水出路。改变了昔日十年九涝，严重时受灾百余县，淹没耕地几千万亩，京津被淹，铁路被冲，房屋倒塌，出现人畜伤亡的悲惨状况。海河流域农田灌溉面积由治理前的2700万亩，增加到4900万亩，盐碱化程度大为降低，盐碱地由治理前的三千多万亩，减到1400万亩，农业产量较前增加了。如黑龙港地区以往历年缺粮，从1953年到1967年，吃国家供应粮食87亿斤，治理后，每年粮食能够自给，甚至自给有余。此外，治理后还解决了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及山区人畜饮水，如1966年兴建了引密云水库入京的引水工程，密云水库之水源源不断输往北京城。同时还引密云、潘家口、大黑汀水库之水供应天津和唐山市的用水。

### 艰苦奋斗 勤俭治水

十几年中，几十万治河大军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治水的精神，严格财务制度，事事处处注意勤俭节约。1965年成立根治海河指挥部，一切因陋就简，办公用具都是从当地机关借用的，架起铺板当办公桌，设计组住的是柳条笆搭的一窝笼工棚，在土墩子上放图板画图。生产队集体出工是义务劳动，民工一人一天完成一个标工只补助4角5分钱。广大民工和干部不计报酬，不辞劳苦，年复一年地在冬春两季农闲时出工，顶风雪冒严寒，用小车推着行李、工具，徒步到工地，完工后再徒步返乡。在工地住的是用竹片、柳笆、苇席搭的工棚，吃的是粗粮，工具是自带的钢锹和小车（手推车或小拉车），工具损坏了自己动手修理（有木工和铁匠炉）。在施工场地对工棚

物料、生产工具注意保管，做到“五不丢”，即不丢一根木头、一条麻绳、一节铁丝、一个铁钉、一块席片和油毡。当时燃料紧缺，炊事员为节省煤炭不怕费心费力，把好坏煤搭配起来烧。后来研究改灶节煤，特别是向人民解放军8777部队学习了“双板双眼回风灶”型新技术，每人每天平均耗煤由二斤多降到1斤以下，全工地一天可节煤30至50万斤，<sup>\*</sup>为数可观。

在施工上坚持自力更生，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厉行节约。1965年，根治海河第一年开挖黑龙港9条河道，国家计划投资1亿元，实际只用了8400万元，经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用节余的1500万元，在子牙新河上修建了一座2公里长的津浦铁路大桥，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扬。在施工中，常常遇到芦苇塘、沼泽地、淤泥、流沙、疆石猴、狗头胶土、贝壳等难工，治河大军群策群力一个个地去攻克。1971年冬和1972年春开挖潮白新河，天津专区五万多民工在宁河县境内七里海洼淀里开新河，遇到一米多深盘根错节的芦苇根，挖不动，扯不断。文安县民工还遇到二百二十多米长、八十多米宽、二米多深密密实实坚硬锋利的牡蛎层，每个牡蛎有六七斤重，象尖刀一样竖立着，锹挖、手刨都弄不动，而且脚被扎，手磨破。他们想方设法战胜困难，在牡蛎上面垫上木板或铁板，蹬在上面用钢钎铤、钢镐刨，一个个地往下弄，经过半个多月的顽强战斗，才挖出了这段河道。1970年冬至1971年春开挖永定新河，既遇到芦苇塘，沼泽地，又是在海边上施工，没有道路，没有一片干燥地，几万民工肩扛手抬把一辆辆小车和工具，一件件工棚物料运到施工现场，吃、住在那里。黄骅县三千多民工在挖一段新河套旧河时，碰到旧河淤泥六米多深，用锹挖不出，手捧不住，铁桶淘出来往下流放不住的难工，民工们都主动出

谋划策。他们先挖好挖的河段，把有淤泥的河段放到封冻季节施工。民工们一块块地挖冻泥，双手连冻带震，道道血口染红了锤把，硬是不喊疼不叫苦，挖出六万多立米淤泥，打通了河道。

### 团结协作 一心治河

在施工中，广大民工和干部、各地群众团结协作，相互支援，抢困难让方便的共产主义精神蔚然成风。每逢几十万治河大军转战南北，手推小车徒步进场和退场，沿途几百里的所有机关、学校和村庄都设置了接待站、点，烧水煮饭，安排住宿，关怀备至。群众象接待亲朋好友一样，自动把新房热炕腾出来让民工住。治河大军在哪里挖河，当地的商业、物资、银行、邮电、粮食等部门就服务到哪里，在施工现场搭棚设站、点，开办门市部，组织物资供应。按照治理规划，需要搬迁一些村庄、房屋、树木、砖窑、水井、坟墓等，有关党政机关在事先向群众做好动员工作，并妥善安置，给施工创造良好条件。十几年中，先后搬迁497个村庄（其中185个村全部迁移），四万二千多户，二十多万人，拆房二十多万间，占地三十多万亩，都做了安置。在搬迁中，群众都积极主动配合，保证顺利施工。挖子牙新河时，有一段河道原定通过青县四窝头村，设计与施工部门为了尽量避开迁村，想让河道转个小弯绕过去，村里的干部群众知道后，专门开会讨论，大家说：“河道弯弯曲曲，不仅挖河费工，而且还会影响行洪，应该看长远顾大局，还是迁村让路。”后来设计人员考虑搬迁一个村投资大，困难多，同时河道弯斜点也有缓泄的好处，仍决定绕村挖河。

治河施工任务按照参加单位的人数分配，由于民工身体强

弱、工具好差、工程难易不同，常常出现施工进度快慢不一的情况，这时，大家总是强帮弱，快帮慢，一个单位完不成任务，多方去支援，他们说：“同挖一条河，一个单位完成任务只能挖个坑，各个单位都完成任务，才能挖成河。”1970年开挖永定新河，确定由河北省、天津市共同承担，要求冬春两季完成，时间紧任务重，两个省市都抢挑重担。河北省把挖河筑堤95公里的任务全部承担起来，天津市除承担大部桥梁，涵洞工程的施工任务外，还担负数万民工的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工作。

1971年冬到1972年春，河北、山东两省出动34万民工并肩战斗，开挖漳卫新河，山东省乐陵县的民工排水队，战严寒破冰冻，奋战20天，在完成20华里长的河道施工段内72万立方米积水排干任务后，又帮助河北省沧州、衡水县的民工团，排除积水四百多万立方米，使施工任务全面顺利完成。在“文革”年代，保定地区所承担的扩挖独流减河一百二十多万立方米的土方任务，未能彻底完成，天津地区的4万多民工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冒着酷暑，把工棚物料和锅灶转移到保定地区的施工段上，连续大干20天，帮助完成了任务，使全河道畅通无阻。

### 科学施工 保证质量

在根治海河实践中，开始几年只靠“人海战术”拚体力，使用古老简陋的工具施工，费工费力，投资大，效率低。鉴于这种情况，负责组织指挥施工的各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研究制定了一些办法，如施工任务层层落实，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地区根据省指挥部分配的施工任务下达到县团，

县团分配到公社（连队）。连队负责组织具体施工；县团负责组织协调各连队之间的进度平衡，落实统一计划要求和连队完成任务的验收工作；地区负责检查指导各县团的施工和竣工后的验收工作。

在施工方法上，以连队为基层施工单位，再分几个战斗组，每组分一段，各把各的段进行施工。组与组之间互相帮助，使整个连队进度平衡。在施工中，还根据不同情况，组织发动工程技术人员与民工共同研究科学施工方法。1968年开挖濠阳新河时，普遍遇到了流沙层，照旧的施工方法，河槽挖不成。天津地区大城县团领导干部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出谋划策，采取浅挖（一次挖1米左右）、勤挖、宽挖、快挖，挖双排水沟的办法，战胜了流沙，挖成了河道。邢台地区清河县民工团在治理大清河时，旧河槽开挖一尺多深，地下水就冒了出来，工地一片泥泞，一个人推的小车，三四个小伙子都弄不转，严重影响施工。人称“治河能手”的侯臣明，边干边琢磨、边与人商量，边实践试验，终于创出了“分层取土，滚沟铲坡一手清”的施工法，保证了干场（没有渗水和泥浆）作业，加快了进度。

1971年春，李先念副总理到开挖永定新河工地视察，看了天津专区民工负责施工的潮白新河入永定河出口的防潮闸和大城县民工团挖永定新河工地采取“开大蹬，放缓坡一手清”的施工方法，又听了介绍，高兴地指出：施工要讲科学，科学施工能减轻体力劳动，提高工效，保证工程质量，要好好地搞。之后，海河工地掀起了研究科学施工的热潮，工效大大提高，如每当挖河筑堤时要爬一二十米的高坡，起初都是一人推，两三个人在前边拉着小车往上爬，既笨重工效又低；经过工程技



术人员和民工反复研究试验，搞成了滑车拉坡操作法，比光靠人力提高了工效。以后又进一步研究出用柴油机做动力，搞成牵引拉坡机，只要把小车上的铁钩挂在钢丝绳上，即可连车带人拉上坡去。民工们形容说：“过去推土爬坡如上山，心跳腿软一身汗，身体不壮不能干。如今推土爬坡象下山，省劲省力跑得欢，身体强弱都能干，施工任务提前完。”从此以后，全工地基本实现拉坡机械化。1969年扩挖赵王新渠时，由于河深坡陡，推土车往河下去取土，推车的人常常因控制不住被车带倒在地，有时又因用力控制，把脚、腿都蹲肿了。后来大家想出办法，以自行车安闸的原理，把小推车安装了不同类型的手闸，在闯下坡时用手闸控制往速度，既安全又省力，保证了施工。

在施工生产工具方面，开始使用的大都是古老简陋的工具，如运土用的布兜子、荆条篮子、筐子，只能肩挑，人抬或人背，很不适应大规模治河的需要。指挥部号召广大干部、民工动脑筋想办法进行工具改革。先是有的把原来的布兜子改成了荆条篮子、筐，原来用篮子、筐子的改成手推车。后来都逐渐改成了手推车、小拉车，而且改为胶皮轱辘。过去挑两筐土才几十斤重，现在推一车土二百斤左右，再加上多跑路多运土，提高工效两倍多。还有爬坡时由原来人拉改为柴油机牵引拉坡；挖河排水，由原来人工淘，小水泵吸，改为成套的机械排水泵、有的国家工程队还使用挖土机挖河、喷泥船清淤河口等。至于各种水利建筑物工程的施工，由于大部分都是国家工程队承建，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就更多些。

根治海河关系到造福人民千秋百代的大业，广大民工在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思想，不

管挖河、筑堤，还是修桥、建闸涵，修水库，都是“宁做一百一，不做九十九”，千方百计保证工程质量。过去挖河、筑堤，只要把河道挖出来，河土扔到河岸就完了。但在根治海河工程上却是牢记洪水灾害往往出于千里之堤溃于一穴的教训，一丝不苟地按照工程设计标准进行施工。在筑造防洪大堤时，首先把筑堤基础的原有土料一般挖10公分深清理出来，遇到坟墓、水井、旧渠沟子和坑塘要清除到实底，用好土回填并夯实处理，经验收合格后，才能放土筑堤。筑堤时，上堤土料含水量有严格标准，如果含水量过大，要晾晒合格后再上堤，含水量过低，要引水润湿达到合格标准才能用。筑堤每层土铺的厚度严格掌握在不超过35公分，淤泥、树根，砖瓦等杂质土不准用，并铺一层碾压一层，要用3.5吨的平角碾碾压三遍，压到边，压好结合部，不漏压、少压，直到达到设计的高度和宽度。筑堤还要把粘土筑在迎水坡和大堤封顶上，以保证大堤的坚固性。每二三十米长堤段设有一个质量控制员，监督上土和负责平整地面，确保工程质量。最终达到“六成”高标准：

1. 河成。按设计达到河道断面够宽、够深，底平坡顺，边口整齐，弯道圆滑，河底没界墩、垃圾。
2. 堤成。筑起的大堤够宽、够高，堤顶平、光、硬。
3. 田成。挖河的土除用于筑堤外，大量弃土按照要求放到堤外，做到地面平整，边线整齐，能耕种和植树造林。
4. 林成。在筑起的大堤上栽种各种林木。
5. 桥成。新治理的河道需要架设桥梁的都修了桥，以利交通。
6. 路成。凡筑起的大堤都筑成公路，上下大堤的重要道口都有人行道和车辆道，做到条条相通。

“六成”开创了河道竣工验收的新标准，成为治河工程的典范。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挖河弃土占耕地，筑堤取土满地坑，河成路断不通

行的状况，深得群众拥护称赞。

根治海河十四春，治河大军改造河川不畏难，日行百里路，堆土重万斤，挖成了一条条新河道，筑起一道道坚实的防洪大堤，建造了一座座闸、涵、水库和桥梁，业绩丰伟，壮举空前。

### 金溪河大桥修复记

金溪河大桥位于北塘与茶淀之间，是连接我国南北铁路的重要桥梁，1948年底1949年初，国民党在溃逃时，用地雷将此桥炸断了，一跨钢梁沉到金溪河底。为了尽快沟通华北与东北地区的联系，有关部门决定修复金溪河大桥。1949年8月23日，平津铁路局派人找到小码头船厂，请求该厂承接打捞和修复工程。在此之前，苏联专家们曾勘察过被毁坏的大桥，提出了毁旧桥建新桥的方案，按此方案，京山铁路线起码得两年才能通车。小码头船厂的工人们急新中国经济建设之所急，主动将任务接了下来。1949年9月26日，以穆瑞堂、胡德友为首的百余名工人来到了大桥工地。修复金溪河大桥的第一期工程是打捞沉到河底的重280吨的钢梁，工人们先将两条拖轮分布在桥梁架两侧进行起浮，把一条油船灌满水沉到桥梁架的底部承拖，利用涨潮的时机，终于将桥梁架拖出了水面。接着，又在油船船尾填压了70吨石料，使船头翘起，逐渐将桥梁架拖举起来，随后又完成了桥梁的翻身复位工作。经过44个日夜的苦战，金溪河大桥于1949年11月8日竣工通车，这个速度比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提前了22个月。翌年，这一工程的主要负责人穆瑞堂同志被评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

新宣

# 我所知道的道清铁路

张冲霄

道清铁路是英商福公司为了运输焦作煤矿的煤而修筑的，它建于1903年，由道口至清化全长约150公里。

我曾于1933年10月到焦作，直至1938年2月焦作沦陷方离去。在此期间，我曾任道清铁路运输课长、总务处长、代理局长及平汉铁路局道清支线车务段段长等职。因此，对道清铁路及福公司的往事知道一些，对福公司指使其代理人中福公司禁止道清铁路运输小窑煤一事印象尤深，感慨亦多。我愿将事实经过叙述出来，藉以引起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警惕。

## 一、道清铁路及沿途煤矿的情况

在道清铁路西段，太行山南麓，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纪无烟煤，煤质坚硬、耐火力强、杂质少、灰分低，宜于民用，有开采价值。截至1930年初，在这个地方开采煤矿的企业有：英国垄断的福公司，官僚资本的中原煤矿公司及民族资本的小窑群。这三种企业各有各的发展过程，彼此之间有斗争，亦有合作。它们之间的斗争或合作，都要通过道清铁路的运输来进行，其中福公司与道清铁路的关系尤为复杂，现叙述如下：

### ①福公司

英商福公司是英国对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企业组织。它的经营发展活动，概不遵循企业常规，而是一贯通过外交上的威胁利诱而进行的。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福公司以先行买通豫丰公司然后再由双方签订合同的办法，骗取到河南焦作煤矿的开采权。

1897年，意大利人罗柴代表福公司挟重资来华，设办事处于北京，依马中贵<sup>①</sup>与清朝官员相交往。1898年福公司买通滇人吴式钊和皖人程思培，在河南设立了豫丰公司。同年6月，罗柴代表福公司与吴、程二人签订了焦作开矿合同。7月，福公司贷款给山西矿务局，从而攫取了泽州（即今晋城）潞安（即今长治）、平安及孟县等处的煤铁开采权。1900年福公司取得了焦作开矿执照，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建矿工作暂告中止。1902年福公司在焦作附近的“白作”建立起“泽煤盛矿”根据地。1906年泽煤盛矿四号井出煤，但因井下地质复杂，水势过大（每分钟达20吨），因而成本高，利润不丰，于是福公司又由原矿区分向东西两侧大行侵展，面积数倍于原矿区。这种公然的侵略行径遇到全省人民的一致反对，所以未能领取执照。迨至1914年，北洋政府河南都督张镇芳派河南省交涉员许沅、河南省代表胡石青、王抟沙赴京与福公司代表交涉，签订了草合同四十三条。据此福公司获得了开封新矿区的开采权。

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吴光荣等六人由上海来到焦作矿区策动反英。焦作矿务局大学（即后来的焦作工学院）

---

①马中贵曾任中国驻伦敦使馆秘书。

的学生周福元等亦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先从福公司的厨师入手，逐步串连扩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矿大罢工。福公司千方百计地向省政府谋求复工，河南的官吏慑我舆论，未敢应允。1929年，福公司又向国民政府提出复工的要求。河南人民闻此，马上推举代表赴南京，进行反击。到1930年，福公司的情形是：继续停产，倒而未死。

### ②中原煤矿公司

1915年，焦作东边李河的三个小煤窑联合起来，后又加入一部分民族资本，组成了中原煤矿公司。该公司聘请了技术人员，增添了机器设备，制定了生产管理制度，基本上成为机械化生产的新式煤矿。它以民族资本企业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受到爱国人士的欢迎和河南地方官员的注意。

在福公司罢工停产时，中原煤矿公司积极声援反复工活动，并安置了一部分因罢工而失业的职工。在此期间，中原煤矿公司逐渐得到发展，但股票亦为官僚政客所掌握，它的民族资本性质已蜕化为官僚资本了。

### ③福中总公司

中原煤矿公司成立之后，使福公司的独家垄断地位受到威胁。福公司为了避免和中原煤矿公司竞争，博取厚利，两家经过协商，决定进行合作。1915年两家联合组成了“福中总公司”，资本100万元，具体的合作办法为“分产合销制”，即“福中总公司”为合销机构，但双方仍保持各自独立的生产。

#### ④中福公司

1931年福公司仍在停产，“福中总公司”徒有虚名，中原煤矿公司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委其江西同乡、省财政厅长李文浩充任监督。李上任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对各方的举荐，来者不拒，从而使公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加之他好大喜功，做了一些与生产无关的“豪举”，弄得入不敷出，常常因为付不起道清铁路的运费而被中止产品的运输，使销售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李文浩于山穷水尽之际，不惜饮鸩止渴，向福公司伸手求援，商请借款。福公司趁机要挟，以福公司复工及两公司合作为贷款条件。福公司经过一番幕后活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利用外资”为名，同意了福公司的复工请求。这使数以千计的福公司职工忍饥受冻，坚持7年之久的大罢工归于瓦解。同时，模仿开滦矿务局的例子，中原煤矿公司与福公司联合组成“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简称中福公司），将以前的“分产合销”方式，改为合产合销，由中福公司来总理两公司的产销业务，以中方代表为总理，福方代表为总代表，共负业务上的实际责任。中福公司成立后，李文浩出任第一任总经理。

#### ⑤小窑群

小窑群分布于焦作以西常口、柏山一带。这些小窑在横的方面没有同业间的共同组织，纵的方面没有统辖的上级机构。窑主大多是本地的地主或富农，他们有的在自己田里开采，有的租地开采，或独资，或合股，情况不一。窑上的工人大多是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一小部分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是被官

方或仇人迫害，到此避难的“捕客”。此外本地的一些农民农闲便来，农忙即走。1925年以后，福公司部分失业职工相继投身小窑。小窑的生产方式是祖辈传下来的土法，劳动强度大，没有保险设备，故伤亡事故频频发生。产量季节性很强，冬春产量大，夏秋则小，遇炎热或大雨天气亦要减产。产品除了一部分就地销售外，还批发煤贩子外运给福公司和中原煤矿公司（它们在通都大邑自设机构经营或有特约代理店）。这些小窑自生自灭，究竟有多少，没人统计，亦无人管理。

## ⑥道清铁路

福公司于1902年在焦作附近的白作建立了泽煤盛矿根据地后，紧接着又着手修建运煤的泽道铁路（由山西泽州至河南道口）。1903年开工，由道口站的三里湾码头（濒临卫河，水运可达天津）起，向西延伸，到1905年，铁路已由道口筑至清化附近。福公司本可以大赚其钱了，詎料泽煤盛矿开办4年，花掉银两百余万，矿井深达六十余丈，还未出煤，所以铁路没有营业收入，却得支付大笔养路费。同时由于铁路沿线农业落后，又无其他工业，就是有煤可运也不能获大利，远景并不乐观。因此，福公司便商请英公使要求清政府将泽道铁路收赎自办，以建筑费作为收赎借款。清政府初予拒绝，后经英公使再三交涉，始派詹天佑前往查帐看工。时已成之路，仅道口至清化（后改博爱县）150公里（实际则只到柏山，距清化尚有4.54公里），名为泽道，实乃道清。双方最后议妥中国息借70万英镑。1905年由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福公司代表哲美森在北京签订了《道清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又《行车合同》及《拟设山西镕化厂并办孟、平、潞、泽矿务合同》四款，道清



铁路遂成为中国国有铁路。随后，继续完成了柏山至清化工程，展筑了清化至陈庄一段，又由游家坟通往新乡新站以与京汉铁路连轨，兼建管理局于焦作。根据《行车合同》规定，管理局各主管处的领导人，仍由英国人充任（称为洋总管），掌握实权，中国人作局长形同傀儡。这种畸形局面，经过十余年才得以扭转。

1906年至1915年，道清铁路以运输福公司的泽煤盛矿的煤为主，同时兼运小窑煤。李河、常口、柏山等地小窑煤的托运量较之福公司微不足道。1915年李河的中原煤矿公司成立，产量大增。不久，中原公司与福公司以分产合销的方式进行了合作。自开封新矿投产后，福公司在运量上较之中原煤矿公司仍占有绝对优势。此后，道清铁路的运输业务伴随着两公司的发展而发展，运营收入逐年增加。1915年为63万元，1920年120万元，1925年增至220万元，成为道清历史上的最高峰。就在这一年，福公司因罢工而停产。

从1925年至1930年的5年间，道清铁路因失去了福公司这个大货源，营业突趋萎缩。幸而中原煤矿公司和小窑群因福公司的罢工停产而有所发展，这样才使道清铁路营业得以维持。由于军阀混战，河南成了众雄纷争之地，道清铁路落到韩复榘手里。韩派李无尘为道清铁路局长（1929年10月至1930年4月），扣留了大部分车辆作军用。中原煤矿公司和小窑群的煤运出现紧张。不过道清铁路对他们同等对待，照章配拨列车，并没有厚此薄彼的现象。

## 二、道清铁路运输小窑煤的演变

### 1、中原煤矿公司贿买道清路限运小窑煤

1930年4月以后，道清铁路对中原煤矿公司和小窑群的态度有了变化。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了，中原大战前夕，部队调动频繁，道清铁路的车辆绝大部分拨归军运，商运几陷停顿。这时南京铁道部对道清铁路局已失去控制，局长一席由韩复榘与石友三私相授受，韩派的李无尘便由石派的于升龙替代。于升龙上任后，委赵某（名不详）为车务处长。中原煤矿公司的运输科长吴荣廷串通道清铁路的运输课长曹世勋，贿买于升龙和赵某对常口、柏山小窑煤的运输加以限制。事涉秘密，具体情况外人无从知晓，但人们可以看到道清铁路配拨给小窑运煤的车辆大大减少了。一来于、赵二人有石友三撑腰，二来小窑群中的各个小窑都是自顾自，不会作联合的反抗，因此这种限运没有遭到任何反对。阎、冯在中原大战中战败后，于升龙和赵某树倒猢猻散，饱载宦囊而去。倒霉的还是道清铁路局，它的车辆被西北军拖走了一大半——原有车辆吨位共计10468吨，到此时剩下的不到5000吨。

1930年12月，周庆满奉铁道部的命令充任道清铁路局长，不久，河南省财政厅长李文浩奉命到焦作出任中原煤矿公司监督。李文浩凭藉着后台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势力，又通过吴荣廷和曹世勋的奔走，轻车熟路地将周贿买下来，继续限制小窑煤的运输。至于限制条件则更加苛刻，最后竟公然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①小窑群的煤只能按零吨托运，即使托运量达到

整车，亦按零吨计算运费。②不得托运至陈庄（防止其销行于怀庆）、新乡新站（即平汉与道清两路连轨站，平汉称为新乡站，以防其转销平汉沿线）及三里湾（即道口站码头，以防止其利用水运下销临清、德州、沧州、天津等地）。③不办理联运。不过上述这三项均为口头默契，道清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车务段均无案可稽。这样一来，小窑只能少量地运销于道清铁路沿线的偏僻小县和荒凉的农村，而且还要交付远远高于中原煤矿公司的运费。这种对托运人的限制，中外铁路史上绝无仅有。执行这种限制的直接负责人是运输课长曹世勋。从此小窑煤再无整列车的运输，仅能在客货混合列车上附挂几个煤车，每日平均不过80至100吨。在中原煤矿公司方面则无限制地浪费车辆。即使中原煤矿公司因为产量少或现金缺乏付不出运费时，停止托运，闲置车辆也绝不设法转拨小窑使用。遇到运煤列车停驶过久，收入锐减时，周庆满或曹世勋便亲到中原煤矿公司请求赏给些煤运，以应付职工开支。道清铁路局已为中原煤矿公司所控制，无形中变为中原煤矿公司的附属。

## 2、废除对小窑煤的限运

1932年4月，范予遂继周庆满为道清铁路局长。中福公司总经理李文浩，在范上任伊始，趁着中福公司刚组建，内部混乱，中原煤矿公司有人反对与福公司合作的机会，策动中原煤矿公司私立小学校学生游行示威，卧轨拦车，并高呼口号：“反对运福公司的煤！”“反对运小窑的煤！”这一举动给了范予遂一个下马威。接着李文浩又翻过来对范予遂行贿收买。李文浩的秘书与道清铁路的总务处长王复初是同学。李文浩派他对王复初表示，过去中福公司每月赠送道清铁路局2000元，希望

范局长“率由旧章”地接受。范拒绝了，李文浩不肯就此罢手，他转而遣人拉拢道清铁路车务处长霍秉珩。霍被拉下水，并慨然应允向范予遂疏通。出乎他的意料，疏通未果，反而受了个撤职的处分。经过几个回合，范予遂有了警惕。然道清铁路对于运输小窑煤的限制，一如周庆满在任时，其主要原因不外以下三点：①范予遂系山东人，因与铁道部长顾孟余同为改组派而任道清铁路局长，他并不是铁路内行。因为对铁路运输业务不熟悉，抓不着问题的关键，不敢草率从事。②各主管处的领导不合作。③最主要的是运输课长曹世勋在猖狂活动。曹世勋外挟中福公司以自重，在道清车务处以拜把子的方式联络处内外的职员，掌握了宜兴帮（当时道清铁路各大站站长多为宜兴人，人们称之为“宜兴帮”）。他还一手控制了车辆的支配和行车的调度。车务处长刘锦章原为中东铁路老手，因新来道清，对情况不熟悉，对曹世勋的专横自恣无可奈何。业务课长高之仰系北京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科毕业的老铁路，业务熟练，但性情拘谨，耻与曹为伍。在这种环境中，曹世勋就越发自鸣得意为所欲为，一意坚持对小窑煤的限制。这些原因使范不敢贸然取消对小窑煤的限运。

道清铁路局终于将曹世勋开除路籍，所遗运输课长，由铁道部派我充任。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我是津浦铁路老人，且与高之仰有同学关系的缘故吧。1933年10月初我到了焦作，那时道清铁路各主管处有从北京、唐山、上海、东北各交通大学毕业的年轻实习生、技术员十五六人，他们对限运小窑煤意见很大，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并提了不少建议。不久，运输课便提出“加强调度股”（由一人增至六人，分三班昼夜轮值每班配备一名交大实习生）及“废除限运小窑煤”的计划。这两个

计划很快得到车务处、管理局的同意，废除限运小窑煤计划，实际上是应付中福公司，使它不能妄加干涉的计划。在策略上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办法；在进程上则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先虚声宣传开放小窑煤运而不立即实行，以诱使中福公司大量要车。第二步，以大量列车拨送中福公司矿场，催促其照规定时数装车。第三步，待中福公司产量不继，无煤可装时，空车不即外调，但须催其照章交纳延期费。最后，待拨送中福矿场的列车延期十日未装，将列车转拨小窑。这样开放小窑煤运以废除对它的限制，就使得中福公司无话可说，不能妄加干涉。在准备了一段时间后，车辆周转时间大大缩短。与此同时，又从铁道部接收了四列货车，从而使运输能力大增，每日承运吨数远远超过中福公司的每日托运吨量。到1933年11月底，道清铁路有了充分的把握，便将拟定计划付诸实施。

1933年道清铁路运营情况较好，除了一切开支及年终奖外，尚有盈余。到1934年上半年由于废除了对小窑煤运的限制，收入增加，范予遂便与福公司驻焦作的负责人商妥，筹还了福公司部分道清铁路的借款，这一招使得福公司股票在伦敦起了一阵涨风。范予遂的本意，是以此作台阶，再商请福公司投资展筑道清铁路，不过英国人并未理睬。

在1934年全年度内，道清铁路共运小窑煤约8万吨左右。这一批煤运费的收入是不小的收获，更主要的是摆脱了中福公司对它的控制，并纠正了中福公司不遵守铁路制度，故意拖延装卸时间的恶习，在全线范围内大大提高了机车、车辆的周转率，这就为保证实现中福公司1935年运煤100万吨的计划打下了基础。

### 3、中福公司对道清铁路的抗议

在小窑煤开放以后，中福公司不断派代表业务科副科长惠尔恭到道清铁路运输课提出抗议。惠尔恭所持的主要理由无非是，道清铁路与福公司有借款关系，在借款未还清以前，道清机车车辆的运用，福公司有权过问。现在福公司既已与中原煤矿公司合组为中福公司，中福公司就可以代表福公司抗议道清铁路对小窑煤的开放。另外小窑煤的开采，未经政府许可，没有矿照，是非法的。且有一部分小窑距离福公司矿场太近，小窑的地下水渗入福公司井下，而由福公司代为排出，有损福公司的利益。道清铁路为小窑运煤，无异于给福公司树敌。我驳斥他说：“关于第一点，请回去查一查1905年《道清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抗议是绝对没有根据的。道清铁路现在运行的车辆中有四辆是铁道部最近配拨来的，与道清铁路借款无关。道清铁路配拨车辆，一向尽先供应中福公司。中福公司无煤可装不能利用时才转拨给小窑，道清铁路对于中福公司实属格外优待。第二点，常口小窑中的民有公司就持有南京实业部的矿照（民有公司为1932年至1933年间由常姓小窑改组成立的，设有两三架绞车，在小窑群中日产量居首位），曾交道清铁路验看。中福公司认为小窑不合法可向主管部门或法院起诉，与道清铁路不相干。小窑煤是生活必需品而非违禁品，只要照章托运，道清铁路便有承运的义务，拒运是违法。此外，小窑是将本求利的正当营业，有好多人都靠它生活，它和中福公司一样是道清铁路的经常主顾。中福公司因为成本高于小窑，既然在市场上竞争不过对手，那么就应当走另一条协商两利的路，诸如实行分产合销、统一价格、划分市场或

由中福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小窑产品转运销等等，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我感到中福公司自己隐在幕后，不肯与小窑当面商谈，是企图以道清铁路为枪，以禁运小窑煤为弹，谋杀小窑。

### 三、蒋介石陷小窑于绝境

#### 1、道清路局长和福公司董事长的舌战

中福公司经整顿后，与道清铁路的关系有了好转，但在路矿合作，实行1935年100万吨运输的时候，关于小窑煤运输问题的斗争仍在不断进行。双方下级对下级，上级对上级，分两个战场进行舌战，在下级方面中福公司以业务科长都樾周为代表，道清铁路运转课以我和以后的张心田为代表，双方经常进行谈判。都樾周坦率地表示：“中福的发展，有赖于道清的合作，道清的前途则系于中福，中福有了发展而后道清才能发展。小窑是土包子，没有前途，且有碍中福的发展。希望道清为了自身，为了中福，对小窑煤予以拒运。”我答复他亦很明白：“完全同意路矿双方通力合作共谋发展的说法，而且道清正在积极地这样做。拒运小窑煤是违反铁路规章的，运转课或运输处实在不能专主。还有一点，道清除了保证实现中福全年100万吨运输计划以外，仍有多余的车辆，不能任其停空不用。”各持己见，无法解决。

在上级方面，自翁文灏到焦作以后，翁本人、中福公司总代表贝尔和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就一致向道清铁路局长范予遂提出拒运小窑煤的要求。他们多次到道清铁路局交涉，有

时翁自来，有时吴德罗夫或贝尔来。范予遂坚持：拒运小窑煤，无法律根据，但保证尽力支持中福，按中福的运输计划，能托运多少就运多少，绝不积压。以余下的车供给小窑，最多每月不超过一列车（500吨）。中福公司对此颇为不满，仍继续来谈。有一次吴德罗夫相逼过甚，范不得已，问他：“贵国是否有这种法律，一个铁路局可以任意拒绝承运某一个煤矿的煤？”弄得他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便拿出法宝“蒋委员长”来，一面威胁一面搪塞，最后不欢而散。但无尽无休的交涉，仍在不断地进行。范予遂无可奈何地答复说：“请向铁道部交涉，部方有指示，铁路局当然照办。”中福公司无论如何不愿找铁道部，又一再强调说：“这是蒋委员长的意见。”范就回击说：“那就请蒋委员长来电，让道清铁路拒运小窑煤，铁路局也照办。”

当时道清铁路各级领导如局长、运输处长、运转课长，上下一致，采取坚决支持小窑的立场，摆脱中福公司对道清铁路的控制，以发展营业，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为全路职工争取更多的年终奖金，同时亦可以在铁路范围树立声誉。

## 2、蒋介石的密电

1935年的3、4月间，道清铁路局接到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发来的一件密电，电文的大意是，政府锐意整理中福，有关国际信誉，道清局务须在运输上大力支持中福。文末有个“秘”字。明着，冠冕堂皇地支持中福；暗里，却鬼鬼祟祟地示意打击小窑。道清路局看穿了这一点，就以“奉命唯谨”的口吻，电复称：“对于中福煤运，保证大力支持，随产随运，绝不积压。”而对小窑煤问题，则只字不提，以自留余地。时隔不



久，武汉“四省剿匪总部”也来了一件密电，内容略同于前件。道清铁路照抄老法，应付过去。不过，道清路局渐渐感到压力的沉重，因为河南在“四省”范围之内，道清铁路已处于现官现管之下！此后就以更多的车皮供给中福，演成供过于求的现象，所以仍然名正言顺地以剩余车皮转给小窑。

同年6月前后，铁道部拍给道清路局一件机密电报，略谓：“奉委座电：道清路运输小窑煤，影响中福，仰转飭该局务倾全力供应中福等因。合仰妥拟办法……”铁道部对此非法乱命既不能抗不执行，又不能明令道清公然犯法。它采取滑头手段，一面电复蒋遵办，一面转令道清路局妥拟办法，为道清留有回旋余地。道清路局将铁道部电文，节略地通知中福公司。翁文灏在同年7月份的北京《独立评论》上的《整顿内政的途径》一文中，曾对此事隐约地有所评论。原文略谓：“要有切实严正的管理。我新近有一个经验，有某上级长官令行某机关转令其所属某局长办理某事，某机关当即电复谓已电令遵办，但令其某局长文内则说仰即妥拟办法。如此做法，在公事上实为显明的一种犯罪。”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都不了解文中所指的事实，但道清铁路的同仁们心里则是很明白的。

### 3、道清铁路局的建议

道清铁路局接到铁道部的机密电文后，认为事态严重，发展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同时还认为铁道部夹在中间徒增周折，不起作用，而且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与道清铁路有直接行文的先例，便拟出解决办法作为建议，直接答复了南京军事委员会，并抄报铁道部，其主要内容有五点：①道清铁路的立场问题。道清铁路是国有铁路，小窑作为货主，按照铁道部颁布

的国有铁路规章托运煤炭，道清铁路有承运的义务，拒运就是违章，也就是犯法。②中福公司和小窑间的问题，是同行间的竞争，道清铁路无权过问。③道清铁路与中福公司间的问题。道清铁路对中福公司的托运，一向尽量优先拨车。现在道清铁路每日的运输吨量，超过了中福公司每日的生产吨量，道清铁路便以中福用不着的多余车辆，转拨小窑，对此中福公司表示不满，但道清不能将多余车辆停驶闲置起来，造成不应有的浪费。④关于解决中福公司和小窑煤纠纷的建议。道清铁路局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由中福公司和小窑双方协议制定出一种两利的办法。根据小窑平均产量由中福公司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转手运销，两得其利。⑤以上协议办法，道清曾向中福具体地提过，但未被采纳，究竟如何解决，请核夺。这个在当时看来尚属公允，而后来产生恶果的建议文件，是由我写提纲，文书课长葛先植起草，秘书李子刚润色，局长范予遂核准发出的。

#### 4、常口小窑被骗

1935年8月，军事委员会根据道清铁路的建议，定出了解决小窑煤的办法，第一，小窑产品由中福公司会同小窑进行协商，根据小窑平均日产量，订出公平合理的价格，交由中福公司收购。第二，双方协定签字之后，道清铁路即不得再运小窑产品。这一套有关铁路运输的奇特办法，既然由军事委员会抛开铁道部定了出来，那么道清亦只好等中福公司与小窑协议签字后再实行。中福公司在很长时间内找不到交涉对象，最后由民有公司代表常口小窑与中福公司进行会商达成协议。其详情不尽悉，只知锅炉砑（即3号砑，中福有一定规格，由3至4

英寸大小)的价格,每吨6元,按市价说不低,小窑无甚意见。1935年10月,民有公司负责人来到道清路局诉苦,请求主持公道,他说:“常口小窑受了骗。货价定的是不低,可中福公司收购货要求高,只收块煤,不收末煤,每月实际收购星星点点,不及产量的十分之一。”道清铁路局表示,铁路局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去找中福公司或军事委员会。至于柏山方面,只可暂拨零车,维持几时算几时。从此,常口小窑便坠入陷阱,不死不活,柏山小窑有常口小窑前车之鉴,避不与中福公司接触,只得装运零车,不敢再要整列车,去捋中福公司的虎须了。

#### 四、道清铁路局的撤销

##### 1、撤销铁路局的内因与外因

道清铁路全长166公里,只相当平汉铁路的 $1/8$ ,年度营业总收入最高不过220万元。规模这么小的铁路亦设管理局,就使它的非生产性支出占了很大的比例,造成极不合理的浪费。这是该局被撤销的主要内因。这种不合理的畸形组织,实乃该路向英商福公司借款的历史所致。自1933年末起,该局为了开展业务,开始运输小窑煤,触犯了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福公司的利益,遂被撤销,合并到平汉铁路,这是该局被撤销的外因。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道清铁路局局长范予遂以中委资格,在9月初即赶赴南京。11月1日,改组派头子、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开幕后照像时被刺,身中两枪未死,但已不能主事。改组派头子纷纷自谋出路。范予遂见机,即辞

去道清铁路局长职务。随后顾孟余以铁道部名义派其赴欧洲考察铁路业务。所遗局长缺，另以部令派我代理。范出国之事，办得极为秘密，道清职工知者无几。迨报纸披露汪记行政院垮台，换成蒋记，政学系张嘉璈继任铁道部长，中福公司整理专员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之后，道清职工根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历史规律，推测改组派在道清路的江山为日不多了，但还未料到管理局会被撤销。

张嘉璈于1935年12月初到铁道部接事后，即收到财政部长孔祥熙转来英国顾问的一份视察报告。这位顾问，名汉猛德，是国民政府在计划实行法币时，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从英国聘请来的。他属于国民政府而不是铁道部。报告是汉猛德视察了中国铁路后提出的。报告中力言中国铁路在管理上组织庞大，短短的166公里的铁路也设管理局，建议裁并铁路局，分区管理，以节糜费。孔祥熙将此报告转交铁道部，要求采纳实行。这一消息，为平汉铁路局长陈延炯所探悉。陈与张嘉璈同为政学系人物，他早有吞并道清铁路的野心，而且在地理条件上，道清与平汉十字相交，平汉合并道清亦属顺理成章。于是张嘉璈便大题小做，偷天换日地将道清铁路管理局撤销，合并于平汉。而将全面统筹裁并路局，分区管理的重大问题，束之高阁，不闻不问了。

## 2、道清铁路局撤销前后

1935年12月上旬，铁道部电道清铁路局谓：“道清铁路管理局着即撤销，业务归平汉路局接管，派邹安众前往接收。”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体职工，因为事出突然，大家既愤慨又恐慌。工会理事王登甲等首先出头提出要求：发给1935年年终奖金，

发还职工历年来逐月交纳的储蓄金，发还贩卖部（这是由职工集股，由路局派员经营的福利机构）职工股本，不得随便裁人，保留医疗卫生及职工夜宵等福利措施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无法处理，遂一面通知各单位准备移交，同时电铁道部催饬平汉路局前来接管。12月27日，平汉路局副局长邹安众率大批随员前来，副处长级的有车务处杨格、机务处李维国、工务处陈官、总务处杨某（名已忘）；课长级的有会计处李怀白和车务处王振铎、郑耀南等人，分乘两列专车连同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路警一齐来到焦作。第二天，又陆续到了一些接收人员，前后加起来，前来接管的人比道清管理局各处课的全体职员总数还要多。除夕，邹安众邀我会商交接手续。我表示，现在职工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得好，移交就快，反之移交的时间就要拖长，接着便将工会的要求摊了出来。邹当场表示，关于年终奖金，保证与其他各路一样对待，其余如储蓄金、贩卖部及一切福利事项，率由旧章，按道清老办法办理。至于职工，尽量由平汉路局安插，实在安置不下的则由平汉路局负责转请铁道部在其它各路想办法。最后商定，于1936年元旦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庆祝新年并宣布接管。

元旦晚上，邹安众召集原道清路局各处长及平汉路局处课以上的接收人员开会，商讨新的组织机构，最后决定：

①道清铁路的局本部撤销，业务改归平汉局代管。道清路改称道清支线，因为对外借款关系，仍作为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计算盈亏，原有线路、机车、车辆及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仍作为道清支线资产。

②道清支线设工务、机务、车务各段，分别隶属于平汉路局各主管处。原来道清各处处长改称段长，原来的段长改称分

段长。原警察署改为护路队。各处署的档案、统计人员调平汉路局，除各段、队必留用者外，其他人员作为编余人员由平汉路局安插或转请铁道部改调其它各路。

③原会计处人员全部调平汉路局，原总务处档案、人事及材料人员调平汉路局，其他人员按编余人员处理。

④老年多病，不愿迁动、自请退休或辞职的照铁道部人事规定办理。职员到差不足一年者遣散。

## 五、余波点点

### 1、外埠煤商的呼吁

常口小窑煤禁运了，道清铁路局撤销了，福公司和其代理人中福公司如愿以偿，却给平汉铁路道清支线车务段（以下简称支线车务段）惹出了许多麻烦。

在1936年这一年中，不断有道口、漯河、天津等地的煤商到支线车务段呼吁，要求托运常口小窑煤。他们的理由大多是，自己在禁运前定货且交了款，现在赔累不堪。事出意外，情有可原，恳请通融一次，下不为例。对此，支线车务段感到很是坐蜡，只好让他们会同小窑货主就近向中福公司申述理由，请由中福公司出名托运，或向汉口平汉路局车务处申请。这些煤商们费了不少周折，亦没得到下文。

### 2、日本浪人趁机捣乱

1937年新年前后，有个叫佐佐木的，拿着日本驻开封领事清水的介绍信来到支线车务段，要求托运常口小窑煤2000吨至

天津。我想到日本浪人眼下正在华北各铁路走私，恐生意外，便一面婉言拒绝，一面分别通知中福公司和地方治安机关予以注意。佐佐木失望而归，在列车上他和别人说，这趟买卖赔了本，若知道焦作还有现大洋（指银元），带点货（指吗啡、白面等毒品）来，就可以大大地发一笔财。1937年4月，佐佐木又来到焦作，一落店便被地方军警严密监视起来。佐佐木递给我一张土肥原贤二的名片：“凭这五个字，运煤5000吨，常口到天津。”态度十分傲慢。我简洁地答复他：“明令禁运，歉难照办。”第二天再见面，他便改了口风，大谈中日亲善，他的翻译避开佐佐木压低声音对我说：“福公司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得了，土肥原威震华北，可得罪不得！事成之后，定当厚谢。”我说：“车务段照章办事，违犯法令的事绝对不干。”佐佐木见事成僵局，转口说：“日侨在中国运煤作生意是合法的，禁运小窑煤是不合法亦不合理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法律！日侨损失，有碍邦交。土肥原大大的不好惹！”我说：“禁运小窑煤是奉令办理，日侨损失与车务段无关，如认为有碍邦交，可请土肥原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

### 3、国民党特务趁火打劫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军大举南侵，12月间，商震部队在顺德以南节节后退，豫北吃紧。中福公司首先向汉口疏散（领导人均赴汉口，只留惠尔恭应付万一）。焦作工学院则迁移西安。黄河以北，平汉干线及道清支线的职工眷属，奉命先期撤退过河，不过河的以汉奸论。杂牌军的残部调焦作清化一带整编，旋又调赴前方的络绎不绝。军运压倒一切，商运寥寥，中福公司煤运亦不例外。焦作街上竟贴有“教授日文日

语，有备无患”的招生广告，情形甚为混乱。这时全国铁路运输副司令兼平汉线司令陈广忠，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由前方退到新乡。程的专车停新乡站西义道，陈的专车则甩在道清支线游家坟站。陈选这个小站不是为了指挥方便，而是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避人耳目去过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他和左右经常海吃狂饮，还不断在车上招妓留宿。这列运输司令专车就是藏污纳垢，作奸犯科的窝巢！陈的亲信爪牙，线区司令部总务处长徐挽澜是个军统特务，在道清支线上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招得人人侧目。有一天，徐到支线车务段与我密谈，大概的意思是：陈广忠为了配合正规军抗日，计划组织游击队，联络已有眉目，现在听说西安煤价高涨，从常口运煤前往，可获厚利。就利用这运煤的利润作为游击队的开办费。等到游击队组成，就可向中央正式申请经费。运煤所需车辆，由线区司令部筹拨，要多少有多少。过轨手续及平汉、陇海各方面均有布置。起运则由道清支线车务段负责。事后，大家可以分润一些，准备逃难。我表示：“为了抗战，当然照办。困难的问题是委座有令禁运常口小窑煤。不过亦还有办法，可供采择，①可洽由中福公司出名托运。②由陈广忠电令支线车务段遵办。③平汉线区司令部直接派车到常口运煤，支线车务段按照应付杂牌军强迫运煤成例，于事后电告车务处及线区司令部敷衍了事。既然是为了组织游击队抗日，分润一节千万不能谈。”过了十来天，徐挽澜请道清支线护路队大队长生德胜来和我叙谈。后据生德胜透露：“游击队员为张化雨召集绿林朋友作骨干。西安煤价每吨40元以上、运几千吨，个人就可分九千，干得过。前说三个办法，徐挽澜以为都不妥当，最好由徐拨车交支线车务段支配用途，拨常口运小窑煤。”我明白地告



诉他：“徐挽澜的葫芦里没有好药，陷到里边将身败名裂。陈广忠不肯发电报，来电话亦行。再不然由专车上梁处长来电亦行。没有根据实在不好办。”因此又无结果。1937年11月末，生德胜对我讲：“现在焦作街上乱得很，无事少出门！”又过了不几天，徐挽澜暗派所谓游击队二十多人，趁黄昏将我的住宅包围，一半越墙入院。我和同事李新波正在客厅下棋，暴徒突入，以手枪逼我从客厅向外走，并威胁限3日离焦作。我问：“为什么？”嘈杂间，一个暴徒一脚把我踹倒，脑袋碰到墙角上，血流如注，晕了过去。这一阴谋显然是陈广忠徐挽澜设计、生德胜知情不举干出来的。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无法追究。事后，陈广忠假惺惺地派人来慰问，劝我移汉口养伤，我气愤地说：“大敌当前我一定和支线车务段同事们共患难，绝不临阵脱逃！”后经车务处派出段长高之仰代理我，我才于1938年1月赴汉口就医。

#### 4、福公司的发展及其覆灭

当道清路局撤销，合并于平汉路局的同时，中福公司人事亦有所变动。整理专员翁文灏改任南京行政院秘书长，由总工程师孙越崎继任，改称总经理，福方总代表仍为贝尔。从此，中福公司发展更为顺利，福公司也随之大获其利。这种发展，实得力于平汉铁路在运输上的支持，此外平汉路局徇中福公司之情，还作了两项有关中福公司重大利益的事情。第一件是推广中福公司块煤砗的用途。中福公司无烟煤最宜于家庭取暖和作饭，其它的用途甚少。只有三号砗勉强可供铁路机车锅炉的使用，故也称锅炉砗，每年约需几万吨。中福公司为了扩大锅炉砗代机煤的销路，商得平汉路的同意，就近在新乡机车库试

用。由于锅炉砑的性能不如烟煤块易于掌握，司机、司炉在使用上不习惯而告失败。第二件是展筑道口至楚旺铁路，路线由道口径濬县、内黄至楚旺，全长约八十公里，称道楚段。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是由道清支线工务段自行调配，以段长孙成为总工程师，所需机具材料概由平汉路局筹拨。自1936年秋开始测量，至1937年5月即行通车。该段路线，自濬县以下全系黄河故道，黄沙弥漫，人烟稀少，商业不发达，工矿更谈不到，在经济上的价值不大。以军事论，在当时也无必要。它的唯一作用，在于扩展中福公司的独占市场，符合福公司的最高利益。道楚通车一个多月，“七七”事变起，以军事关系即行拆除。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豫北，道清支线全线震动，中福公司开始疏散，职工和眷属，以及器材，机器设备等分批陆续南运至四川。中福公司以合作投资和收购等办法建立起天府、威远、嘉阳、石燕等煤矿，于短短几年内就跃登全川煤矿业首座。中福公司发展得这么快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是：拆迁早，器材设备多且全；技术力量雄厚且有焦作工学院学生作后备军；又有福公司的外资关系，在调换港币上有便利条件；此外还有军事委员会所属资源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因此，踟躇于豫北一隅的福公司，藉着中福公司作掩护，伴随着蒋介石峨嵋山观战而活跃于全川。直到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四川后，英国垄断资本的福公司才在中国的土地上覆灭。

## 应尚才与粤汉路4—8—4型机车

应 建 之

1955年4月的一天，唐山铁道学院的苏联专家诺维科夫来到北京铁道学院讲授“机车的牵引计算”，下课后钮泽铨教授为专家介绍前来听课的教授们。当诺维科夫与先父应尚才握手时说：“很高兴见到您，4—8—4机车的设计人应教授。在苏联我从国外杂志的报道中见到过您的成就。”

先父应尚才出身贫寒，在上海中西书院修完中学课程，因数学和英语成绩优异，得到老师谢鸿赉的鼓励和资助，考入北京清华书院（今清华大学前身）。1914年先父公费留美，在凯斯大学（The Case University）攻读机械工程，毕业后供职于西屋公司（Westing 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的动力机械工程部门，历时5年。1924年先父回国后曾在天津任南开大学教授、山海关桥梁工厂工程司、津浦铁路工程司。1930年调往铁道部，出任路政司技正，与此同时还兼任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工程司并在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兼教授职，讲授机车课程。

1933年，先父按粤汉铁路的特殊条件设计了KF<sub>1</sub>型机车（即4—8—4型机车）。

粤汉铁路始建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先是由美国的合兴

公司承办，后赎回收归国有，分省建筑，广东省修筑南段，从广州到韶州（即今韶关）。湖北、湖南两省修建北段，从武昌到株洲。1929年铁道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决定用“中英庚款”<sup>①</sup>的三分之二建筑株韶段，将南北两段接通，完成粤汉铁路。由于该铁路分段建筑，历时30年，全路各段的建筑标准不一致，因此各段路轨和各座桥梁的承载能力都不相同，给选购机车带来很大的困难。国外的各种蒸汽机车，马力大者虽能满足运营要求，但轴重（与机车自身重量对应的重量）超过了路轨或桥梁的承载能力；而轴重轻者，牵引力小，不能达到运输要求。

1933年以前，我国各铁路使用的机车都是提出技术规范书向外国厂商订购。粤汉铁路调车用的0—8—0型机车，就是先父提出技术规范书，1932年由英国阿姆斯庄和惠特沃斯工厂（Armstrong & Whitworth Co. Ltd.）承制的。

当时铁道部路政司帮办（即今副司长）杨毅（号莘臣）鉴于国内机车型号过多，有意标准化之，想借粤汉铁路订购机车的机会，搞一种适合国情的机车。在先父的建议下，杨毅决定自行设计。但没有设计部门进行此工作，就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中由先父担负这项设计工作，配有一位绘图员相助。这项设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机车的总体、锅炉部分、蒸汽机及其阀动机构、车体部分、煤水车和制动装置等，此外还有客车和卧车的总体设计。

1929年铁道部成立时，部长孙科（孙中山之子）从英国请

---

<sup>①</sup> “中英庚款”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给英国的赔款。此处及本文中的“中英庚款”是指1933年7月由当时的铁道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签约借款，用以向英国订购修建铁路的物资器材。

来一位顾问K. 康德黎 (Kenneth Kently, 今译肯尼思·坎特利) 他原是英国某公司的绘图员, 具有娴熟的绘图与描图技术。但他不懂铁路业务, 在铁道部整天无所事事, 便常去先父办公室主动介绍其描图技艺, 在他的请求下, 4—8—4 型机车总装配图由他来完成。

1933年, 先父完成了 4—8—4 型机车的计算与设计工作。机车的主要特点有:

1. 大烟管、小烟管布置合理, 炉床与锅炉的结构有改进, 故热效率高。

2. 采用了多种减轻机车重量的措施, 为满足强度的要求, 部分结构选用合金钢。

3. 在锅炉的炉床前面装有自动上煤机。自动上煤机是由一个螺旋推进器把煤从煤水车运送到炉前的盘子上, 再用机车的乏气 (废气) 把盘子上的煤喷撒到炉床的各个部位。

4. 司机可以坐着开车。

5. 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时, 全线的设计标准活载为古柏氏E—35级<sup>①</sup>, 加上全线的弯道甚多, 故行车架 (走行部分) 采用了4个导轮, 8个动轮和4个从轮, 构成了4—8—4的结构。

6. 该机车设计功率为3500马力、轴重16吨、轴距5.7米、时速100公里, 供客货两用。

4—8—4 型机车的设计工作完成后, 铁道部进行招标。因为粤汉铁路是属“中英庚款”的项目, 所以投标厂家仅限于英商。结果在上海的英商马尔康洋行 (为物耳坎机车厂的代理

<sup>①</sup>古柏 (Couple) 是美国工程师, 他所提出的活载计算标准是当时铁道部采用的标准, E-35级相当于现在标准中的-14级。

商)得标承制该机车。前来南京铁道部联系这项业务的有两人,一为英籍跑街(即今业务员)莫里森(Morrison),另一为中国职员戴恩锡。

物耳坎(又称伏尔甘)机车厂(The Vulcan Foundry Ltd, Locomotive Builders)是个不大的工厂,遵循英国传统,而4—8—4型机车在设计时引入了不少美国的新技术,该厂不得不频频来电催请设计者前去指导工作。1934年先父受铁道部派遣,前往该厂监造4—8—4型车。当年11月,先父由上海动身先去美国购置锅炉中的过热器等零件,而后赴英。在先父的指导下由该厂的技术人员完成了该机车的制造工作,1935年底,先父返回南京,当时《中央日报》、上海的《大陆报》(英文报China Press)和南京金陵大学的校刊都作了报道。

粤汉铁路订购的24部4—8—4型机车,按照合同规定有运到青岛卸交货的整车,有运到广东黄沙的散装机车部件,交货以后再进行组装,另有三部机车于1936年3月运到上海,在张华浜码头卸船。卸船那天,先父和家母沈显琛都去码头,康德黎、莫里森和戴恩锡也去码头观看卸船。这三部机车在京沪铁路(今沪宁铁路)进行性能测试。有一美国商人乔治·E·斯般格勒(George E. Spengler)也参加,他是为谋求承制这种机车而来。他原是蒸汽机车司机,在试车时亲临驾驶操作,他认为操作方便,坐着驾驶蒸汽机车是首创。这三部机车制造和组装良好,测试证实性能符合设计要求。接着在京沪铁路(沪宁铁路)进行运营考核,用此蒸汽机车开出了特快客车,按3500马力拉足货车,也缩短了行车时间。

1936年2月运到青岛的一批机车,由粤汉铁路主管机车的

潘世宁工程司接试。在胶济铁路上的四方与沧口、女姑口之间试车，效果良好。但导轮有发热情况，经四方机厂的田溥霖工程司调整间隙后得到改善。以后这批机车又转到浦口机厂，在浦口至三十里堡之间作第二次试运行。在试运行期间，发现汽缸的五眼油盅中油眼腔混杂，经王经峻工程司打开汽缸盖检查，证实走油情况甚好。但由于焊接不良，煤水车外壁有裂纹，所以有漏水的问题。

4—8—4型机车是根据粤汉铁路的需要和当时的条件，由中国人自力更生设计的承担运输任务的客货两用大型机车。由于当时我国工业能力薄弱，加上“中英庚款”的缘故，所以送到英国制造。在设计方面超越了英国的传统，当时英国的铁路线短，罕有大型机车，制造这样的蒸汽机车，在英国机车生产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所以当1909年11月中国铁路代表团访英时，英国提出要一部这种机车放在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

1981年我国向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赠送4—8—4型(KF<sub>1</sub>型)机车，并在上海机务段举行“六〇七号”蒸汽机车交接仪式。1983年3月30日在英国移交给英国博物馆。4月1日《天津日报》在第3版报道这一消息时，转载了一段英国的报道云：

“……（在赠送KF<sub>1</sub>型机车的）交接仪式上，有两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特别激动，他们是这台蒸汽机车的设计者——八十四岁的肯尼恩·坎特利和他的助手、七十多岁的莫里森。为了表示纪念，两位老人特地携带全家老小赶来参加了这一交接仪式。”当我见到这段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报道后，就和胞弟达之走访和信访了铁路界老一辈的知情人士：茅以升、金士宜、茅以新、郎钟睽、赵传云、王羽仪、朱骝、王经峻、顾辑等老先生，

又根据家母沈显琛的回忆和先父的遗著，写成此文，以正视听。

本文是在天津市红桥区政协的鼓励、督促和帮助下，经过3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在此我谨向红桥区政协的领导及提供史实资料的伯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红桥区政协供稿）

### 更 正

第四十七辑《铁衣曾照古中原》一文第2页第5行的“清弥”应为“消弥”；第11页倒2“总帅”应为“统帅”；第29页第5行的“一个”应为“一旦”。补白《戴愚斋轶事》第203页第10行“压宿”应为“压缩”。《天津“鼓楼东姚家”轶事》一文第212页倒4的“东引局”应为“京引局”；第214页第14行的“坟小爷”应为“坟少爷”；第216页倒6“西里间”应为“东里间”；第218页第14行的“开”应为“升”；第220页第10行和第238页第1行的“彤宜”应为“彤宜”；第220页倒7和第221页第2行的“南王老胡同”应为“南五老胡同”；第221页第5行的“焦祚瀛”应为“焦佑瀛”；第227页第10行的“王贤寅”应为“王贤宾”；第230第12行的“八梢”应为“八僧”；第232页倒9的“诵袁”应为“诵裳”；第236页倒2的“三月”应为“三日”，同页倒1“拜渴”应为“拜谒”；第240页第5行的“继配”前应加上“其子”；第240页第6行的“照”应为“明”。

第四十八辑《河北省银行史实记略》一文第44页第10行的“费纸”应为“废纸”。《中国通商银行简史》一文第58页第6行“中央”应为“中英”。《愿将毕生献给护理事业》一文第124页第4行的“三个全会”应为“三中全会”；第131页倒10“四个病”应为“四个病人”。《天津市护理教育沿革》一文第149页第7行“陈路德”应为“陈路得”。《回忆我的戏剧生活》一文第172页第13行的“陈大护”应为“陈大镬”；第178页第13行的“苟慧生”应为“荀慧生”。



## 回忆南口战役

刘 翼 飞

1926年在“讨赤”声浪中爆发了“南口战役”。当时我任奉军第十军第四旅旅长，参加了这场战争，现据回忆所及略述于下。

### 南口战役之远因

1924年10月，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失败，率集残部于11月间辗转返回洛阳不久，即被陕督刘镇华驱逐于前，未几，又遭鄂督肖耀南拒入武汉于后，嗣经种种困难，逃往湖南岳州其旧部葛豪处暂住。由于吴佩孚坚持其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至此仍思卷土重来，拟与奉张再决雌雄，并雪冯玉祥倒戈之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除扩充其部队外，并未获得真正实惠，却给奉张造成扩张势力的机会。张作霖乘战胜直军之际，直驱宁、沪，强迫段祺瑞任命杨宇霆、姜登选分别为江苏、安徽督军，为确保该两省翼侧安全，又强使段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军，这就激起各军阀的震惊，特别是浙江督军孙传芳反奉张的决心。由于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三方面立场相互渐趋一致，经过一度酝酿，便于1925年9月间，分别遣派代表，靳云

鄂（吴方）、蒋方震（孙方）、张之江（冯方）<sup>①</sup> 齐集武汉，协议捐弃前嫌，共同合作，结成反张三角同盟，（各方面当局均表同意）并计划首先由孙传芳发动进攻苏、皖境内的奉军，随后，豫督岳维峻部国民第二军进出豫东、鲁南，牵制鲁军南下增援，并策应孙军的进攻；直隶方面则以国民第一、三两军张之江、孙岳所部，合力解决直督李景林部及张学良的关内部队。三方协议后肖耀南领衔通电讨伐张作霖，10月孙传芳率部出动，同时吴佩孚由岳州到达武汉，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靳云鹗为副总司令兼讨贼军第一军总司令。孙传芳率部很快击溃了奉军，先后进占沪、宁和蚌埠各地，苏、皖两督杨宇霆、姜登选相继败走，鲁军张宗昌南下增援，但被孙部狙击，孙传芳旋即进驻徐州。

奉军曾经组织大军准备南下反攻，尚未出动，1925年11月由于郭松龄率部反奉，威胁了张作霖的基础；国民第一军张之江部乘机击败直督李景林，占领了天津。国民第二军孙岳所部进出保定、大名一带。李景林败退后，求援于张宗昌，以直隶省地盘让与鲁军为条件，组成直鲁联军，张为总司令，李副之，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统帅大军向津、京方面猛扑。日本军舰暗中支援直鲁联军，以致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制造了“大沽口”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又联合驻北京八国公使团，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觉书”声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附近作战。段政府屈从外力，迫国民军代总司令张之江于1926年4月，下令由天津、北京向南口方面撤退。

---

<sup>①</sup>冯方代表是否是张之江，查无实证，据认为当时张树声为冯方代表。是否有误待证。

褚玉璞跟踪追击，仅在通州、丰台小有战斗随即进入京畿。段政府根据奉张意见，免去直隶督军李景林，以褚玉璞继任。同时扩编褚部为第七方面军团，褚任军团长，与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团合组为第二七联合军团，张宗昌为联合军团军团长。

早在张宗昌率部南援苏、皖奉军时，吴佩孚令国民二军岳维峻部按预定计划出动策应孙传芳军，岳为保存个人地盘，未遵令执行，反而出兵豫南，阻止鄂军北上，吴大为震怒，即令靳云鹗亲率所部，由豫东回师攻击岳维峻，先后占领开封、郑州，迫使正在进攻济南附近八里洼的国民二军李济才师撤退，使济南转危为安。后来，国民二军残余部队在豫西被刘镇华军及地方红枪会所歼灭。吴佩孚以寇英杰继任豫督，靳云鹗大失所望，极为忿恨。这时吴佩孚与冯玉祥关系破裂，而其旧部离心日甚，复经其左右主张联奉的鼓动，吴随改变其战略为“联张讨冯”。不久，吴又免去不同意其战略构想的靳云鹗的本兼各职，由田维勤继任。孙传芳反对吴的认敌为友的战略，更不满对靳的苛薄无情，也与吴分裂，从而昙花一现的“三角同盟”即告解体。吴佩孚随即偕同张其锬、蒋雁行、齐燮元、张志潭等联奉派，统率田维勤等四个旅兵力北上，与张作霖协力讨冯。

### 战役前双方形势

当褚玉璞率军进驻北京时，即令其军长王株率部沿京绥铁路向南口前进，到达怀柔县境与国民军小有战斗，迨国民军向南口集中后，王部则在南口附近的京绥路两侧占领阵地。李景林部的荣臻、胡毓坤两军长也率部进驻西苑附近待命。

冯玉祥目睹当前形势日非，乃通电下野，前往苏联考察，

全军由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统一指挥。张坐镇张家口，将其主力部队向察、绥地区撤退，巩固察、绥、陕、甘等省地盘，并企图入侵山西，将西北打成一片。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驻怀来县城内，留驻延庆的佟麟阁师、口北镇守使谭庆林的骑兵团、驻防南口的刘汝明、陈希圣、郑金声等师，均由鹿节制。南口系山岳地带，居高临下，部署军队既可节约兵力，又可进行重层配备，更便于就地征发京绥路的物资，构筑坚固工事，可攻可守，伺机观变，以图再举。

1926年4月国民军撤离京、津时，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亲率所属第十军于珍部（欠步兵第二十九旅戢翼翘部）之步兵第四旅刘翼飞部、步兵第三十七旅赵鸣皋部及野炮兵一团；第十一军赵恩臻部之刘伟（兼副军长）步兵第六旅、富双英步兵第十二旅、陈琛步兵第四十六旅及武汉卿骑兵团第六旅；军团部直辖的炮兵司令邹作华部野战炮兵两团（山、重炮各一团），工兵司令柏桂林部和辎重兵司令牛元峰部以及吴荫棠的坦克车大队等。这些部队或由京榆公路徒步，或由京奉铁路输送，均先后由奉天省境内出发直抵北京，分驻于城内和四郊及南、北、西苑等地，对退往南口一带的国民军施加压力。

军团部命令所属第九军军长高维岳统率所部两个步兵旅：第二十七旅王瑞华部、第三十四旅刘震东部及骑兵团第八旅郭希鹏部，由关内向察哈尔延庆的国民军进攻，并以由奉天义县至昌黎的第十军副军长戢翼翘兼带的步兵第二十九旅配属骑兵团一营组成支队，向延庆的四海城等地进军，截击南口之敌。

此外，镇威军总司令部令万福麟部之第二十九师骑兵团第五旅马占山部、骑兵团第六旅张殿九部和穆春的骑兵团，以及第十五

军汲金纯部之步兵第十四旅徐永和部及步兵第三十六旅（旅长名忘记）均由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统一指挥，骑兵通过四洮路，步兵由阜新出发，分向热河的开鲁、林西等地前进，转向察哈尔的多伦进攻。

国民军的热河都统宋哲元，虽曾频电告急，但其总部无力援助，宋遂率部向多伦方面撤退。由此可见，奉军对南口之敌，采取三面包围的优势，在兵力、武器、弹药和粮秣等供给方面，也都较之充实，一俟各路大军到达准备位置后，即开始总攻。尽管敌军占有南口既设的险要阵地，但它是孤立的，其后方联络，显然有被切断的危险，胜算操之于我军。

我旅随同军部和赵鸣皋旅，由锦州进抵北京，军部与赵旅驻德胜门外黄寺附近。我旅第一团团长王辅予率部驻昌平区海青落村，对小汤山、十三陵一带派出侦察军官搜索南口敌情，其余第二十五团、第三十九团及旅部驻北苑。同年夏季，张学良军团长曾到北苑视察，又在小汤山温泉沐浴，说明当时前方并不紧张，也不急于攻下南口。

### 迟迟进攻南口的原因

为什么迟迟进攻南口而坐视国民军以充裕时间巩固其阵地？据我回忆：吴佩孚1926年5月30日，由武汉北上长辛店，张作霖在6月5日到达天津，经过张的亲信杨宇霆、郭谦与直系要人张志潭、张其铨几次洽商后，乃于6月28日，张、吴正式会晤于北京中南海，一扫前嫌，结为金兰之好，并决协力“讨赤”。吴部田维勤师及陕军高桂滋部已先后进驻北京附近。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与张、吴均有旧，所属少数部队也驻北京。后因广东国民革命军即将出师北伐，吴佩孚遂离京南下武

汉。吴走后，奉军面临下列问题，未得解决前势难向南口发动进攻。

（一）须俟各路军进抵相当地点，方下总攻击令，以便一举攻克当面之敌；

（二）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部与奉军貌合神离，军心不稳，因而谣言纷起，有谓国民军之所以退据南口，与该部暗中联系伺机观变分不开。肘腋之患未除，不能开始动作；

（三）田维勤部原系靳云鹗的部队，后被国民第二军收编成师，表面虽愿与奉军协力进攻南口，但其官兵未足信赖，据说也与国民军有勾结，是国民军留下的内奸；

（四）西苑附近的高桂滋部数千人，虽脱离国民军，但亦不可靠，深恐发生意外；

（五）直鲁联军李景林部荣臻、胡毓坤两军均驻西苑一带，由于直督真除了褚玉璞，李景林心怀不满，时思叛变，脱离奉军系统而另谋出路。

此外，尚需叙述奉军内部的复杂情况，李景林背叛奉军的经过：李所属荣臻、胡毓坤两个军，都是李景林部与国民第一、二、三军在冀南作战时扩编的，战斗力较强，但以众寡悬殊，终于败退至德州附近。李遂向张宗昌、褚玉璞求援时说：“我只是为了争口气，如能打回天津，直隶地盘一定让给褚三弟（三人结盟褚为三弟），请多加援助吧。”迨褚玉璞打退国民军，李却又落水思命、得命思财，违背诺言，恋栈不让了。因此，后来李在山海关晋见张作霖总司令时，大受申斥，并在榆关一次会议中，张要杀他；也因其在郭松龄酝酿反奉期间，曾参与其事，尽管郭军采取行动后，李又转变态度，而且褚玉璞是强行接收直隶督办地位的。综举各事，使李景林极为愤慨，时思叛

变。

李景林心怀异志既久，便于某夜在西山（或西苑，记不确了）召集所部将领秘密会议，主张单独行动脱离奉军。但因胡毓坤、荣臻等主要将领都不赞成，会议无结果而散。胡部支队司令王亮成，系河南人，率部驻三家店一带，参加了这一秘密会议，他认为倘有变乱，南口之敌出击，奉军则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散会后，即将拂晓奔来我旅告密。他与我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也是我介绍他去胡部任支队司令的。

我获得密报后，立即前往黄寺军部向于珍军长转报，于急令我找胡毓坤前来面询真相，惟以我的前方任务重要，不能稍离，乃召陈在新旅长（陈、胡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约胡来军部相见。胡见于表示，决不背叛桑梓（胡是东北人）更愿为奉军效力。于当即偕胡、陈等到天津会见张学良军团长，报告情况及表示决心。张学良备加慰勉，即日率彼等至沈阳晋见张作霖总司令，除表示嘉许外，并准收编荣臻、胡毓坤所部为第十六、十七联合军，仍由二人分任军长，与奉军同一待遇，隶属于第三、第四方面军团。事后，胡曾对我说：“李景林曾当别人面前，大骂我们是倒戈的祖师……”从此，荣、胡两部取得了奉军嫡系地位。李景林先为张宗昌的座上客，不久又投奔了蒋介石。

### 向南口发动攻击

李景林事件解决不久，陈琛旅长便受命率部将王怀庆所部包围缴械，并将士兵汰弱留强收编为该旅一个步兵团，形成一旅四团制；陕军高桂滋部经于珍军长示意，也离开北京。事后于军长对我说，“高为人很好，又没有特别行动，我让他走

了。”只有田维勤部企图与国民军并肩前进，参加南口战争。奉军当局认为该部人员较少，不足为害，惟须随时警惕以防不测。当南口总攻令下达前，国民军总司令张之江曾派代表赴汉口晋见吴佩孚，表称愿率所部国民军，诚意归附麾下，竟被拒绝了，因而国民军与吴有刻骨仇恨。

奉军当局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各路大军也都按计划进抵预定位置。军团部便于1926年8月初（日期记不清了）发布了攻击命令。敌情如前，无甚变化。直鲁联军在张宗昌、褚玉璞指挥下，以王栋军长任前敌总指挥，在京绥铁路左侧占领阵地，向当面之敌展开攻击。我第十军在京绥路右侧（含铁路），经过某地亘得胜口之线占领阵地，攻击当面之敌。我旅在右翼，所属第二十五团富保衡部，扫清了龙山、虎山、影壁山的少数敌人，曾伤亡官兵二三十人。敌退后，便令姜凌云的第三十九团与左翼赵鸣皋旅联系向蜡签山之敌、二十五团向其正面之敌、另以二十五团之一部向老爷岭之敌分别进攻，并以第一团毛辅予部控置于得胜口外一带村落为旅预备队。

当我第十军开始攻击时，军团部令全线炮兵集中火力猛射，掩护步兵前进。由于敌军凭藉钢骨水泥工事和纵深配置的坚固阵地，且有附属防御设施铁丝网、鹿砦、陷井、地雷等，我部虽多次仰攻到山腰，且占领第一道防线，逼近主阵地，终于被阻不能前进。我部伤亡太重，一度形成对峙状态。军长于珍常在夜间到前线面授机宜，我亦到高地指挥所督战，目睹步兵爬山仰攻已逼近敌阵地前沿铁丝网附近，在敌军密集火力下受阻，无法前进。白天不能撤退，只能在敌人有效射程内停留，待至黄昏或夜间才能退回。类似这种战况很多，阵亡官兵尸体累积山腰，暑气蒸熏，多已腐烂，无力收回。



双方几天战斗中，我方伤亡惨重，即以我旅第二十五团的一个连，仰攻老爷岭时，经过激烈战斗，全连官兵只下来二十五人。我军以炮火优势给敌以杀伤，但敌阵地迄未动摇。据报敌人伤亡约四千余人，因攻守异势，我军伤亡当可倍之。直鲁联军的战况不甚激烈，伤亡较少，战斗进程亦无发展。

### 向南口发动总攻及国民军撤退

1929年8月12日夜间，张、韩两军团长率高级幕僚周亚威（军团部参谋处长）等到前方指挥所，召集旅长以上及各独立部队长开会，说明吴俊升、高维岳、戢翼翘等部进展顺利；宋哲元已放弃热河，撤退至多伦，那里和延庆的敌军也见动摇之势；现吴部等即将到达预定地点，全线敌军已处于危殆地位。因此，军团部决定于1926年8月13日拂晓，向敌总攻。坦克车大队准备出动，炮兵集中使用，掩护各军前进。步兵第二旅和第十二旅为总预备队，控置于沙河附近，敌军退却时，即由第二旅跟踪追击至张家口。韩军团长当面指示坦克大队长吴荫棠：在这次总攻中，务须率部奋勇前进，配合步炮兵猛攻当面之敌。吴说：“敌军居高临下，其副防御有鹿砦、外壕、铁丝网等，我军炮弹落在敌掩蔽部上，虽然爆炸，但不能洞穿，同时我军坦克概多损坏，敌人重机枪射击猛烈，很难发挥效力。”韩军团长怒冲冲地说：“敌军的枪炮能够那么准确，偏偏打进你们坦克车的射击孔里吗？这次攻击你要特别努力，勿蹈过去的复辙啊！第十军各部队在原位置，在五个团炮兵及坦克车掩护下同时进攻，务期一举击溃国民军。现在南口之敌已如瓮中之鳖，只要我一鼓作气，奋勇前进，很快就可结束这场战争。”

会议结束后，我旅奉命于8月13日拂晓，由我率第一团

突入得胜口，出敌不意占领马耳山，以扼居庸关险要；我旅其余部队以急行军出得胜口与高维岳军在延庆境内会师。届时，我率第一团及旅直属小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侧敌行进，虽稍受老爷岭敌军侧射，小有伤亡，终于全面控制了居庸关险要。担任正面攻击的赵鸣皋旅，在火炮、坦克车配合下，向敌阵猛攻，前仆后继，战况极为激烈。在京绥路左侧的王栋部队也及时猛攻，因而敌军陷于被动挨打之境。集中的炮火威力笼罩着敌阵，敌军更无喘息余地，就这样激战进行将近两昼夜。

这时，敌军右后方既受我后继部队包围的威胁，正面攻击又如此炽烈，因此敌军被迫于8月14日夜，以猛烈炮火射击后，由南口全线实施总退却，退却中遗弃了大批武器装备。我旅与高维岳军会合后，奉令在康庄车站停止待命。军团命高军及陈在新旅尾追退却之敌至张家口与吴俊升部会师。敌军骑兵谭庆林部（人马不多）在延庆投靠我方，拨归高军指挥。随后，我旅调回北京驻防西苑，高维岳恢复了察哈尔都统，仍兼第九军军长。

国民军自京津撤守南口，凭藉其既设坚固工事和地形险要，确为巩固西北绥、陕、甘各省之锁钥，如果全力固守，我军实难于攻下。因该军企图将西北各省打成一片，以便拥兵以自守，从而分散兵力入侵山西省占领了晋北十三个县，只有天镇的傅作义、大同的李生达、浑源的李服膺等部晋军尚未撤退。早在南口战役未开始前，国民军即派贾德耀住在北京东交民巷搜集我方情报。我军第二十九旅参谋长何柱国系贾的侄女婿，张学良军团长也曾派他到贾那里刺探消息。国民军当局总估计我方内部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把这种估计寄托在田维勤部，惟以我方对田部早有警惕。尽管在开始向南口进攻时，

就发现田部两个营投向敌军，但不影响战局，这一企图落空。入侵山西伺机观变也同样落空，因而南口战争发起总攻不到两昼夜，国民军就全线溃退了。奉军在南口战役胜利后，占领了张垣、恢复了察哈尔地盘，不愿继续西进，这也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

南口之战结束后，奉军大部官兵进行复员，张作霖总司令在南苑举行一次陆军大检阅。参加的步兵有戢翼翹、赵鸣皋、刘翼飞、陈在新、郜汝廉、富双英等旅及十六、十七军的应振复师；还有一部骑、炮、工和辎重兵团等。那天，风沙蔽日，日光暗淡，但各部官兵精神抖擞，坚持终了。张在检阅之后，深感满意。

（写于1964年）

### 迁址启事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已迁入新址，有投稿或联系事宜者，请到解放南路256号3楼文史办即可，电话303582，邮政编码：300042。另外，文史书刊服务部将于1990年6月迁至解放南路273号，特此奉告。

# 河南战役

刘翼飞

## 战前形势

1926年7月，正当吴佩孚坐镇长辛店指挥直军进攻南口之际，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进抵湖南，吴佩孚闻讯，即返回保定组织反攻，并令鄂督陈嘉谟负责对湖南的战争。迨唐生智部会同北伐军克复长沙、岳州，进窥武汉时，陈频电告急。吴于8月间由保定返回武汉，亲率所部抗击北伐军，嗣因战事不利，无法支持，乃起用靳云鹗为“讨贼”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并授权指挥所属直军各部队。因吴军内部矛盾重重，以致刘佐龙、张慕楷两师长率部投降北伐军，吴却束手无策。到了10月中旬，死守已久的武昌被北伐军攻克，吴佩孚逃往郑州。

早在同年9月间，由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自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这时，冯即利用吴军内部矛盾，暗中拉拢靳云鹗反吴，靳因冯以统帅自居，态度傲慢，虽曾虚与委蛇，但仍极力为吴准备收复武汉。未几，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出兵潼关向河南进军。东北当局为了先发制人，当即向吴佩孚要求假道河南讨冯，并协助收复武汉。吴虽

同意东北当局的主张，但靳云鹗却坚决反对，所部不听指挥。在1926年12月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吴佩孚免去靳的本兼各职，以靳部大将田维勤继任讨贼军副总司令兼援陕总司令。吴的这一措置引起了靳部将领的反感，任应岐和刘培绪公开通电反吴，并投靠了北伐军。而靳云鹗呢，早同唐生智暗中联系成熟，接受委任为某方面军总指挥兼军长职务<sup>①</sup>。从此，吴佩孚的处境日趋困难了。

### 东北军大举下河南

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武汉时，河南士绅代表卸任的河南省长王印川及前陕西督军陈树藩，曾先后到达北京，要求张作霖派兵入豫，以阻止革命军北上，并讨伐冯玉祥。王印川曾对东北当局说过：“河南省人民在杂军和土匪横征暴敛、明抢暗夺的迫害下，钱粮、地丁已预征到民国六十年，十室九空，其它苛捐杂税及惨苦情况不胜枚举，长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的。”张作霖既决心于先发制人在前，又经王、陈耸恿于后，便决定于1927年2月，命令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韩麟春统帅所部四个军兵力，分别由北京和冀南一带出动，向河南推进。从此揭开了东北军与直军相互战斗，接着东北军与国民革命军彼此战争的序幕。

当时，吴佩孚已处于进退维谷，完全被动的地位，不得不接受靳云鹗抗击东北军的劝告了。随后即由靳任河南保卫总司令，派高汝桐为前敌总指挥，准备故意率部后退，诱东北军深入河南后，再以河南地方部队米振标部为内应，进行反攻。因

<sup>①</sup> 靳云鹗脱离吴佩孚后，投入武汉政府，任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第三路总指挥，

此，吴佩孚又由郑州移驻巩县兵工厂。迨至北伐军将要由武汉北上以前，吴见大势已去，终于被迫离开巩县，通过南阳，西走四川，其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终成幻想。

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所属四个军及万福麟军的前进情况如下：

第十军（军长于珍）所属的戡翼翹（副军长）第二十九旅、赵鸣皋第三十七旅和我的第四旅，由北京近郊出发，沿京汉线徒步西进，每月行军五六十里。沿途设有兵站，就地按市价预购粮秣柴菜。在此之前，第十一军所属骑兵第六旅武汉卿部由冀南出发，经过磁县时，因购买军草不但不付款，而且把马粪强卖给百姓，激起民愤，被当地红枪会缴械了数连。后由军团部派部队往剿，经很长时间尚未肃清。约在3月初我军到达黄河北岸黑岗口，随即渡河，沿陇海路向郑州方面前进。

第十六、十七军荣臻、胡毓坤部之丁喜春、秦永义、应振复、刘××等四个师，新编第八军万福麟部之王瑞华（副军长）的步兵第二十七旅，黑龙江部队之韩光第步兵旅，骑兵第五旅马占山部、骑兵第六旅张殿九部，分别由京畿出动，于3月间先后进抵黄河北岸詹店车站、荥阳等地集结。

第十一军赵恩麟部三个步兵旅之富双英（副军长）第十二旅、刘伟部第六旅、陈琛部第四十六旅和武汉卿骑兵旅，由原驻地大名、顺德（邢台）一带向豫鲁边境黄河北岸前进。军团部直属部队郅汝廉的步兵旅，先期到达黄河北岸，由东明县渡河，即归我第十军指挥，沿黄河堤向荥阳方面前进。

在各军前进阶段，除第十军已由黑岗口渡过黄河外，其它各军、旅均分别停止于京汉路以东及京汉路附近地区，伺机渡过黄河，以便向黄河南岸之高汝桐等部进攻。

## 第十军开封败退

1927年3月初，我旅渡河后，当日赶赴开封，第十军军部早经进驻开封，我往见军长时，值米振标在督办公署宴请于珍和赵倜，军长命我旅进驻中弁县，与已在那里占领阵地的戢翼翹旅接其左翼布置队伍，准备战斗。会见戢旅时，承告以中弁敌情和右翼郃汝廉旅已在黄河南岸之线，进入攻击准备位置等情况。这时戢旅前方有稀疏枪声可闻。次晨，我旅之第三十九团营长杨运筹在率部西进途中，突遭高汝桐部马吉第部队袭击，杨营长阵亡，战斗形势尚无大碍。末几，我旅奉命撤退至某线占领阵地，工事尚未构竣，又奉命撤退，正在行踪不定时，又接到第三次后撤命令，再退往开封南郊、西郊，沿城外土围占领阵地。黄昏时，发现少数敌军攻击。我问于军长：“为什么接连三次撤退，这不影响士气吗？”他说：“郃旅已于昨晚不告而退了，而驻距此五十里朱仙镇的小张二扁担（米振标毅军之一部）所部已与靳云鹗联络，向开封挺进，威胁我军左后背；同时寇英杰的态度不明，所部也跃跃欲试，因而不得不接连撤退。现在军团部无线电台也叫不通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时，戢旅也撤至开封西郊，正在对中弁之敌构筑工事。这时有少数尾追敌军开始进攻，战况不甚激烈。夜十时左右，城外附近发现有数处潜伏敌人鸣枪、放火，驻在城内的米振标部，却将城门紧闭。原来米振标之子米国贤率有一师之众守城，虽已归附东北军，但我们认为他态度不明，深恐变生肘腋。于是，于、戢二位正副军长和我决定，派联络军官通知各部队及王辅予团长，令他率部掩护我军当夜沿开封东方黄河堤向兰封方向背进。我军撤退后，敌军虽未跟踪追击，但于、戢

二军长却于天明后不告而走，乘船渡过黄河北岸。当时，我心情激动，既恨连年作战一再失败，又感大敌当前竟被上级遗弃，愧愤交加，情不自禁，便召集参谋长刘晓云和团长王辅予等，嘱彼等好自为之，服从军长指挥，我是不能再干了，言毕拂袖而去。经过二三天后，我抵天津家门时，适接于军长电催速回开封，同时刘晓云参谋长等联名电告，旅长职务上级迄未派人代理，现在旅部事务均由他们共同核办，全旅官兵望我及时回旅视事云云。

我回到开封旅部后，才了解当第十一军由冀鲁边境渡过黄河时，我第十军已由开封撤退，第十一军当即奉命向开封猛扑。到3月中旬，第十一军所属第四十六旅陈琛部收复了开封，并将米振标部缴械，陈琛升任中将旅长。我将旅部事务稍加安排，即承指示前往郑州见张、韩两军团长，报告部队情况。张对我说：“你们部队从开封撤退之时，正是军团部和第十六、十七军等由铁路运输到郑州之日。原来高汝桐、马吉第部在你军向兰封背进之后，于3月中旬，先后占领了中牟和开封，并于3月24日高曾亲乘铁甲车率部攻至郑州市郊，我们遭到围攻两昼夜，几乎被俘。幸因在高铁甲车向我铁甲车猛闯，双方车辆接触，并将彼此挂钩搭上企图拉走我们铁甲车时，我铁甲车大队司令曹耀章及时发炮射击，炮弹洞穿敌之铁甲车，炸死他们十余人，高也当时毙命，敌军立即溃退，我们才得脱险。你军的撤退完全是由于联络不确实，彼此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现在已经明确责任的所在，对于人事不能不有所调动，以维持我军纪律。”我说：“这全是我们没联络好，也是对友军（指米振标、赵倜、米国贤）不相信的原因，所以这个责任应由我们共同负担，不可都归咎于军长。”张对我未责一言，使我更觉



赧然。随后，张又说：“于军长是一定要调动的，我想以王霆午（王树常的号）继任，他是于军长的同学，也是你在镇威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时的参谋处长，我看很相当。第三十七旅旅长赵鸣皋和你旅的王辅予团长等也得更换，因为他们都有责任。不过杨麟阁（杨宇霆的号）屡次来电，让我维持于军长和赵旅长的位置，这事怎能办到呢，你劝劝于军长吧！”还说：“第十军在南口战役结束后，人员、枪械药弹都没有补充完备，我原来不想让他部前来，可是于军长却在老将面前，坚决要求南下，希望当河南督办。”随后，韩军团长也以不同情于军长的态度，随声附和地说了些酸葡萄的话，因为他也垂涎河南督办。张接着又说：“第十军攻下南口后有一天，老于鬼鬼祟祟地拿着个纸包见老将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我正在那里，他没给我看，我就躲在别的屋里。他走后我才知道，他交给老将的那个纸包里，原来是南口战役《讨赤纪念册》，其中第一页是老将的照片，第二页是老于的，其余的为你军旅、团长和敌军阵地全景，或一部用铁路器材构筑的坚固阵地，以及破获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照片，我和老韩及其他各军照片一张也没有，难道攻下南口只有你们第十军吗，真是岂有此理！”随后我从郑州回开封见于军长，当面向他表示：“这次撤退都是因为我们没做好，连累了军长，深感惭愧，请军长遵令而行吧！”当时于军长没说什么。

后来，王树常继任第十军军长，他曾对我说：“我不愿负担这一重任，因为你在这里，我才勉强前来，希望多加协助吧。”随后，第三十七旅旅长赵鸣皋另调他职，补缺以第二十九旅参谋长何柱国升充，我旅第一团团团长王辅予和第三十九团团长姜凌云也先后调任他职，补缺分别由王云汉、王宝田继

任。

### 上蔡作战失利全军撤至黄河北岸

1927年3月中旬，第八军万福麟部及第十六、十七军荣臻、胡毓坤部先后渡过黄河，前者及时以骑兵快速行军向洛阳方向挺进，阻击冯玉祥部东下，卸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曾随万左右参与对冯部的军事活动；后者受命击溃高汝桐部以后，即南向漯河及郾城一带挺进。第十一军军长赵恩臻待第十军重返开封接防后，即统率所部富双英、刘伟、陈琛三个步兵旅、武汉卿的骑兵旅，段茂琪的野炮团及王德新的工兵团等全军兵力，由开封通过朱仙镇及尉氏县南进。4月初，占领了鄢陵，并俘虏敌守将刘培绪、马德凤、刘兰三人。

第十一军攻下鄢陵不久，于4月中旬即向漯河及逍遥镇之线前进。由于陈琛在攻下开封战斗时，曾晋升为中将旅长，刺激了副军长兼旅长的富双英急于求功的情绪，当富率所部第十二旅进入上蔡后，召集团长会议，当场指示徐英的第四十六团向汝南挺进，其余第五十团王××所部及第九十团苏锡祚部均驻守上蔡，以防不测。嗣因徐团在南进途中与国民革命军唐生智所属张发奎和黄琪翔部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富令王、苏两团增援不利，结果徐、苏两团长各率残部向上蔡以北退却，富双英随即指挥王国在上蔡竭力支撑，并向军部告急。陈琛和刘伟两旅虽曾奉命驰援，但陈旅迟迟其行，刘旅也援助不力，于是富旅之一部竟被包围缴械，并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师，以富为师长，开到武汉后不久，富即只身逃回北京。

在富双英被俘后，陈琛又将所部摆出一线长蛇阵，逐渐投入战斗，致被北伐军各个击破，溃不成军。因此，第十一军被

迫撤至鄱陵以南布防，后被压迫又逐步撤退。经过这次战斗，第十一军所有野炮大部遗失，段茂琪、王德新均被俘。在押解途中，段逃走被击毙，王幸免逃回东北军。从而影响了我方全面战局。徐英和苏锡祚由于擅自上蔡一直退却到开封，军团部命令第十军军长王树常将徐、苏二人押解北京，后经有关将领保释，免于处分。

军团部为增援第十六、十七军，命令我第十军所部由开封向鄆城进军，我旅留驻郑州为军团总预备队。后因漯河、逍遥镇一带战况紧张，抽调我旅王云汉团驰援，归第十军直接指挥，迫撤至黄河北岸后才归还原建制。

张学良军团长曾偕同我和邹作华由郑州乘专车去许昌，表面说是视察。到达许昌车站时，赵恩臻军长带参谋长杨政治赶来见张，向军团长说明陈琛的失职情况后就走了。不久，杨政治转来向张报告，已将陈琛枪决了。同时枪决的还有陈旅的团长甘宗逊。这时我才知道许昌之行是为处理陈琛问题的。因其不但驰援友军不力，而且有伙同甘宗逊阴谋投向国民革命军的企图，以致有此下场。陈的旅长职务由杨政治继任。

自上蔡之战失利，冯玉祥部乘机渡过黄河，进攻洛阳。驻守洛阳的万福麟部骑兵与冯部小有接触，并未发生激战。第八军军部撤往巩县不久，洛阳被冯军占领。这时，戢旅富占魁团长因负伤到郑州治疗，备言前方情况紧张，第八军的散兵纷纷逃至郑州，谣传该军已由洛阳溃退，万军长失踪。军团部极感不安，军团长非常气愤，下手令一纸：将第八军军长万福麟免职，令我接充，并前往收容部队，占领阵地，阻止冯军东进。我即带兵一个团驰往巩县，以察明真相。到达时，在车站附近一新大楼里会见了万福麟和李振唐，他们说，“王瑞华旅已在

前方某山上占领阵地，并未发现敌情。”我深感传闻不实之甚，便将手令带回郑州，向军团长复命，手令收回，一场虚惊始过。

自第十一军撤至鄢陵以南，战况日趋恶劣，在鄢城、漯河一带的第十六、十七军及杨政治旅等，也遭到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的猛攻，何柱国旅也参加这一战斗。虽经我第十军增援，终因士气沮丧，节节败退；原来估计晋军不至从背后进攻的情况，也与实际相反，晋军正在跃跃欲试中。同年5月初，军团部发布了总退却命令，责成我旅在黄河南岸芒山一带设收容阵地，掩护各军撤退。撤出郑州时，工兵团将车站水塔破坏，以阻止北伐军追击，随之我旅也进入芒山阵地。

因事前毫无撤退准备，黄河铁桥上并未另铺木板，火车虽能通过，但骡马大车都不能通行。该桥已超过保险年限，即或火车通行也不能超过四五节，全军迫不及待，乱设木板，满载武器士兵的列车，有如长蛇阵似的相继通过，一名比国工程师再三发出警告，谁能听他那一套，幸未发生危险。军团部过河后，即退驻新乡。

我第十军其它各旅、第十六、十七军各部队及第十一军各部，分别由黄河铁桥、黑岗口、东明等处渡过黄河，集结于邯郸、顺德及保定一带，第八军由汜水渡河后，在温县集结不久，只留赵有光旅（注）扼守黄河北岸，其余各部队也向后方撤去。

军团部撤至新乡后曾派工兵营长王某到旅部传达指示，俟各部队撤毕，即将黄河铁桥炸毁，以免敌军利用，并派工兵一个连由我指挥。那位比国工程师获悉这一消息，找我哭诉说，要与铁桥共存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炸毁它。我深受感动。当

各部队将要撤完后，张学良军团长召我到军团部，面令我旅、杨政治旅、王以哲的卫队旅及赵有光旅，坚守黄河铁桥北岸一带阵地，阻止敌军北上，只要守住几个月，就有办法了。我问道：

“这是攻势防御还是守势防御？如果采取攻势防御，可不放弃芒山阵地的天然桥头堡，这样不但便于南进，且可避免敌前渡河的危险。”张答：“这是守势防御，那个阵地没有保留的必要。”

我返回旅部时，我方部队已全部安全渡过，我随率部渡过黄河，终将黄河铁桥炸毁两节。随即遵令执行任务：杨旅、王旅在铁路以左部署部队，我旅和赵旅在铁路以右亘温县之线占领阵地，每旅正面广达七十八里，防御能力极为薄弱，易为敌突破。杨旅以右是我旅刘振远、王宝田两个团，一直到温县附近衔接赵旅防线。这样长达三四百里防线中，只配备四个旅兵力，我们的这个防线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一处不备，一处薄弱，处处皆备，处处薄弱。”还有像围棋谱中说的，“破荷叶包蛤蟆，包着嘴，露着腿。”

### 黄河北岸再次总退却

1927年6月9日，张作霖总司令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将东北军各旅均改为师，以张声势。对各将领则补授实官，并奖给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虎章等，以维系人心。师分甲乙两种，甲种师为三团制，师长为中将级；乙种师为二团制，师长为少将级。我所在第四旅改为第十师，除原有步兵三个团外，增编了卫队、重迫击炮、骑兵、通讯和担架各一个连，直属于师部。

黄河北岸防御重点在京汉铁路两侧，对黑岗口、黄河铁桥

及温县对岸的巩县各渡口，严加警戒。据侦察报告，目前尚无大船过河，若用牛皮筏子偷渡，其兵力是微不足道的。在长达数百里的防线中，各团间隔较远，警戒哨和巡逻军士非常艰苦，又兼天气炎热，部队病兵较多，无换防的余地，防守数月之久，在士气麻痹大意的情况下，1927年8月初的夜间，冯玉祥部的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部，由巩县黄沙峪渡口偷渡至黄河北岸，俘虏了赵有光师的一营长。我闻报后，即令王宝田团驰援，并报告军部，军部便令赵师及王团分别撤至詹店车站，随即乘车退到新乡附近后，军部发令全线开始总退却。我和团长们深为诧异，既是少数敌军偷袭，可集结兵力将其击退，为何匆匆撤退？这时，军团部已由新乡撤至北京光明殿，第十军军部暂驻新乡。我到军部见到王树常、万福麟两位军长，他们对我说：“已接到军团部命令，深恐晋军由娘子关出击，威胁我军右侧背，且有截断退路的危险，因而及时全部撤到直隶省境。”又说：“奉军团部命令，将赵师防守不利的某团长枪决，你师的团长王宝田也在枪决之列。”我为王团长请求减轻处分说：“敌军偷渡的渡口并不在王团警戒区内。他没有及时援助赵师因间隔太远，同时如果军部不下退却令，仍令他援助赵师反击，敌军既无大兵力的后续部队，又是面临背水战斗，而且县属官吏多系军团部委派的人员，亡羊补牢尚可为力，怎能这样处理呢？”万军长对我说：“一飞兄，你不要因人受过呀！”我总认为不应当这样办，乃请求对王宝田处分暂缓执行，同时电请军团长对王从轻处分。旋奉军团长电令，王宝田降级为中校团长，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而赵师的某团长已先期处决了。

扼守黄河北岸数月之久，除赵师一个营遭受伤亡外，其余

各部队根据总退却令，以铁路运输撤至保定附近地区待命。这时，东北军也全部撤到直隶境内，从而结束了河南战役。

### 河南战役的插话

河南省系中原地区，在军阀混战年代，历经兵燹，民不聊生，从而形成的地方自卫武装有：红枪会、黄缨会、黄沙会、白缨会、大仙会、扇子会和篮子会等八个帮会，统称“八卦教会”。据说，这些教会都是明末清初兴起的反清组织，一直为当地人民所利用，它们均拥有大量武器，概系历次缴获各方面军队的。例如，刘镇华和田维勤的部队都被他们缴过械，东北军武汉卿的骑兵旅也被缴械了数个连。因此，这些帮会实力雄厚，向为这方军阀所疾首。东北军士兵以冀、鲁和东三省籍的居多，在作战期间，因慑于河南地方武装力量，逃亡者很少，只在少数豫籍距家较近的士兵中，间有携械潜逃回家的。由于这种环境，在这次战役中，我方除车马、辎重和重武器有部分损失以外，其他方面损失很少。

东北军携带帐篷不足半数，行军时，各部队均有设营队，派员先行至宿营地点，先号用庙宇、学校和其它公共场所等，如不足用时，还要占用部分民房，这是东北军一贯做法。到了河南，不知“入乡问俗”，仍用这一套，因而招致当地人民不满，影响了军事行动。记得，有的地方不愿让任何军队住用民宅，谁家偶被占住了，即认为有伤门风，如果处女的房间腾出让士兵住过，这个姑娘就不易找到婆家。

我旅由郑州撤退，经彰德（安阳市）车站等候机车上水时，我偕同四五人到城里，拟沐浴、游览名胜铜雀台古迹，顺便访问彰德镇守使王文焕（河南人，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最

近归附东北军的），我等将走到街中心，见有许多商店匆匆关门，旋闻号角齐鸣，行人恐慌，很快就集结不少帮会武装。我等急向城门方向准备出城，城门突然关闭。这时聚结在城门附近的群众，有人要用长矛来刺我，我便大声自我介绍，适遇一红枪会头目认识我，他说：“你不是第十八团刘团长吗？”他曾在沈阳庆仙楼饭店当过服务工人，当年我常到那里请客。他告诉我城门有些官兵与会上的人们冲突起来了，出城要遭到危险，想送我到总会躲避一时。到总会时，总会首知道我旅驻詹店时，官兵曾协助当地百姓割麦子，我曾委任当地会首为旅部咨议。他对我说：“听说城外某部官兵与黄缨会（倾向西北军的）发生冲突，一时不宜出城。”正谈话间，外边集合了千余人，有的扬言要把我们几个人活埋了；有的说，可不能让他们逃跑了。人声鼎沸，我立刻登上桌子，大声向他们说：“我的生死没有关系，我的胸膛还能容下几根矛枪，不过这事应该查出肇事人是哪个部队的，以便妥善处理，不能这样聚众对我来胡闹，你们如果危害了我，应当想到，我们后继部队还有好几师呢，若惹起来更大的纠纷，这和你们保卫人民的意愿合不合？”经我这一说，加之总会首的劝导，他们商定由总会会首护送我出城。我到车站始悉，这一事故是因王以哲部与黄缨会会首发生冲突造成的。同时，由于我被困城内，我旅参谋长王晓云已令一部官兵下车，并将迫击炮放列，正准备向城内攻击和交涉。他们若不及时放我出城，可能演成炮轰彰德城的惨剧。后来我旅列车开动时，突由车站旁一大院里向列车放冷枪，士兵还击了几枪，列车很快驶出，幸未伤人。

我旅撤至保定以后，我去北京晋见张作霖大元帅于怀仁堂，在座的有张学良和总参议杨宇霆，老将问我：“听说你在



彰德还冒了一回险，你们在河南损失的枪炮多不多？”我刚说完“不少”，忽见在我对面的杨总参议向我挤眼扭嘴示意，我随话头一转接着说：“但因后来的几次作战，又进攻开封，缴获敌军的枪炮很多，都补充上了。”这时，军团长张学良也怕我言多有失，便问我：“一飞你还有事吗？”我说：“我这次来京是找军团长的。”他说：“那么我们就一同走吧。”我随他一起离开怀仁堂。原来，自郭松龄反奉失败后，东北军中旧派势力逐渐抬头，而河南战役失利，更贻旧派以口实。张、杨均是新派代表人物，对于河南战役的损失，讳莫如深，多方蒙蔽老将，深恐一旦泄露真相，旧势力就乘机而入，影响新势力的存在与发展。

作者注：据我回忆，郭松龄反奉时，张廷枢和富双英首先脱离郭军回奉，都升任了旅长，月发双饷。我记得张廷枢是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的旅番号记不清了。迨东北军由河南退到黄河北岸时，第十二旅改为第十二师，张廷枢曾一度回北京，继由赵有光任第十二师师长。后因赵师据守黄河北岸不力，致被冯军偷渡，赵师某团长被处决，赵也连带被撤职，仍以张廷枢任第十二师师长。此后，在直隶望都和龙泉关的长城岭等处，我和张师曾并肩与晋军作战。至于本文所述的富双英任第十二旅旅长，仍恐与事实不符，请有关人士指正。（按：据查富双英简历中没有任过第十二旅旅长，只有团长、军长等职——编者）

（写于1964年12月）

## 滦东战役逸事

林宪祖 李振唐 王镜璿

林宪祖充当张宗昌的幕僚多年，北伐时期任山东省省长。在白崇禧奉命解决直鲁联军残部时，白曾邀请直鲁军参谋长李藻麟到开平见张宗昌传达其意见，林适在座。李振唐系东北军第八军军长兼一百一十一师师长，为滦东战役中主力部队之一。王镜璿时任白崇禧部独立第八师参议，代表该师长刘春荣联系各方面，亦参与其事。兹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叙述于下，供读者参考。

### 直鲁联军退集唐山一带前后

1927年6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宣称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1928年初春，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实行“北伐”，于是年5月底，三路大军迫近北京。6月3日张作霖退往关外，翌晨在皇姑屯被日本人预先埋置之猛烈炸药炸死。同月20日，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始返回沈阳为其父发丧，7月4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仍悬五色国旗。

第三、四方面军团所属各军于同月上旬，陆续撤集滦河以

东，军团部移驻山海关。同时，张宗昌、褚玉璞统率的直鲁联军由津浦线败退后，汇集天津、塘沽一带，官兵逃散。旅长何绍南、军长徐源泉和孙殿英，均各自谋出路，脱离直鲁联军。张宗昌鉴于上述形势，亲往芦台召集部队，林祖宪随张左右，张以林系文人，留此无益，嘱其先往奉天，相机联系，林即从天津去大连。张宗昌在芦台召集自兼的第一军和许琨部的第七军，连同其他剩余部队共约七万人，于6月底移驻唐山、开平一带，张驻开平。褚玉璞驻唐山邓家花园，仍以直隶督办身份发号施令，委前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为唐山警察局长，并召集地方绅商讲话谓：“我军兵力雄厚，倘敌军犯境，定被击退，望勿听信谣言。”王说：“我负责唐山警政，以维持治安为主，只带来一个铜铡刀，有敢扰乱治安，造谣生事，或图谋不轨者，即铡为两段！”

是年6月中旬，东北军全部撤出北京后，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所属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八军军长李品仙、骑兵旅旅长郑昌容、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独立第八师师长刘春荣等各部队，继第二集团军冯玉祥所属韩复榘部之后，由京汉线进入北京，分驻西苑、白塔寺、天坛一带，白崇禧住东四头条九爷府（杨宇霆的私宅），第三集团军阎锡山所属张荫梧部，亦由京绥路抵京，阎住北海静心堂内，从此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

同年6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到京，6月上旬，约冯、阎及李宗仁在北平汤山开会。蒋以察哈尔、直隶两省及平（北平市长为冯系的何其巩，而阎系居实力地位）、津两市地盘为钓饵，联阎以压制第二、四集团军的扩张，削弱其武装势力，迫使韩复榘退出直隶省境，同时声称即

将结束军政时期，白部应调回武汉待命。白以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北伐”任务还没完成为词，不同意南调。蒋即令白负责解决退往唐山一带的直鲁联军残余。

白崇禧奉命后，一面令刘春荣师自西苑徒步沿京榆大道搜索溃散兵勇，一面调叶琪军由京奉线东进。开拔前，白闻直鲁军参谋长李藻麟（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留居北平家中，即约其面谈。白对李说：“我素闻张效坤慷慨豪爽，是个可交的朋友，直鲁军与我无冤无仇，亦不愿兵戎相见。不过，我系奉命解决直鲁军残部，不能没个交代，最好张、褚二人同时通电下野，部队改编。至于如何改编，由谁统带，由张效坤自行处理，我决不干预。这样解决，张的部队犹在，而我也完成任务，两全其美。希望你辛苦一趟，赶快将我的意见转达张效坤，并劝他从速办理，勿事迟延，我很不愿意为这点小事纠缠，我还有我们的事呢。”越日，李藻麟同前直隶省财政厅长郝鹏到开平见张，恰巧林宪祖由大连来亦在座。李向张详陈白的谈话内容，并未表示个人意见，郝亦未有所主张。彼时，张宗昌既悲愤其丧师失地，踟蹰一隅，又痛心其多年袍泽临难苟安；环顾追随左右患难与共的部属，怎能撒手而去？在悲感交集的思想情况下，只嘱林宪祖去见张学良洽商过河改编，对于关键性通电下野问题，却避而不谈。随后，林去沈阳，李、郝二人返京复命。

7月下旬，叶琪军进至唐山、开平，刘春荣师进驻丰润县境内，直鲁军于此前退至古冶、雷庄、滦州一带，双方前后部队相距不过十华里，均未构筑工事，亦无任何冲突。不久，白到唐山，在交通大学内召集地方各界讲话：“我负责解决直鲁军残部，和追击土匪一样，用不着正式作战，直鲁军在屡败

之余，已成惊弓之鸟，现在踟躇一隅，饷糈两缺，势必一哄而散，希望大家各安其业，切勿庸人自扰。三民主义是救中国唯一良药，我服膺不渝，愿和大家一致努力，以促其实现。”并摘要讲述民生、民权、民族三章，达两小时以上。

### 滦东战役经过

白崇禧到唐山后，林宪祖已抵沈阳晋见张学良，张说：“白崇禧负解决直鲁军责任，其前锋已到开平，倘直鲁军开到滦东，白部将跟踪而来，滦东是东北的门户，白部若驻在滦东，对东北的威胁太大。你务必转告效坤，就地改编，千万不要过河。”次日，林去见杨宇霆，杨谓：“过河改编不可能，我即到前方，届时与张效坤面谈。”越日，林又去见张作相，张怀着不愉快心情说：“直鲁军的安置问题，我既埋怨汉卿，也不满意效坤。直鲁军是东北军的一部分，从东北出去的队伍。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张效坤出冷口攻占了滦州，以后又转战各地，不能说对东北无功。现在已经跟我们来了，我们还有东北这个地盘，哪能不管呢？我们若是想出安置他的办法，他不照办，那就不怪我们；若不想办法，那是我们对不起他了。后来，我看他们一直没有个办法，我便召集张汉卿、杨麟葛等开会研究，决定张、褚两督办先行下野，直鲁军改编两师。可是，效坤又不愿意，因而一直拖到现在。应当知道，东北地方实在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东北军也得缩编啊！效坤应当体谅东北方面的困难，暂时委屈一点，改编以后，师长还是他的师长，军队仍然是他的军队，遇有机会，他还可以回到自己的部队，有什么不可以将就的呢？你回去好好地劝劝效坤，暂时委屈一点吧，不要固执己见。”林回到山海关时，关内客车已不通，兵车拥塞途中，

无法到开平复命，当即折返大连。

张宗昌由开平移驻滦州后，滦河东岸由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团所属的第十六、十七联合军防守，军部设于安山车站，该军军长胡毓坤与张为旧友，曾一再劝张服从东北方面拟订的改编方案办理，但张要求改编为两军，并由张、褚分任军长，移防滦东。军团长杨宇霆（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原有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三人，韩病故，张留沈阳，以故由杨负责）自沈阳归来后，曾由昌黎约张宗昌到滦河东岸专车上洽商，第一百一十师师长刘翼飞随杨前往。届时，张戎装登车见杨说：“我的军队这么多，仅改编为两个师，师长应该给谁呀！”会谈仍无结果，杨回山海关。张找胡毓坤说，“有一列车，满载我军中下级军官眷属，停留昌州车站，老弱妇孺久住车上，饮食起居极不方便，请放过河去让他们找房暂住，略事休息。”经张一再恳求，胡碍于情面允之，迨列车过河时，车后有直鲁军官兵数十人，亦乘机过桥，因与守军发生武装冲突，虽被击退了，但情况顿形紧张。因此，直鲁军留在山海关车站一带的军需物资及守卫官兵等，均分别被缴械没收了。

张学良获悉张宗昌坚持渡河改编的情况，考虑到张宗昌的处境，深恐夜长梦多，大批军械易落入敌方之手，若准其渡河，在东北军强大压力下，可能就范。遂电杨宇霆及驻防滦东各军，略谓：“准直鲁联军过河改编，如不听命，即行包围缴械，勿任流窜。”电到，第十六和十七军即撤至安山附近，担当正面，杨宇霆进驻昌黎车站督师，第八军李振唐部集结于铁道线以南为左翼，第二十军于学忠部部署于铁道线以北为右翼，第十军王树常部紧靠第二十军之右翼，每军各三个师，连同炮兵及其它部队，战斗人员在十万以上。正面及两翼阵地连

亘三十余华里，形成弓形包围阵势，第八军参谋长谢珂率同参谋人员配属于第十六和十七军军部，以便了解情况的变化，第二十军亦同样办理。安山距滦河三十余华里，中间只隔一石门小站。

8月20日，直鲁军约七万人陆续开抵石门车站附近，张宗昌的指挥专车停在石门办公。当时第四集团军叶琪的部队推进至滦州，独立第八师前锋到达榛子镇以东地区。直鲁军被压迫在东西南北各三十余里的狭小地带，张宗昌见此包围形势，愤怒异常，遂决意孤注一掷，突围出关。越日上午，张在石门附近尚未收割的高粱地内，置香案，设“故大元帅张公雨亭灵位”，身着孝服，手持哭丧棒，率大小军官及部分士兵致祭，祭毕说：“大元帅对咱们恩重如山，若还活着，决不能使我们落到这样地步；现在大元帅撒手归天了，撇下我们有国难投，有家难奔，愿大元帅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吧！”遂即他伏地放声大哭不已，左右挽之起，反身向与祭官兵大声疾呼地说：“兄弟们！你们看看，这是叫我们来改编吗？这是设下了天罗地网，骗我们来，缴我们的械呀！好一个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啊！你这个不肖之子，逼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居心太狠了！兄弟们经过千山万水，挨饿受冻跟我来了，你们舍不得离开我，我能舍得离开你们吗？咱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兄弟们再捧我一场，打出关去，回到东北老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俺张宗昌忘不了兄弟们的好处，行不行啊？”这时官兵一齐振臂高呼：“听督办的，打出关去！”

是日下午，直鲁军除留一小部分防守滦河桥外，全部集结于石门以东，针对第十六、十七军阵地，构筑工事，以梯形配置层层布置，并挖掘交通壕互相联络。傍晚，步哨小有接触，

夜间逐渐激烈，拂晓开始猛攻，张赤臂袒胸督战，震天的喊杀声和枪炮声组成一片混战局面。这样持续了两天一夜，第十六、十七两军以重迫击炮占优势，拼死抵抗，直鲁军略有进展。在两天一夜争夺阵地的反复肉搏战中，战场树木尽秃，房屋坍塌，死伤枕藉，幸而附近居民一闻直鲁军开到，即相率逃避，伤亡很少。

双方战至第二天夜间，张宗昌以全力向对方正面猛扑，追至深夜。军长胡毓坤以电话向李振唐说：“绍晨（李的号）啊，不得了啦，任子礼师的两个团长阵亡，一师全垮了，情况万分紧急，实在顶不住了！”李说：“你我是老同学，咱们不能给同学们丢脸，若被张宗昌打败了，不但叫同学们瞧不起，还有什么脸面见东北父老呢？你沉住气，我马上派两团主力部队驰援，千万顶住。”胡答。“好啦，我尽所有力量和张宗昌拼了！”放下电话后，不到一个小时，第十六、十七军军部电话忽然不通了，李正在惊疑间，参谋长谢珂派联络参谋送一纸条来，写明：“安山车站弹落如雨，军部已落炮弹，准备后退，先把电话撤了。但是现在军部还没退，在调集炮兵和预备队参加战斗，一时还不要紧，请放心。”嗣经第十六、十七军以全部炮火压制了对方的攻势，电话复通。

第三日拂晓，直鲁军转向左右两翼猛攻，接近至第八军阵地前二百米时，发起冲锋，展开短兵格斗，第十军一百一十师曾派王云汉团应援，右翼方面也同样紧张。经过三四个小时激烈战斗，才被击退。是日午间，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化装由滦河乘木船逃走，军长许琨继之，战斗旋即停止。是役共缴械三万余人，分别补充各军缺额，直鲁军死万余人，伤半之。死者由地方征伏掩埋，伤者分由各军军医处收容治疗。此外，有一



小股乘缴械混乱之际，北逃至热河边区为匪；还有一小部分因籍隶关内，中途有投入白崇禧部者。这一战役，白崇禧部未参加战斗。战后，东北军与白部仅一河之隔，交通完全恢复。

在直鲁军缴械时，褚玉璞曾挺身而出，自行报名后说，要到沈阳见张学良。经胡毓坤派人护送到山海关，由军团部副官长高纪毅监送到沈阳，下车时因车站人多，高等四处张望，未加注意，褚即乘机逃往大连。

### 白、杨勾结始末

当白崇禧初到北京住于杨宇霆私宅时，杨宅只有一个老翁留守，老翁名王洋，别号若瑟，山东临沂县人，青帮大字辈，系杨的青帮老师。王由一比国传教士抚养成长，后当传教士，经洽借比国国旗悬于杨宅，以资掩护。王的交游极为复杂，行动诡异，有时还穿喇嘛服装。白住进后，曾向王说：“房内所有陈设，俨如主人在时那样，较之其他东北军政大员的住宅在退却时破坏凌乱情况，不可同日而语，杨督办轻裘缓带的风度，值得钦佩。请你转告杨督办，我系暂时借住，决不损及一草一木，用毕由我负责璧还。”当时杨已退到滦州，王绕道见杨转告，杨表示感谢并致仰慕之忧。王回京后，亦将杨意转报白崇禧。由于王的牵线加之汤山会议的结果，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加深，同时白知蒋欲联奉以壮声势，当即抢先一步，先后派其外文秘书鲍观澄、保定军校第三期同学何家驹（号千里）与杨作进一步联系。鲍系吴佩孚的外文秘书，属于亲日派，1927年直奉合作时，鲍曾与杨相识，何是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之内弟，又系张作霖时代的参谋部次长于国翰的学生，与杨亦认识。在滦东战役刚结束，冯玉祥曾派北平市土地局局长黄建平为代表，到唐

山慰问白崇禧部，白向黄说：“东北问题很可能不用军事解决。”

杨宇霆自张作霖死后，以元老自居，对张学良的轻视逐渐加深。杨素迷信沈阳相士张半仙（沧县人），张经常出入杨家，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张曾相杨貌同韩信，主大贵，而洪范五福，则韩所不能比拟。杨系清末秀才，想到韩信归楚楚兴，归汉汉兴，又体会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的寓意，益自负，渐专横。

是年8月下旬，解决直鲁联军后，正当第三、四方面军团军务繁忙之际，杨宇霆忽到昌黎北约八华里的碣石山，只带少数亲信副官和随从，未带任何幕僚人员，声称避暑，但不去北戴河。杨住在碣石山半山腰的寺庙内，只张半仙随其左右，专车停在昌黎车站。在王若瑟、鲍观澄、何家驹等先后联系下，白崇禧以到滦州观察军队为名，杨亦化装前往（昌黎距滦州七十华里，客车一小时可达）。二人见面约定：“奉桂合作，联阎反蒋。”当时，白与冯玉祥接近，东北元老方面主张与阎锡山合作。白与杨反蒋目的相同，如果奉系能联阎，以拆散蒋阎的联合，白当然没有意见。

杨在碣石山共住了二十多天，临行时以秦皇、汉武曾游此山，当即亲书“碣石山”三个大字及“水流如是”一横匾，由地方雇工在庙后石山上和流泉旁边，题名刻石以记此行。是年9月中旬杨回山海关，白崇禧已由唐山返平，曾派其军长叶琪到山海关见杨，杨陪其去沈阳。在叶的专车过滦河以前，杨电令沿线东北驻军，分段严加戒备。10月间，杨以军团长身份，身着上将军装，到滦东各军驻地，召集校官以上军官讲话，在留守营辎重兵司令部讲话说：“现在战事已经结束，我们要整编部队，使兵精粮足；另一方面要亲仁善邻，保持东北的特殊

地位。”11月间，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撤销，杨回沈阳。他主张亲日，桂、奉合作反蒋，与张学良主张奉、蒋合作，由蒋以中央地位应付日本的政策相左。因而他尽力拉拢东北军将领，对张益形怏怏。张学良曾对刘翼飞说：“我给杨麟葛什么名义他也不就，但是什么事他都要过问。”迨东北易帜，张就国民政府委任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背后骂张说：“自己的爸爸已经死了，还要找个爸爸管着。”那时白崇禧的代表何家驹常住沈阳，经常出入于杨宅，杨死后才离去。

早在9月间，白崇禧由唐山回到北平，行踪诡秘，出入防范很严，因为第八师原系靳云鹗部投向北伐军的，白恐被蒋介石勾引，尽先将其调回北平西苑，在第八师驻丰润县时，曾招兵补充，白乘机将广西籍士兵十余人混入，刺探情报，刘春荣侦知后悉数枪决。至11月间，白将第八师同魏益三部的第三十军（原系东北军）均缩编为旅，并编为第十一师，派其参谋长王泽民兼任师长，以资控制。所有广西部队并未缩编。这时，孙殿英曾联合在南口一带孙传芳的残部，派代表张雅斋约刘春荣共同通电拥蒋反白，因刘不愿与孙共事，拖延未果。

1929年初，杨宇霆被张学良枪毙，蒋介石派何成濬北来。刘春荣曾闻白、杨有勾结，恐时局有变，即电告在津度春节的王镜璿回平，研究对策，嘱其立刻到天津找孙洪伊（号伯兰）介绍见何成濬。王见孙后，孙说：“何已去平？刘杏村（刘的号）的事我已对何说过，请他关照一切。”王赶到北平时，因前第八师参议李祖荫与何成濬同乡，王即去李家，意欲约同见何，恰巧何在李处，当即面谈，何对王、李二人说：转告刘杏村通电拥护蒋介石，借以表示反白，以恢复其师长地位，并将白部的骑兵旅、炮兵团及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有一切全部拨

给刘。后因刘不愿树敌，未即决定。嗣唐生智北来，何成濬为了拆散白崇禧部队，委刘为第十四师师长，魏益三为第五十四师师长，合编为第十军，由何以北平行营主任兼任军长，孙传芳在南口的残部被编为第三十七师，以王金钰任师长，亦归何节制。

何成濬甫到天津时，白崇禧驻西山碧云寺‘王镜璿对刘春荣说：“据说杨宇霆与白崇禧早有勾结，现在杨被枪毙了，蒋派亲信何成濬来平，恐大局有变化，白在北方站不住脚了。”刘说：“不能啊，昨晚我还在碧云寺和白见面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你在这里吃饭，我去看看。”刘即去碧云寺，据白的卫兵说：“白总指挥因病已去医院治疗。”刘回来对王说：“白崇禧已经走了。”唐生智北来，就任了第五路军总指挥新职，先后到唐山、北平将叶琪和李品仙的两军接收。白化装乘船南去后不久，蒋桂战争就在武汉爆发了。由于驻防黄冈、麻城一带的李明瑞部倒戈，桂系第七军军长杨腾辉部投蒋，北伐后的第一次蒋桂之战，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写于1964年9月）

# 蒋桂战争中的冯玉祥

黄 建 平

## (一) 战争起因

1928年冬季，东北三省易帜，北伐的军事活动就算结束了，蒋介石的政权得到初步稳定。为巩固其统治，蒋介石首先下令撤销武汉的政治分会，并且准备把桂系控制的武汉和两湖地区掌握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使蒋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其次，192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各集团军总司令均被邀出席，冯玉祥、李宗仁先后到了南京，阎锡山则托病没有如期到达。蒋、冯、李就编遣事项进行磋商，各方意见有很大距离，正式会议召开之前，蒋提出除东北外，全国共编50个师，各集团军提出各自的编遣方案。阎锡山12月中旬到宁。会议上，冯玉祥提出编遣原则和各集团军编师数额，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部队编8个师。蒋对此提案未置可否，阎表示不同意冯的提案；在蒋的授意下，阎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余非正式部队编成6至8个师。这一方案以多数通过，但各方并未有执行的具体步骤。最后，蒋提出设立一个编遣委员会，处理编遣事宜。会议无甚结果，不了了之。

冯玉祥在会议上看出了不宜再与蒋合作下去，转而与李宗仁进一步结合。一天夜间，冯派人叫我去他房间，冯说：“看近几天开会情况，证实了蒋介石、阎锡山确已结合起来，对我们团体极为不利，今后你应与桂系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藉以获得各方面的消息。”我随即见到李宗仁，将冯对我说的话向李略为透露，他颇为高兴。因李宗仁早有反蒋之心，但是害怕蒋、冯合作来对付他。过了两天，李宗仁与冯玉祥会面，经冯、李商量决定，对外借口同游中山陵，同去南汤山温泉洗澡，同往明孝陵游览为名，就在这几处进行密谈。李首先表示，蒋介石排除异己，实行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对第二、四集团军不怀好意，一定要反对他。冯也表示，对蒋介石的削弱和消灭异己军队，把持中央政权，干涉地方行政的作法，是坚决反对的。经过几次密谈，二人已取得一致的认识，共同商定对付蒋的办法是：坚决不执行编遣会议的决议，蒋若使用武力来压迫，则抵抗到底，互相支援，决不屈服（关于冯、李游园、洗澡、游明孝陵，笔者均随同，而冯、李密谈和反蒋办法，笔者没有参加，在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时，冯派我去武汉观察形势，在汉口会见李宗仁，是他对我重述与冯在南京密谈的决定的。我当时以为李的意图，希望冯早日履行共同对付蒋的办法，迅即出兵援助，壮大声势，振奋军心，我就把李的谈话情形电告冯玉祥）。

冯、李协商妥当后，李宗仁反蒋决心更加坚定了，随即离京返回武汉，部署军事，并急电驻唐山的白崇禧把驻北平的李品仙和驻唐山的叶琪两军迅速开回武汉。这时蒋介石也在皖鄂边境集结海陆军大部兵力，因之，蒋、桂之间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这固由于蒋、桂双方利害冲突所引起，但冯玉祥的言谈和

行动中，也起了推动蒋、桂破裂作用，以致促成北伐甫定之后，又一轮争权夺利的战争。

## （二）冯玉祥在蒋、桂战争时的动态

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上提出的编遣准则和方案，遭到蒋、阎反对后，冯对蒋固然不满，对阎亦甚愤恨，乃决计对蒋、阎予以反击。当送走李宗仁后，冯即令我回北平土地局局长原任候命。我返抵北平后，与第二集团军在北平任市长的何其巩会面，随后又与在北平的第四集团军的高级将领李品仙、郑昌璜等见面，并将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前后情形概略叙说，同时把冯、李与蒋、阎的意见分歧和冯、李有进一步合作的事实，略为向他们透露一些。我的用意是希望第二、四集团军在北平人员也加强团结合作，他们均表示同样的愿望。在冯玉祥将要离南京往百泉（在河南辉县）“休养”时，曾电告我速往唐山见白崇禧，以观察白的言语和行动。我即具备些回民食品，以代表冯慰问白为名前往唐山。会见后，白询问编遣会议最后情形甚详，我当即告知他自冯、李两总司令在京密谈多次后，第二、四两集团军已进一步结合，商定对付蒋介石的办法。白亦告诉我，李总司令曾派专人来唐山把其中经过情形告之。他正准备将第四集团军驻华北各部队撤回武汉，惟近来火车车辆不足，感到些困难，要我转告冯总司令，所有一切，他一定按李总司令的计划进行，请冯总司令放心。我遂星夜返平，将与白崇禧谈话经过，写成报告派专人送往百泉交曹浩森转冯（冯于1929年2月初到百泉的）。

李宗仁在武汉派高级参谋温翹笙为代表到百泉谒见冯玉祥，向冯陈述李已下决心反蒋，正在部署军事行动，希望冯动员

出兵一同反蒋，但没有提到把蒋介石打倒以后，分给冯以何权利。冯对温表示：“我一定反蒋，但调动军队需要一些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反蒋后，桂方军队能够与蒋军战斗两星期，到时我一定响应。”温即返武汉复命，李得此保证，更加坚定反蒋信心。不久，蒋亦派代表邵力子来百泉见冯，促冯回京共商国事，冯表示暂不回京，愿意辞职出国留学。邵因不得要领，即回南京复命。当时，第二集团军大部分部队驻河南、山东和豫鄂豫皖边境，蒋、桂双方都需要冯出兵帮助，冯玉祥的动态如何，不仅为蒋、桂双方所注意，而且为全国各派势力所重视。因此，冯的举措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冯玉祥会见温翹笙、邵力子之后，认为蒋、桂一战已不可避免。即令韩复榘率部进驻信阳、武胜关一带，又命石友三由南阳率部进驻襄樊附近，均须待命行动。冯又致电北平市长何其巩转告我即赴百泉。谒见时冯对我说：“蒋、桂战争即将爆发，你即往武汉观察形势，把双方军事情况，随时急电报告，以便决定我军的行动”等语。我心里想，冯玉祥这样调兵遣将是帮蒋介石打桂系，或是援助李宗仁反蒋，冯对外固然没有明确表示，对我也未透露半句实情，我到武汉会见桂系人员又如何说话呢？我在火车上沉思不已坐卧不安，最后决定，到武汉会见桂系人员以冯玉祥派我来与李总司令密切联系，以便动员出兵为词，究竟是帮蒋或是助桂，我就不谈及，以免失信于人。到达后，首先去与温翹笙、潘宜之会面，他们告诉我最近双方都在积极部署部队，大战不可避免，第二集团军已否动员，此间官兵盼望甚切。我答复说，第二集团军部队防地辽阔，冯总司令正在下令集中军队，但需要相当时间云云。随后去见李宗仁，他急忙问我，第二集团军已否动员出兵？我以答温、潘的



话告李。李又紧张地告诉我，目前前方军事非常紧迫，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希望你迅速电冯总司令动员出兵，共同反蒋，以实现在南京商定的计划等语。我遂即去电将武汉情形报冯。电报发出多日，未接到冯的复电，我焦急万分，这使我无法继续与桂系人员谈话。

我在进退维谷之际，桂系李明瑞、杨腾辉两部叛桂投蒋之事突然发生，蒋、桂双方前线亦发生武装冲突，武汉形势更加紧张起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我随移住汉口友人家中，观察前方战况，再定个人行止。

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冯的打算是，蒋、桂果真发生战争，是他发展实力，扩张地盘的绝好机会，采取观望取巧的态度，等到蒋、桂双方武装冲突伤亡过甚，精疲力尽之时，即出兵占据武汉，然后出面调停，就可以名利双收；李宗仁的打算是，希望冯能够一同反蒋，促使蒋介石垮台，最低限度也希望冯不至于出兵帮蒋；蒋的打算，则是设法拆散冯、李合作。冯玉祥从个人主观愿望出发，于1929年3月间离开百泉移驻华山，坐山观虎斗。这时，李宗仁下令解除亲蒋的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以桂系人员继任，把桂、湘、鄂联成一片，便利军事行动。蒋、李破裂已达公开化，蒋感到战争已不可避免，遂派邵力子、贺耀祖先后到华山见冯，望冯出兵合力进攻桂系，俟把桂军击败后，就把两湖地盘给冯。冯这时利令智昏，认为出兵助蒋即可达到扩张地盘的目的，随即答应出兵十万助蒋打桂，把在南京与李宗仁密商互相支援的计划丢到九霄云外，但是他对外仍然没有明确表态。直到李宗仁部李明瑞杨腾辉两旅叛桂投蒋，蒋军已占上风时，冯玉祥才发出通电讨伐李宗仁。以此种种变故，致使桂系士气沮丧，全线

溃退，蒋军乘胜进击，终于占领了武汉。李宗仁率部退回广西，蒋、桂之战也宣告结束，可是两湖地盘冯玉祥也没有捞到。

### （三）冯玉祥的失望和努力

1929年4月间，冯玉祥原拟在蒋、桂激战胜负未分之时，下令韩复榘由信阳、武胜关进占武汉，再向双方进言调解。不料桂系李、杨两部被蒋收买叛桂，战场发生急剧变化，李、杨两旅反向武汉进军。蒋急令陆海军迅速挺进猛攻，武汉遂被蒋军占领。蒋介石也急乘兵舰很快坐镇汉口，并急电韩复榘阻止其军队南下，又在汉口令韩本人到司令部会面。韩遵命至汉口谒蒋时，受到热情招待，蒋竭力表扬韩的战功。其用意在于为利用韩复榘收买分化冯玉祥部下打下基础。

蒋介石到汉口时，我尚在汉口，蒋系特务已注意我的行动。适有曾在南苑检阅使署参谋处见习官邵子举，他亦随蒋军到汉口，他知道我的住处，特来告诉我速离汉口，免遭麻烦。我遂星夜搭外轮离汉口，经上海、天津转道赴华山见冯，报告一切经过情形。这时，蒋介石对人表示：冯玉祥虽然答应出兵帮我打桂系，但实际没有出兵参加作战，后来虽然发出讨李宗仁的通电，也是在桂系军队将被击溃之时，所以两湖地方不能给冯。冯玉祥闻此，认为蒋违背了他托邵力子、贺耀组在华山对他所说的话，感到非常失望。同时也联想到北伐时，第二集团军战绩较大，伤亡较多，而且首先占领了北平，而蒋介石竟把河北、平津地盘分配给阎锡山，这次又受欺骗，故对蒋更加愤恨。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召集将领在陕西华阴开军事会议，部署反蒋军事计划。不料会后不久，韩复榘联合石友三于

5月23日发出脱离冯军拥蒋的电报，这不但使冯的反蒋计划落空，而且使自己的军队也被瓦解。冯在精神受此意外打击，对所部军队的自信心，已不如以前那样坚定了。

冯玉祥感到处境困难重重，今后如何应付强硬的对手呢？再三考虑当前情况，唯有竭力联合阎锡山共同反蒋才有出路。于是冯不顾一切危险，于6月下旬渡过黄河到山西与阎锡山商量反蒋计划。在冯由陕渡河赴晋前夕，他又派我返回广西以省亲为名，携带其亲笔信往桂林晋见李宗仁、白崇禧。信的大意是，除安慰李、白外，并陈述蒋、桂战争激烈时，第二集团军部队因集中不及时，是以未能支援作战，表示歉意，希望今后加强团结，密切联系，彼此切实计划再行反蒋等语。李、白阅冯信后，反应冷淡。他俩对我表示，武汉战争失败，由于其军组织不够严密，军队战斗力也不坚强，目前决计坚守广西，培养实力，待机再做进取。托我将他们的意旨转报告冯，不另写复信。

这时，李、白在广西向军民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以维护割据广西的局面。我在桂林住了一个月，即绕道香港、天津到山西建安村向冯报告与李、白谈话的经过。以后我就暂住在太原。虽然经过时间很长，冯也受到许多委屈，终于在1930年4月发动了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但因张学良出兵助蒋，冯、阎遭到失败，相率通电下野。冯玉祥倒戈不成，反而把老本都输光了。假如当时他同李宗仁能够真诚合作，在蒋、桂战争一开始，第二、四集团军合力对蒋，可能会打出一个新的局面，甚至把蒋打垮亦未可知。

（写于1964年8月）

## 天津羊圈业始末

穆静菽

天津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大城市，除汉族人口最多外，在其他少数民族中，回族人口较多，除散居在市内各区及郊县外，大多数集居在红桥区西北角一带和北郊区天穆村。由于回族人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生活习俗与汉族不同，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禁食猪肉等，而以牛羊肉为主要副食品，在回民清真饭馆中又以全羊大菜为清真菜系中最受欢迎的菜肴。解放前著名的清真饭馆有：会芳楼饭庄（原址在今滨江道邮局对过），鸿宾楼饭庄（原址在今和平路卢庄子，因经常接待西北各地回民，饭庄内设有礼拜之处）。在南市有燕春楼、会宾楼、又一春等；另外还有包子铺、烧麦馆、饺子馆等数十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鸟市白记饺子铺，西南角杨巴饺子馆、辽宁路天祥后恩升饺子馆，南市增兴德包子铺，东门脸一间楼恩发德包子铺。此外还有专卖生、熟羊肉的店铺二三百家。上述饭馆、熟食店每日需要大量的牛、羊肉和羊下水（内脏），他们的羊肉来源于批发商“羊圈”。

羊圈业是个比较大的行业，多为回民所经营，他们由内蒙各地区采购活羊赶运牧放来津，存入自己设置的圈内（多在西营门外洼地）喂养存放，屠宰时赶到屠宰场（市内在小西关六

合里)由阿訇按教规屠宰,然后供给各饭馆和羊肉铺。

虽然各地农民也有牧放养羊户,但为数不多,羊肉的质量远不如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所出产的绵羊肉质肥嫩味美无膻味,数量多。牧民集散地在各盟和喇嘛庙(今多伦)等地,其中以昭乌达盟(赤峰专区)、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三个地区所辖范围很广,约有数千平方里。集中到多伦的活羊大多销售给天津;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三盛公专区所产的绵羊则集中到呼和浩特多供给北京羊圈商号;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哲里木盟(通辽)所产的羊多运销到长春、黑龙江、沈阳等地。

自晚清咸丰、同治年间以来,天津市内和天穆村的回民所经营贩运活羊的“羊圈”有十多家,其中规模比较大、经营年限比较久,业务比较好的有:世兴、义兴、万兴、长兴、恩义、德盛、义成、源顺、义顺成、庆丰合、谦发、洪祥等。

清末到民国初年仅北郊区穆家庄(今天穆村)就有大小羊圈十八家,其中长年去内蒙多伦的有五家:即德盛号,经理人穆文福;义成号,经理人穆成安(日伪时期羊业公会主委穆溢清之祖父);源顺号,经理人穆兴让;义顺成号,经理人穆文敏(穆静菽之三叔,此人在“七七”事变前曾任天津市商会委员,他虽在二十多岁时双目失明,但仍善于经营业务)。

在内蒙多伦有如羊圈商号的“相与”(即今“关系户”),这些旅蒙商号多为山西人所经营,此外还有河北省张家口、枣强、衡水专区的商号二三十家。这些商号贩运商品种类很多,包括丝绸、布匹、百货、日用小商品、食粮、粮、盐、茶叶、砖茶、卷烟、烟叶(甘肃兰州产的东生烟)等。每年旧历正月月底二月初把商品运到内蒙居民住地销售,牧民以活羊互相交换。

活羊的成交每年分四季，即旧历正二三月、四五月、六七月、八九月、十十一月十二月四个季节，俗称“标期”，结算时多以物易物，折合当时货币每只羊的价格按不同的年龄估价（以羊的牙数算年龄，如四六个牙为七到八岁口）。每只羊屠宰后能出羊肉净重在30市斤以上，平均在36~40市斤者，每只买价在纹银二两左右，以买四个牙到齐口为好，通常以买瘦骨羊在放牧赶运途中吃鲜草能长得肥大，得利最多，俗话说春买干、秋买膘。由春季开始以牧放为主（在内蒙古多伦县城外大草原，京津羊商皆设有牧放驻地）。如在每年旧历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经过一个月的牧放路程，一路上吃的都是鲜草，到了天津后都成了大肥羊，这样比较在羊圈里喂养的羊要好得多。在赶运时每次由340~360只为一个“群”，每一个羊群由三个工人负责保护赶运到津。这种工人名叫“趟工”，其中有一名组长，这种工人都是对赶运牧放具有三四十年的丰富经验。

按活羊赶运来津途中，边走边牧，每天约可行走30里左右，每人每趟工资15两银子，3个人赶一群，其中组长1人，工资为20两，在放牧期间路途中所需食住费用另外报销。在途中如有羊只死亡，趟工有权处理，但须把羊皮捎回作为凭证。

为了便于识别各商号自己的羊只，在买来活羊后在羊背后上方打印油漆标记，例如义成号打印“大”字，义顺成为“上”字，元顺号为“元”等。

现将几个比较大的羊圈商号概况简述如下：

**恩聚合** 经理人张宝聚，每年运纸烟、煤油等到多伦，买回活羊两千只左右，到秋季赶运来津。张宝聚父子5人，雇佣十几名临时工，日本侵华时期被迫停止。

**德盛号** 该号为当时最大的字号，经理人穆文福，由他的弟

弟穆文玺去多伦负责采购，除会计、长工外还雇佣趟工五六十人。由多伦到天津约有1000华里，每年赶运来津50多群羊，约2万只左右，每年净得利润四五千两银子。到了民国初年因市场活羊价格波动，资金周转困难，再加上管理不善、家务开支大及后继无人因而倒闭。

**义成号** 规模也比较大，经理穆成安和他的两儿子穆祥庆、穆祥立经营。穆祥庆在天津，穆祥立（敬忱）在北京经营，业务极为兴盛。穆成安原先是搞运输的，他有大马车二三十辆专为钱庄拉运银子（俗称“钱车”），由天津到北京、山西、太原等地。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他给天津志成信银号拉运银子，在去北京途中正值战争混乱时期，为了保护银两不受损失，他把载有万八千两银子的钱车拉到他的家中，用骡马粪把银子埋藏起来，保存完好。战事过后，穆成安到志成信银号对经理汇报他的行动，因此得到经理的信任。不久他要求改业，经营羊圈业，需要筹借些资金，当时就得志成信银号的资助。

穆成安父子往多伦采购，初创时是和穆兴安搭伙。二年后即分伙，穆成安又与穆兴让合伙，经营了三四年后又分了伙。每年运津活羊三四十群约有一万多只。在外面采购的职工大都是本行业的老职工，如韩雅亭、张永顺、杨文玉等人，把原来老字号长兴、万兴的“相与”全都联系到义成号，因此业务兴隆，获利甚多。1926年义成号分了家，其长子穆祥庆开办庆丰合，次子穆祥立（敬忱）开办谦发号，他在羊圈行业为最突出的一位人才，除在天穆村有谦发号外，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村开办德发店，代客买卖牛羊，还在北京后门大街开设大德恒油粮批发店，他在北京商业界也很有名望。

穆祥庆的长子穆溢清开办鸿祥号羊圈，日伪时期曾任天津

市羊业公会会长。次子穆瑞光（效武），颇有文才，能医、能画。羊圈由韩雅亭负责采购。

1921~1930年天穆村人经营的义顺成、德盛号、源顺号相继倒闭，只有义成号一家继续经营。

在三十年代和敌伪时期，羊肉市场情况有淡季、旺季之分，在农历八月中旬以后开始进入旺季（在大白菜上市以后），到九十月份更为畅销，彼时每日市场销售活羊2500到3000只。活羊的质量要求也很严格，大部分来源于内蒙草原，只有10%左右的活羊来自河北省东北部、热河、古北口一带以及唐山东部地区。

当时供应市场的羊肉批发有两处，一是本市北郊区天穆村各批发商号，二是市内红桥区西北角回民聚居处各批发商（各批发商在村内设有饲养圈和存放圈）。市内批发商大都在西营门外四座坟处（今黄河道西）设有存放圈。

旺季在农历八月中旬以后到春节后正月下旬。当时有“金九月”、“银十月”之称。淡季在每年旧历二月份以后，销路逐渐下降，以致每月市场销量只在一二百只上下，直到三四月份鱼虾大量上市以后，羊肉则无人问津，此时各批发商也就没有库存活羊了。

天津沦陷后，成立了羊业同业公会，穆溢清为会长。当时天穆村有10户，市内有6户。同业公会代表这16户和日商大蒙公司（在张家口，原来是日商大仓洋行）、畜产公司、内蒙古生计会及四五户内蒙当地的商人交往。1936~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在张家口成立蒙疆政府，主席为德王（蒙族），这些蒙族商人经营的牛、羊都是用火车装运，在张家口成交，直接卖给津、京牛业同业公会和羊业公会。



解放后到了1952年这个行业的几家大户找到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干一同志、办公室主任秦良同志，建议成立同业组织以便进行采购。通过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协助，成立了“牛羊寄桩业公会”，会员共有36户，主任委员由义元生号经理穆静荪担任，副主任委员为穆瑞长（长记号经理、穆怀忠之叔父）和白风云（云发号经理）。其中较大的商号为北马路的起福祥牛羊肉铺，经理人是穆祥仁；辽宁路的北洋牛羊肉店，经理人是刘松亭，此人是本市第一家卖涮羊肉用的羊肉片的创始人，他每天能用手工切片一二百斤，而且服务周到电话送货，销售给各清真饭馆，后来起福祥也卖了羊肉片。当时人工切羊肉片讲究质量好，无论在选料方面和切的厚薄都要严格掌握，需要一定的技术，驰名津京的切片技术工人名为谭德臣。

1953年以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食品公司，至此私商外出采购活羊的这一羊圈行业终于消失了。

## 敌伪时期天津的屠宰场

刘家才

我从16岁起便到天津聚沅恒猪栈当伙友，那时大约是1935年左右。后来我又干起了宰猪这个行当，一直干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并到食品厂工作为止。回想起来，我在聚沅恒开始宰猪时，正是敌伪统治时期，那时，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屠宰场去宰猪，因而亲眼见到了屠宰场的官老爷们敲诈勒索、欺压猪栈以及猪栈欺压猪贩子的种种罪行。现在我愿意把我所见到的这方面情况介绍给大家，但因事隔久远，有些细节我已记不清了，尚希知情者予以补正。

### 屠宰场概况

提起屠宰场，人们都知道那是个又脏又臭宰猪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却是天津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屠宰场场长也就成为官老爷你争我夺的一个肥缺。“七七”事变前，天津屠宰场隶属于财政局，场长由财政局委派。敌伪时期改由警察局第五科，也就是食品卫生科管辖，场长由警察局委派。屠宰税（又名割头税），由财政局指派的驻场人员负责征收，屠宰场无权过问。屠宰场不仅是官办的，而且还是专利，天津市民要屠宰猪，都得到屠宰场去宰，只有屠宰场宰

的猪拿到市面上去卖才是合法的，否则就是贩卖私肉，要受到处罚。

屠宰场人员包括场长、检疫人员及管理人员，虽说屠宰场是宰猪的地方，但是场方并不配备屠宰人员，宰猪得由猪栈的人到屠宰场来。屠宰场的设备极其简单，只有一个猪圈，两口大锅，雇佣二三个伙友供给退猪用的热水，屠宰用的一切工具都得由猪栈自己预备。

### 猪栈的组织及业务经营情况

在天津经营猪栈的人可分为外县帮及天津本地两帮。外县帮多为保定府及东八县一带的人，当时人们称这些人为东帮。天津的猪栈大多为东帮经营，天津帮经营的则很少。

成立猪栈必须经过屠宰场的认可，凡属有关屠宰的一切事宜，均由猪栈与屠宰场共同办理。为了便于控制起见，屠宰场尽量限制猪栈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猪栈有24家，其中西于庄区计有：李记、顺兴永、聚沅恒、义元永、茂顺永、天隆、三益永、明泉永、玉兴成、聚德、永茂、玉记等18家，郭庄子区包括三合永等3家，宜兴埠有东发等3家。此外谦德庄还有几家，字号我记不清了。

猪栈是小本生意，可以说没有什么资本。其主要业务对象是外地猪贩子运来的毛猪。猪栈设有猪圈，备作猪贩子落脚后存毛猪之用。猪贩子落脚到猪栈后，该猪栈即代其向屠宰场申请屠宰等一切事宜，代垫割头税、代售猪肉。

### 屠宰场内的勒索

屠宰场看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场所，可是毛猪推进去，不

经过重重关卡，是无法变成猪肉的，上至场长，下到看门人都有机会有猪贩子进行一番勒索。

**场长的勒索** 宰猪需向屠宰场递申请书，批准权掌握在场长手里。每次申请书递到场长手里，他不是摇头就是摆手，不是说没时间，就是说人手不够。猪贩子哪儿等得起，特别是逢年过节，早宰完好多卖点钱，所以猪贩子只有千方百计使场长满意，申请书才能得到批准。

**检疫人员的勒索** 场长批准后，毛猪还得经过检疫大夫验证无病方能屠宰。于是乎，穿着白大褂的检疫大夫在屠宰人员及伙友等一行人的簇拥下来到猪栈的猪圈前，大夫先让人把毛猪轰跑起来，仅凭肉眼一看，就对伙友说：“把那几头猪隔开，那几头不行，有病，其余的也不能宰，都得打预防针，打完针再说。”说话间便从伙友手里的红颜料桶中提起红笔，往猪身上画记号。画个大红杠，表示要扣去50斤重量，打个红叉，表示扣去30斤，画个红圈，表示扣去20斤。其实有些猪不见得有病，而是以病猪为理由进行勒索。猪贩子受不了这种克扣，急得跪在地上请求大夫免落红笔，然后赶紧把大夫请到猪栈的账房里，悄悄地把钱送上。钱一到手，检疫大夫立即改口说：“让他们自己办吧！”说罢扬长而去。

**屠宰人员的勒索** 过了检疫关，接着就要过屠宰关，这个关同样不好过。“请假的人多，人手不够，宰不了！”“数量太多宰不了！”“没时间，等以后再说吧！”总之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只要钱一给足，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至于每屠宰一批毛猪要勒索多少，具体数字我已记不得了，反正以我个人而言，我每月的工资是16元，实际收入可达百元，由此便可见当时勒索之一斑。

**烧水、挑水伙夫的勒索** 屠宰完的猪需要褪毛，场方预备了两口大锅。可是这个关打点不好，同样是过不去。“今天没有劈柴，烧不了水！”“劈柴湿，点不了火！”“你看，肩膀都压红了，担不了水！”一旦钱到手，什么问题都没有了。除此之外，伙夫们还有其它的勒索办法，那就是让猪栈给他们留下几付下水。一般一付下水约重3斤，而给他们留的得挑分量重的，一付少说也得5斤多，就这样，3斤买进，5斤卖出，从中又捞一笔油水。

**收税人员的勒索** 按规定应一头猪过一回磅，然后按每头的重量收税，但检斤人员无暇逐头过磅，而是几头猪合在一起过一回磅，而后求出个大概数，就凭此开票，并据此征收割头税，上完税在猪身上加盖图章，证明此为官肉。各种手续完毕，只剩下放行这一关了。肉已装上了排子车，等着放行。屠宰场放行不是凭出门证而是凭摇铃，一摇铃便放行。可是摇铃员手里拿着铃，围着车子前后左右地转，就是不摇铃。很清楚，谁能早赶到肉市，谁就能卖好价，赶上年节更是如此。如果到赤日炎炎的夏季就更麻烦，场里没有棚子可以遮阳，大毒太阳直晒着，晚放行不仅卖不上好价钱，而且有的肉都能捂臭了。因此猪贩子们只有赶紧把钱递过去，他才摇铃，看门的才开大门。

**看门人的勒索** 从放行看，看大门的人听到摇铃就开门，似乎没有什么勒索行为。其实不然，看门人是在猪贩子进门时作文章。为了多卖点钱，猪贩子都早早地把猪赶到屠宰场，可看门的说：“我刚下夜班，得睡觉，开不了门！”或者“我不能来一批就开一回大门，我受得了吗？等着吧！”这就是要开门钱，钱到门方开。

## 猪肉的销售及副料的处理

猪肉的销售系由猪栈代猪贩子办理，猪肉统由侯家后肉市收购，猪栈从中得到2%的佣金。猪贩子在猪栈的吃住一律免费，每顿饭有酒有肉，但售肉款猪贩子不能全部拿到手，而是由猪栈分期付给，有时猪栈仅给几笔，其余的就不给了，猪贩子便摊上了“黄账”。但如果猪贩子与猪栈的交情深，不仅不会吃亏，而且碰到肉市行情不好的时候，猪栈便将其毛猪暂时存圈，并代垫一切费用，等候有利时机再屠宰。

猪肉副料包括猪头、下水、猪毛、猪鬃、猪血、小肠、尿泡、胰、沙肝及油肝等。我记得分配情况是这样的，猪头、下水归猪贩子；猪毛、猪鬃、猪血、小肠、尿泡、胰归猪栈；沙肝、油肝归伙夫。但不是将上述实物分别分给猪贩子和伙夫等人，而是由猪栈将除去猪毛和猪鬃以外的几种副料全部转包给赶大羊的（即专收副料的户，他们都有执照，免税包收副料），赶大羊的根据每种副料的单价和重量同猪栈结算。赶大羊的包下副料后，又转手往外批发，将猪血卖给专收猪血的户，其它副料则卖给小贩们。猪栈与猪贩子的结账，则是把每一个猪头或一付下水折成肉价付给猪贩子钱。至于猪毛和猪鬃两项，均按每头猪的毛和鬃折合为一元付给猪贩子，而实物则由猪栈积攒到一定数量后经跑合之手卖给洋行。

## 死猪的处理情况

死猪多系病死、运输途中挤死或闷死，死猪是不许可出售的。有了死猪，猪贩子不敢卖，猪栈、屠宰场也不敢收，但是屠宰场场长有权处理死猪，他以每头6元的作价把它收进来，然

后以每头25元的价钱转手卖给西于庄一个姓隋的人，一买一卖，场长每年可以由此赚到一大笔钱。无论怎样更换场长，死猪均卖给隋姓专业户，他再把死猪肉卖给小贩，听说有的小贩把死猪肉做熟或炼油后在市面上出售。

另外米猪和囊虫猪两种猪肉，也不允许在市面上销售，但同样有人包收，此人住在东浮桥附近，名叫于万盛，他将肉买进后转手再卖给当时东南角的一个包子铺及在南市卖包子的小贩。

### 受剥削者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层层盘剥、勒索之下的受害者是猪贩子和养猪户。有的猪贩子被敲诈后无法回老家向养猪户交待，只得撇下自己的妻儿老小去闯关东。敌伪时期，屠宰场一天一夜要宰四百来头猪，一个月上万头，在这过程中，不知有几人倾家荡产？

后来一些日本浪人看出屠宰场有很肥的油水可得，他们便成立了一个“组合”，垄断了宰猪及猪肉销售的一切业务。这样我们的一点油水也被他们吸走了，生活难以维持，于是我便离开天津到唐山谋生。至于组合后的情形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张大海整理）

## 天津牛奶业发展述略

李若愚 曹梅村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不少洋人涌进天津，然其生活所必需的牛奶及奶制品却很难觅得，初期只能以罐头牛奶代替鲜奶。至1894年前后，个别洋人自养乳牛，挤奶自用，剩余的卖给别人。不久有一俄国人看到牛奶业是冷门，有利可图，便买进十余头乳牛，在小营门附近办了一个阜昌牛奶房。随后又有德商泰代、英商兴泰两家相继在小白楼及黄家花园附近开业，雇佣中国人饲养、挤奶和送奶，乳牛则以放牧为主，开支低廉。每头乳牛每天可挤牛奶10瓶（啤酒瓶），每瓶售价银币2角，其利润之厚由此可见。

1902年，泰代工人赵某摆脱外国人的剥削，在黄家花园附近办起了中国自己的牛奶房天义成。但因资金少，无力购买良种乳牛，便以每头30至50元的价格从农村购买几头耕牛，每头牛日产量在两瓶左右。他以每瓶银币1角5分贱价出售，同洋人争夺市场。以后又有义和顺、东发顺、玉和成、玉泰成和德利相继开业，其经营方式皆与天义成相同。

帝国主义在天津划定租界后，牛奶业受到限制，多数牛奶房被驱逐到边缘地区经营，俄国人办的阜昌迁至黑牛城建场，直到1943年歇业；中国人的牛奶房则迁移至河东唐家口、东局



子等地区。自1902年至1920年中国人干的牛奶业略有发展，除前述的6户外，尚有同和永、日新永、祥民益大小二十余户相继开业，生意可称兴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白俄”流亡到天津，对畜牧有经验的叶林（外号大傻子）从东北及内蒙运来数十头俄国杂交乳牛，在河东大王庄附近开业。自1920年至1945年的25年间俄国人开办的牛奶房有欧洲、大狮子、柏合、卫生、合众、哈尔滨、大来、瑞士、桑托司、西板、瓦西利及摩吉等十余户。除瓦西利、西板和摩吉三户较小外，其他各户都拥有80至120头乳牛。在此期间，还有日侨的金牛斋、东方、天津、向阳；意侨的义德；法侨东德；美侨的郝克等户分别在万德庄、西湖圈、河东唐家口大红楼及佟楼等地建场营业。其中金牛斋供应对象是日租界内的机关、学校、医院和日侨等，业务甚佳。东方、天津、向阳三家皆以侵华日军为主要服务对象。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牛斋被天津市国民党卫生局接管，其他3户被“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收处理。

1935年以后，中国人经营牛奶业的户数明显增加，大华、德华、石氏、家庭、健康、智芳、三大等四十余户在佟楼先后开业。在河东凤林村、唐家口大红楼、东局子等地则有清华、德利成、德兴永、瑞记、通顺永等大小三十余户设场开业；在河北小王庄则有志立祥等十余户。与此同时，自东北陆续迁移来津的永利祥、德利、日鑫勇、赵记、黑河等二十余户在河北、河东及河西觅址开业。截至1945年，天津经营牛奶业者可达百余户，拥有乳牛一千八百余头。

日本投降后，美货充斥市场，美国的KLIM牌全脂奶粉每磅只售价3元左右，与本市隆瑞兴生产的百鸽牌脱脂奶粉价格

不相上下，因此国货销路受阻，加之军需奶制品全部停产，鲜牛奶的销路受到严重打击。虽然牛奶以每5瓶1元法币的价格出售，也不能做到产销平衡，牛奶场不得不采取存储奶油待机出售，而将脱脂奶扔掉的措施。入不敷出则以屠宰乳牛的办法维持现状，因而歇业者日有所闻。自1945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津市乳牛从一千八百余头减少到一千二百余头，当时经营牛奶业者则有人吃牛，牛吃牛的感受。

牛奶业经营方式可分两种类型，一为批发户，多集中在河东和河北两区，所需劳动力较少，开支低，成本小；另一种为零售户，大部分在河西佟楼一带，所需劳动力较多，开支较大，但收入因批零差价亦随之增多。在各区内亦有少数批零兼营者。俄国人办的牛奶房除个别小户外，在小营门一带皆设有门市部，以专营鲜牛奶，兼营罐头食品，其营业之盛可执天津牛奶市场之牛耳。

因各区所畜乳牛品种不同，产奶量亦有差异。河东区的牛多系蒙古良种或土洋杂交种，平均日产量十五斤左右。在河西、河北两区，多为由日本进口之荷兰品种，平均日产量可达二十余斤。日军侵占天津期间，为补充其军队奶制品的需要，从日本运来约五百头荷兰品种乳牛，多为日侨金牛斋等4户所有，其中一小部分按联币二千元左右的价格配售予有实力购买之中国人，虽数量不太多，但对于天津乳牛之改良，提供了有利条件。

天津的牛奶业基本为洋人所垄断，虽然中国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牛奶事业，但终因资金微薄，加之耕牛产奶量很低，难与洋人竞争，故只得削价出售。另一方面为了追逐较高利润，发展个人资本，弄虚作假，往牛奶里掺糠加水。为争取主顾，

不惜送礼行贿（给主顾佣人回扣）。在批发户中，则提出奶油，将脱脂乳充作好奶出售，在牛奶或牛奶制品供应不足时，在脱脂奶中加凉水后出售。酸奶油加洋玉米面，以人造黄油（20%黄油、60%牛油、20%土豆，其成本较纯黄油低70%）假充黄油出售。在零售户中则按供求之间的差距，往牛奶里掺对凉水，或以脱脂奶装瓶卖给顾客。当时流传着一句话“牛奶不掺水，真是活见鬼”，足见欺骗行为之普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更加紧了对天津工商业的控制，日本中纺系统负责人中条浩造乘机组织天津市牛奶“组合”（专卖机构），首先控制了乳牛的饲料供应，再以威胁利诱手段，拉拢牛奶业中的大户，为其筹措“组合”资金，多数业者认为“组合”既是专卖机构，将来必有利可图，每户认股竟达2000~3000元之多（伪联币）。青苑牧场经理章御珊见有机可乘，便纠合一二关系较近的同业，以投资人的身份，拉拢饲料供应负责人，在月末将小户或困难户无力按时交款起货的麸皮等，私运到黑市倒卖，得利后即按股分肥，其倒卖数量每月约有三三百包左右。遇有库存之玉米、黄豆等食粮应配售予牧场业者，饲料供应负责人则秘而不宣，私运到粮食黑市倒卖自肥，危害同业利益。

1942年同业公会成立，石氏牧场石赞卿充任主任委员，另有十余人被推选为委员。公会在敌伪政权统制下，成为敌伪进一步统制牛奶业的工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敌伪行政机构，石赞卿仍任主任职。因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牛奶业更加不景气，至解放时已陷入奄奄一息境地。

上述为解放前天津牛奶业的基本情况，此外还有一点要说的是，牛奶业多为小本经营，除经营者自身投入外，其一家老小

亦一同帮忙。雇佣工人者，仅占全行业的15%，东家多，工人少是该行业一个显著特点。

---

（上接第142页）哈——8；钩——9。如成交一头骡子，先讲好“咪”字钱的大数，在过手时，一方出“拐”，一方出“可”，相持不下，最后出“可”的以两指晃了晃，对方也重复了一遍该动作，便算以3220元讲成。这种办法不但委托买卖的人闹不清楚，就是站在一旁观看，也弄不清是多少，这给吃行市带来很多方便。交易讲成有关税款与牙佣也要讲明是由买方承担还是由卖方承担，抑或由双方分担。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四世营此业的穆怀恕同志的鼎力协助，承他提供不少珍贵资料，使此文得以完成，在此特致谢忱！

## 天津的牲畜集市交易一瞥

王 受 朋

在旧社会，天津有一个行业，买卖双方议订价钱不是明讲，而是通过袖里过手来讨价还价达成交易，这便是牲畜集市在做骡马牛驴的生意。

在今天的南开二纬路和五马路附近，有一块地方叫马集（也叫南开马集），那便是过去贩卖大牲畜——骡马牛驴的集市。每逢到农历各旬的三、六、九日是大牲畜的集期，届时有上百个摊子来此卖大牲畜，每个摊子上总有十多头，多的达二三十头。集市上牵牲畜的、撮合拉纤的，摩肩接踵，相当热闹。

每集牲畜的成交量很可观，一般情况下，一集的成交量要在千头左右，忙的季节，则要超过千头。后来这个集迁移到六里台（内行人称其为西集），交易情况未受影响。除此之外，河北小王庄还有一个牲畜集市，每天都有，可成交量远不如西集。

在西营门里外一带，设有马店，专供贩子住宿及所贩牲畜的住圈喂养等。

在牲畜成交中，都要有“牙佣”和“税款”。一集下来，“牙佣”是成三破二（合价钱的5%）“税款”是5%，不过

实际上收不到这么多牙佣和同等数量的税款，因为在集市上常有贩子与贩子间的横向交易，双方共同与经纪人说一下“手里的事”，则牙佣与税款全可免除不收。

**经纪人** 牲畜集市的组织，以牲畜集市的经纪人（即其他行业所谓的牙人）为主，他们在集市里主持成交，收取牙佣，同时他们又是牙税的承包者，在天津牲畜经纪人有两家，都领有官府的朱批龙票，一个是张家，出头的是张子香；一个是丁家，出头的是丁四。每到集日，他们在集上摆个桌子，就地办公。遇到西集和小王庄集同日有集的时候，就派家人代去一处，也必是两家共同参与。经纪人是两家的名义，由两家共同担任，包税则是由张、丁两家以一家名义向市财局承包，实际上是两家合包。

**牲口贩子** 参加买卖的人主要是牲口贩子，实际上他们却很像参加交易所的各经纪号证券行。牲口贩子一上集，总有十多头牲畜，但是大多是受人委托出卖或调换的。有些人虽说上集的牲畜不多，可他也会受人委托买什么牙口、什么毛色的牲畜。因为这一行业在市场上交易讲订价钱都有一套暗语，外人毫不了解，所以你到了集市上，不通过这些牲口贩子，就不好成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你离不开这些牲畜贩子，那就是选择牲口。牲口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事，膘头、毛色等外观一望便知，牙口有时就有假，至于牲口有些隐病，在训练中有些不良的毛病，都需要有久在此中的人来参谋。牲口贩子往往不是仅赶一个集，在这个集上他知道有人需要什么毛色牙口的牲畜，在别的集上遇见合适的，他就会买下来，带到这个集上再卖给你。假如你对所使役的牲口不满意想调换时，那就更需委托牲口贩子办理为宜，他定能使你调换到满意的牲畜，不过这价钱

要听他安排了。

**驴橛子** 在牲畜市场上，除了经纪人、牲口贩子以外，还有一种人给设摊的牲口贩子牵牲口，人们称之为“驴橛子”。牲口拴在橛子上，跑是跑不了，可是低头、卧倒是在所难免。这会影响牲口的外观，让买主看着会以为牲口有病。有个人在旁看守，时时抻紧缰绳，使牲口总是昂首而立，买主看了自会有好感，这便是“驴橛子”所贡献的劳动。他们不吃工资，不拿月钱，那么他们能得到什么呢？在集市上成交后，买主并不马上把牲口赶回家，而是留下地址，回去等着送货上门，这时“驴橛子”的来钱路便有了，成交的牲畜是谁牵的，谁就把买主的地址留下，然后给牲口换上一套新缰绳笼套，把牲口送到买主家里。这套缰笼套也就三五元钱，凭它便可向买主要一二十元，再加上送牲畜的酒钱、喜钱（买牲畜如同购置房产一样也算喜事），就可得二三十元钱，当然送一头小驴，是不会教买主花费这么多钱的。

以上三种人加上买主和卖主，便是牲畜集市的组成者。另外有些卖吃食的小贩，点缀其间，增添了集市的火炽气氛。

买一头牲口要花费不少钱，买主挑起来是很严的。而卖主为了使自己有毛病的牲畜易于找到买主，往往要弄虚作假。而牲口贩子为了从中有所得，有时就会偏袒卖主，欺骗买主，所以买主在挑选中便会十二分地注意。

**牲口的挑选** 可分膘头、毛色和牙口。膘头是表面的，而且在于喂，原来膘头不好，买到手后，喂养得宜，牲口也会肥壮起来。有时看起来膘肥体壮，实际上是蹲起来的，买到手里不能使役。至于有些瘦弱的牲畜，滚蹄拉胯就更不能要了。说到毛色，也是个表面的东西，挑选毛色常是考究的买主，为了

配套而专要某种颜色。一般说来，毛色分黑、红、黄、青、白几种。黑的有乌锥、烟薰；红的有赤兔、枣红；黄的有黄膘、甘草黄；青色的有铁青、菊花青。白色的是骡马中少见的毛色。白色常是由青色褪变的，牲畜年老毛便褪浅，所以青马到老便褪成白色。有人把褪成白色的老青马加工做了牙口按白马卖，这就使买主受了骗。另外还有一种叫“兔虎”的，是鬃背尾一条黑色。

“牙口”是可以显示牲畜年龄的标志，牲畜是吃草的，看牙齿被草磨损的程度，来确定牲畜的年龄，就是看“牙口”。出生后两年多的牲畜，不算乳齿，新生的牙只有两只，这只幼畜就叫“两个牙”。以后再生出两只牙时就叫“四个牙”。最后的边牙生出后，就叫“边牙口”。口内牙齿生齐后，就要依据牙齿上的渠纹来定了，有“六岁口”、“七岁口”、“八岁口”。到牙齿上的渠纹都磨平了，就叫“老八口”，牲口到这时就该淘汰了。牙口的情况就是这样，买牲口多是以牙口来断定牲口的弱、壮、衰。可是这里有时也有假，为了把衰老的牲口充作青壮的欺骗买主，有人便做“挖渠做口”的事，就是把老牲口那磨平的牙面上，用刀锉再挖出渠道纹路来，内行的行话叫这类牲畜为“元生子”，外行很容易被蒙住，但这却瞒不了内行人，鉴别的方法很简单，打桶冷水来饮牲口，只要牲口一接触冷水，有畏痛的样子，便知其中有诈。

**成交** 在讲定价钱时，他们用的是暗语和手势。讲价钱时先用暗语讲好整数，再在袖里过手讲尾零数。他们的暗语是用9个字来代替1到9，袖里过手也是用手比划这9个字，两手一晃为重复数，这9个字是：门——1；可——2；咪——3；吊——4；拐——5；晃——6；摄——7；（下转138页）



# 天津基督教联合会概述

霍 培 修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入中国，当时基督教各会各有各纵向差会组织的领导，各干各的，彼此竞争。但至1900年前后，帝国主义感到中国人民反帝反洋教压力越来越大，便逐步让中国教牧人员出面，建立基督教联合会的组织，他们在幕后操纵，加强控制。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侵华日军解散了英、美操纵的基督教联合会。但为了利用基督教，又于1942年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团，在天津市设立分会和津海道区会。1945年日军投降后，教团组织自然垮台，联合会又恢复活动。本文仅就基督教联合会的初期活动作一简略的概述。

## (一)联合会的筹办与创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门户大开，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在“保护传教”的特权下，纷纷侵入天津。首先来天津的是美国公理会的伯亨利夫妇，他们于1860年乘坐美国军舰粮船，靠着美国钦差的秘书畏三卫（S. W. Williams也是公理会传教士，后来做到美国驻华公使）的力量来到天津。其后1861年英国圣道堂的殷森德夫妇，1862年伦敦会的理一视（Jonatnan Lee）夫妇，1873年美国美以美会的白雅各（James Pyke）夫妇，

1890年英国圣公会的白瑞屯 (William Hereton) 夫妇, 1895年美国青年会的来会理 (Williard Lyon) 夫妇等接踵而至。这些传教士各自由其上级差会派出, 来到天津后, 开始先在沿河一带落脚, 如公理会、圣道堂在娘娘宫, 伦敦会在马家口, 美以美会在紫竹林, 圣公会在中街, 各据一方进行活动。

当时, 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压迫, 反帝仇教心情极为高涨, 各公会传教士感到处境不利, 认为分散不如集中。于是自1867年以公理会带头, 各公会相继集中到紫竹林一带。当时紫竹林是繁华地区, 经常有庙会, 游人川流不息, 最适合于传教活动。当时这一带又是帝国主义停泊军舰、驻扎海军的地方, 各国的领事馆、银行、洋行也集中在这里, 因此把教会也迁到这里, 就可使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商业和传教结合成为一体, 利于帝国主义对天津的侵略活动。

约在1864年左右, 英、美传教士首先设立了合众教会 (Union Church 抗日期间改名合一教会), 作为外国传教士和各国领事馆人员、洋商以及外侨公共礼拜的地方。1867年各公会集中到紫竹林后, 各国传教士积极策划, 酝酿成立各教会间横向的联合组织。公理会美国女传教士步云诚经常向中国教牧人员鼓吹成立合众教会的好处和联合的重要性, 希望中国传道人 also 建立联合组织。各公会的传教士轮流邀请中国传道人和他们一起举行联欢会, 向他们介绍外国教会情况和国际消息, 宣传西方文明。这些活动对中国传道人影响极大, 引起了建立联合会组织的兴趣。

各公会初创时, 自身工作还很简单, 相互间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随着各公会的扩张, 中国人民反帝仇教的心情日益高涨, 各国传教士便决定退居幕后, 推出中国传道人组织联合

会，以便通过这个组织对天津教会加以控制。1895年，不属于公会系统的青年会在紫竹林的海大道有了会所，成为各公会进行联合活动的场所，以后各公会也利用过经司胡同会所进行活动。直到1917年华北遭大水，外国传教士把各公会和青年会的中国负责人召集到青年会东马路会址开会，借研究水灾救济工作，把中国传道人组织在一起，才使联合会略具雏形。开始时是以救济工作为中心，所以由外国传教士主持会议，中国传道人则担任调查、放赈等具体工作，以后工作范围扩大教会事务，如交换讲坛，外堂布道和监狱布道等。1920年，华北大旱，各公会又忙于救济工作，不但在天津市内，并且工作发展到天津县、静海县、武清县及唐山等地，除了救灾，还进行布道活动。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活动内容的增加，天津基督教联合会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正式成立。联合会的主持人由中国传道人中一些居高位或孚重望的人担任，如公理会的张衍省、刘家麟、王瑞亭，圣道堂的李安素，伦敦会的李复生、凌锦泉，美以美会的陈维屏、刘马可、曾洞忱等都曾担任过天津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主席每年改选一次有时美英传道士也分别参加联合会的例会。

联合会成立伊始，几个较大的公会，如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和圣道堂就都参加了，此外男女青年会、安立甘教会（圣公会）、圣经会和仓门口自立会连同仁田西里、沈王庄等处支会也都参加了联合会。救世军则标榜其组织与教会不同，神召会也标榜“属灵”和“信仰不同”在初期都未参加联合会；其他如真耶稣教会等标奇立异的教派当然更不会参加了。

联合会成立后，各公会经常以青年会为碰头的场所，举行例会研究教会工作。联合会举办的各教会联合性的活动，如露

天布道、新春布道、监狱布道等日益频繁，特别是各教会在一起进行的救灾放赈工作也越来越多。英美传教士通过联合会在天津各教会进行过不少国际性的宗教活动，如环球周祷、国际青年祷告会、世界妇女联祷日、世界教会圣餐主日等。并曾请传教士穆德(John R. 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等来津布道，还曾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捐款，为日本因海啸遭灾的灾民募捐衣服和现金。

## (二) 抗战胜利的恢复时期

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在日本侵华时期无形解体，1942年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团天津分会及津海道区会，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军侵华工具。1945年日本投降后，教团随之一同覆灭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又重新恢复工作。

### 1. 联合会的恢复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5日天津基督教团举行最后一次的职员会，教团正式宣告解体，在这之前8月21日，曾以教团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各教会和教会团体负责人座谈会，讨论的问题是“对世界和平应该抱什么态度？”座谈在形式上是“感谢上帝”，使我们获得和平胜利，实际上是突出感谢美国，特别是把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罪行硬说成是日本投降，取得和平的主要因素。

教团解体后，10月24日又召集了各教会和教会团体负责人聚会，讨论各教会和教会团体本身的前途问题，研究如何从日本所控制利用的教团恢复到美英所控制的联合会。通过这次聚会讨论，作出三条决定，作为恢复基督教联合会的初步内容：①

各教会自立(包括摆脱英美教会控制); ②各教会名称问题, 即在教会名称之前冠以所在地名称; ③以天津教会名义发庆祝胜利和平通电。

同年11月26日, 原教团负责人霍培修与刘修斋、郑锡三、张宝轩4人商谈着手恢复旧联合会(因在教团之前, 就有天津基督教联合会之组织)。11月30日召开各教会及教会团体负责人会, 酝酿恢复旧联合会的问题。12月1日召开联合会筹备会。最后于12月10日举行大会, 通过决议, 正式恢复天津基督教联合会, 当场选王锡之、霍培修、张宝轩、刘子衡、杨肖彭、郑锡三、孙幼云、何质夫、李瑞禾、王警斋、孙咏亭、刘修斋、孙必昌、戴大同等15人为执行委员, 组织执行委员会。又从执委中选出常务委员, 他们是王锡之(主席)、霍培修(副主席)张宝轩(记录)、刘子衡(会计)、杨肖彭(经济股长)、郑锡三(布道股长)、孙幼云(服务股长), 并邀请青年会的职员王锡昌担任义务干事。12月13日常委会召开首次会议, 商讨联合会今后的任务。这样, 从基督教团解体到联合会正式恢复, 前后只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1946年1月, 联合会改选, 霍培修为主席, 郑锡三为副主席, 张宝轩为秘书, 刘子衡为会计。

## 2. 联合会的主要活动

**自治活动** 为了体现“自治”, 首先健全组织。针对各种不同对象, 设立不同的股, 如对市内各教会设有布道股, 对市内工商界设有职工股, 对教会内外的儿童设有儿童股, 对市内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设有学生股, 对市内各界人士设有社会股, 此外不属于各股的工作, 又设有总务股。各股每年分别向联合会汇报它的活动情况、次数和人数等, 以资统计。此

外，联合会还设有评议部和执行部以及联席会议（联合会），均设有英文记录和汉文记录，而且以英文记录为主。特别是教会所办的救济工作，更是强调以英文记录为主，以资汇报给国际救济组织机构。同时，还要各教会每年汇报经济收支数字和情况，新旧记名、受洗的教友数字和情况，以及各教会房产的数字和情况等等。

恢复后的联合会由于教会团体增多，活动增加，因此联合会的例会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周一次，必要时还召开临时特别会，特殊情况下外国教会负责人亲自参加，如狄克逊和鲍同仁都参加过例会活动。每次例会都对具体活动责成专人负责执行，并在下次例会时进行汇报。

为了加强联合会对各教会单位的联络，在各教会之间成立了联络网，设了四个教会为中心点，由这四个教会联络附近教会，便于迅速传达消息。

**自养活动** 联合会从1946年起突出地强调教会“自养”，各教会要“生产自救”。当时联合会搞了一些“自养”活动，主要有：

①联合会多次向市政府为各教会请求“福利”，如冬季煤费、电灯减费、教会房地产免纳捐税，以及购买面粉等等，每次均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各教会都如数享受。

②1946年1月4日，联合会向国际救济委员会请得大批救济金，据不完全统计，联合会曾先后请得传道人救济费600万元（旧法币，下同），灾民救济费200万元，平民救济费100万元，医药救济费72万元。此外，又以接受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的方式，分发给各教会救济金300万元，补助传道人救济金500万元等。

同时，联合会还以接受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的方式，由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办理平民教育班，并由大王庄救世军办理粥厂和暖厂，又协同东亚、仁立办理粥厂等等。

③联合会多次介绍购买美国的剩余物资。为了办理这件事，联合会特地成立了一个剩余物资的“经理处”转拨美国的剩余物资，其规模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实惠，有十几个教会和教会团体，原来不肯参加联合会，这时也申请参加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单位。

④联合会除了以办理救济和福利的间接方式谋求教会自养外，还为教会自养采取了直接的具体措施：1946年推举出郭砚田（召集人）、何质夫、魏文举及男女青年会干事各一人，成立了“联合生产小组”，参加了《新生晚报》合作社，为联合会所属各单位准备“自养”的活动。此外，还向各教会大力宣传、推行各种“生产自救”的措施。当时各教会纷纷响应，搞起了不少生产活动。如公理会成立木工班和缝纫班，西门里卫理公会成立了织袜子组，维斯理堂搞起了天中糖厂，卫理公会天津教区在塘沽搞起了农场和豆腐房，青年会搞电影院，还有些教会制钉子、做口罩、电锯、养奶羊等等。

**“自传”活动** 联合会的“自传”是它主要的工作活动，通过灵修、退修、培灵，祈祷等方式，以口头和文字等宣传方法，进行了大量的频繁的活动。这一阶段的“自传”活动巧立了各种的名目，采取了各种的方式方法。仅就当时的主要内容，分别记述如下：

#### （1）大搞各式各样的灵修活动

当时联合会在“灵修是自传的内在动力”的标榜下，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灵修活动。

### ①经常的灵修会

联合会每次例会在开始前总要有灵修会。灵修会除由联合会的成员分别轮流主领以外，也时常请外地人士主领，如李步青、张雪岩、武文蔚、杨绍唐、贾玉铭、陈瑞庭等，此外，也有时由狄克逊、鲍同仁等主领。

### ②举办退修会及宗教研究会

1946年6月10日至18日，在成都循道公会，6月20日至28日，在东马路循道公会，连续为联合会各单位负责人举行退修会，均由杨绍唐作灵修讲道。1947年7月14日至16日，假南开大学为会场，又为联合会各单位负责人举行退修会，由李步青作灵修讲道。他们的讲道内容都是不约而同地号召各负责人要“作好灵修，准备广传和平的福音”。

1946年10月4日由狄克逊介绍，请北京田家半月刊总编辑张雪岩来天津，于10月5日至28日，连续举行宗教研究会，参加者除各教会和教会团体负责人，还有少数上层信徒参加。张雪岩讲的总题是“前进的基督教”，大意是说基督教一向是前进的宗教，今后更需要前进。中国经过8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列为世界强国之一，所以我们教会各种事业也要相应赶上去。不但宗教工作应当前进，其他事业如教会学校、医院以及文字事业等，也都需要应时前进。

### ③帮助一些教会推动培灵布道会

1947年4月14日联合会例会决定，通知全市信徒参加4月14日至20日在维斯理堂举行的培灵周，又通知参加4月21日至5月2日在仓门口教会举行的夏季复兴布道大会，这些布道大会都是由王明道主讲的。同年6月2日联合会例会，又帮助推动6月4日至10日在海大道教会举行的培灵大会，这次是请武



文蔚主领的。

## （2）大搞布道活动

在这一时期，联合会从组织上，活动的方式方法上，内容上想尽了各种办法，大搞布道活动。在组织上，在联合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布道委员会，推举霍培修和张宝轩、何质夫、赵坤、王润澍、马德芳、魏文举、高梦鹤等人为委员，本着联合会的决议，推行布道活动。这个委员会成立后，联合会的布道活动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已往的布道活动都是由各教会自行办理，联合会只是提倡和协助；而在布道委员会成立后，联合会对布道活动是大抓特抓，所举办的布道活动比各教会过去活动的总和还多。布道活动的名目多，人数多，式样多，时间长，地区广，可以说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活动。

布道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联合会的号召，推动“天津归主”运动，提出“每人每年引一人归主”的口号，作为“中华归主”的组成部分。布道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如：

①帐棚布道 在市内空地上搭棚，内设座位，吸引听众进棚听道。

②卡车布道 把卡车开到人多的地方，停车讲道，并向行人分发布道传单。这样可以流动到很多地方，不受行人的拥挤和拦阻。

③话剧布道 把布道内容编成话剧，演出布道。

④电影院布道 在电影映出中间休息时进行布道。

⑤电台布道 联合会计划与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合作创立“福音广播电台”，专作布道之用。

⑥利用各教会外堂或临街的教会对外布道，有专人利用唱

诗吸引过路行人，并有专人招引行路人进堂。

⑦露天布道 把天津市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由各区内所在的各教会共同负责该区的露天布道。这种布道活动几乎每天一次，吸引参加活动的行人有时达一二百人，除讲道外，还当场发售福音书，并给人记名望道。各区进行布道活动后，都要向联合会报告活动情况。

联合会为了实现所谓“天津归主运动”，除了领导全市各教会大搞突击布道工作以外，还安排了经常布道工作，即除对各教会鼓吹加强布道活动外，还在全市各个方面大搞分类布道工作，统一组织，指派专人负责，如各教会的工厂布道工作由郭砚田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外堂布道工作由王锡之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商店布道工作由霍培修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露天布道工作由赵坤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学校布道工作由魏文举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医院布道工作由周鸿彬负专责推动等等。

此外，联合会更重点地加强了所谓“监狱布道”工作，除由霍培修总负责外，并责成王润澍负执行责任。联合会还协助“青年归主”搞监狱布道活动。

以上各种各样布道活动都是为了达到“天津归主”的目的。

### （3）大搞“文字布道活动”

联合会认为以上各种布道活动仅限于口头上的宣传，还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于是又大搞起文字布道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

#### ①创立天津《新生晚报》

联合会经过反复酝酿筹备，于1946年8月26日，听取了常小

川在会上报告创立天津《新生晚报》的经过，并决定接受《新生晚报》为联合会会员。该报创办的经费是利用教会的专款和募捐，目的是“尽力为各教会事业服务”，并“希望报社的职工将来都成为基督徒”。报社由常小川任执行社长，并邀请天津知名的基督徒、究真中学校长李筱峰充任名誉社长，以资号召。

联合会通过《新生晚报》进行宣传活动，内容包括几方面：  
A. 晚报上经常登载关于联合会、各教会和教会团体以及传道人、信徒的消息，并经常宣传监狱布道的情况。  
B. 晚报在每星期六都要把次日教会礼拜的时间、地点、主领人、讲题、经文等列表刊登出来。  
C. 晚报每月一次辟有“宗教讲坛专栏”，由联合会组成的编辑小组负责组织工作，并决定由乔维熊任主编。  
D. 晚报在每年12月25日，特辟“圣诞专栏”，专门作有关耶稣圣诞的宣传。  
E. 晚报对有关“普世教会”的消息，以及天津各教会与教会团体推动“普世教会”活动的情况，无不尽情披露，进行宣传。

为了扩大《新生晚报》的影响，在各教会及教会团体的门口，都设有“《新生晚报》阅读专栏”，每天张贴一份晚报。同时，报社还赠给每个传道人一份晚报。

## ②出版《天津教会》

天津联合会除利用《新生晚报》进行文字宣传活动外，还在1947年10月1日创立了《天津教会》月刊，到1948年1月，共出版4期。每期都是专号性质的：第一期是“齐家专号”，第二期是“和平专号”，第三期是“正俗专号”，第四期是“更新专号”。每期专号都有它应时的中心内容。

第一期创刊号内容是按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家庭委员

会规定的“基督化家庭运动日”，发表了天津联合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实质上是在“基督化家庭”的外衣下，鼓吹了美国式的家庭生活。

第二期是“和平专号”，于1947年11月出版。这是天津联合会秉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旨意，把11月定为“国际和平月”，为鼓吹“和平运动”而刊印的。这一期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刊物中借着基督是“和平之君”与基督徒应宣传“和平福音”等大作文章。在小言里提出：“一切一切均愿和和和平平……”这就是本刊要建立的宗旨。”

第三、四期是在1947年12月及1948年1月出版的，正值春节前后，命名为“正俗专号”与“更新专号”。内容是鼓吹“基督立场”，强调信仰特殊，并利用《圣经》继续宣传和平主义思想。

### ③推销《田家》半月刊

1946年10月，在张雪岩来津搞“宗教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也为《田家》半月刊进行宣传。张雪岩提出了“希望天津各教会踊跃订阅”、“多多投稿”，并“广为介绍到天津周围的乡村教会”，等等要求。狄克逊认为当时把《田家》半月刊向农村广为介绍，对于加强基督教的文字宣传，很起作用。

### ④其他文字布道活动

联合会还赞助和支持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出版不定期的“宣道小册”和张贴“圣经标语”等文字布道方法；联合会并代协助会向各教会散发这种“宣道小册”。此外，又在各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大门前张贴“圣经金句”，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

### (4) “举办”信徒训练班”

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联合会连续主办了两期全市性的“信徒训练班”。每次规定名额100名，学习期限均为两周。这项工作是在美国女传教士雷爱梅等人的指导下进行的。

#### (5) 大搞“基督化家庭运动”活动

当时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家庭委员会把1947年10月规定为“基督化家庭运动月”，天津联合会秉承这一规定，曾于1947年4月24日召开“基督化家庭筹委会”，安排了天津市各教会统一举行基督化家庭运动的具体办法，并规定自10月19日至26日举行基督化家庭运动。此外，在举行运动前，联合会又与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协商酝酿，双方联合组成了一个专责小组，以雍剑秋、王化清、王警斋、王锡之和霍培修为组员。筹备和推动这一运动。

这次基督化家庭运动的总题是“基督化家庭与民主的中国”。以下的八个分题是：①实践基督化家庭生活以促进中国的民主；②家庭合作养成民主化中国；③平等待遇儿童，培养民主精神；④预防疾病，建立快乐的环境，求中国民主实现；⑤纪念家庭特殊节日与启发民主思想；⑥实行家庭崇拜，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⑦改进家庭的精神生活，服务邻人，以实行民主生活；⑧改进社区合作生活，发扬民主精神。除去口头宣传外，还印出专刊（《天津教会》的“齐家专号”），并进行表演和展览，在绿牌电车道（现滨江道）中原公司玻璃窗内陈列“美满家庭”模型，以这种“美式家庭”进行宣传，影响广大市民。

#### (6) 利用宗教“为国祈祷和平”

1947年3月10日，联合会特决定“为国祈祷”，通知全市教会转告所有信徒，“每天中午12时分别在各处为国祈祷和平，

直到全国和平为止。”这个办法一直继续到11月。又特定在3月16日（礼拜日）全市各教会礼拜都以“为国祈祷”为讲题。6月15日（礼拜日）还响应上海基督教联合会所提倡的为国举行“禁食祈祷大会”，即上午全市各教会举行联合崇拜会，中午禁食，下午各教会分别举行“为国祈祷和平”会。

与此配合，联合会还利用华北公理会总干事张衡秋于3月28日来津冈纬路公理会演讲“教会奋进问题”的机会，发动了全市各教会的负责人参加，进一步贯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号召。

#### （7）举行“普世教会”活动

联合会一向是热衷于举行“普世教会”活动的。所谓“普世教会”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联合会就是响应了它的各种号召，在它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活动，如“寰球周祷”、“世界青年公祷周”、“世界学生公祷”、“世界妇女联祷”、“国际圣餐礼拜”等等。

1947年10月，联合会按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号召，号召全市各教会于第一个礼拜日照例举行“国际圣餐礼拜”，并且把这次礼拜的奉献款项汇总起来，寄给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普世教会事业”使用。

1948年1月4日至11日，联合会照例举行了每年一次的“寰球周祷”，按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规定，拟定了每天一个讲题，其中主要的讲题有：①世界布道与普世基督徒主内一家；②上帝对于圣教会的应许——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③福音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方法；④基督教福音是拯救万国万民的；⑤向国内外宣扬福音。

解放后，联合会还曾有过一时的活动。随着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逐步展开，全市信徒与教牧人员的思想觉悟有了不断提高，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越来越明显地违反了新中国教会前进的方向，也越来越不符合爱国的基督徒反帝爱国的要求了。因此，它的活动逐渐减少，最后也就以自行解散而告终了。

(写于1964年)

### 津门名刹大佛寺

二十世纪前，津门庙宇随处可见，在今河北区于厂大街西有一座古刹——大佛寺，始建年代不详，但从其建筑规模及该地区兴衰历史推断，它至少也有400年的历史。大佛寺雄浑壮观，山门上刻有“大佛寺”三个大字，寺内四缘连屋，三层殿宇，大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后殿五间，梁楹节税，金碧耀眼，中供大佛一尊，高达8米的木雕站佛，这便是这座庙宇起名“大佛寺”的由来。该寺有僧十余人，方丈法名仁源，俗姓胤。大佛寺处于人烟稠密之区，因此施主多，香火盛，为津门名寺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奥军占领了海河以东地区，并强占了大佛寺，摧毁了大佛后，在大寺内设置司令部。1902年大佛寺一带被划为奥租界，大寺又被改作工部局，众僧被遣散，方丈仁源被赶居跨院。1919年奥租界收回，在大佛寺原址建起了“大佛寺小学”，1928年改称市立第二十六小学，解放后政府接管后又改为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区重点小学），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大佛寺小学。1947年，曾有一些居士捐资，重建庙舍，并从外地迎来释迦牟尼神像，仍称“大佛寺”，但已不见当年的雄姿。1957年方丈圆寂后，该寺划归一个缝纫社使用。

冯桓墀

## 回忆天津的联青社

杨 肖 彭

解放以前，天津有三个影响较大的所谓国际性的服务社团 (Service Clubs)，即扶轮社 (Rotary Club)、狮子会 (Lion<sup>s</sup> Club) 和联青社 (Y's Men's Club)。扶轮社和狮子会的成员多是外国人，只有联青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些人大多属于社会上层人士。该社与美国的联青社有着密切的从属关系，与基督教青年会更是如同母子。

我于1934年8月1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36年加入了联青社，并一直参加该社的活动。1940年以后，我开始担任该社的通讯书记和董事。1947年我到美国留学期间，还同美国各地的联青社及“国际联青社”的主要人物有所来往。因此，对联青社的事情知之较详，现仅就记忆所及，将一些活动片断追记如下。

### (一) 联青社的起源与组织概况

约在1919年间，美国俄亥俄 (Ohio) 州特利多 (Toledo) 城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一个会员小团体，名为“布斯特尔社” (Booster's Club 意为促进)，专门协助青年会推动会务活动。由于该社与当地青年会的关系过于密切，遂改名为“特利



姆卡社”(Tolymca Club)。不久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社员倡议下，该社正式改名为联青社(The Y's Men's Club)意即青年人或青年会的社团。在以后的两三年中，美国和加拿大先后成立起十七个联青社。为了进一步向外扩展，1923年联青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青社(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Y's Men's Clubs)，亚历山大当选为社长，柯兰姆斯(Henry D. Grimes)担任书记兼司库。亚历山大是一名律师，柯兰姆斯是一个化学工程师，他们在联青社的职务都是义务性的。

中国的第一个联青社于1924年在上海成立，它也是美国的第一个海外联青社组织。1927年9月，天津青年会的总干事郝瑞满(Ramond S. Hall，美国人)，在东马路青年会召开会员工作委员会时，特别提出成立联青社的要求。当时到会的会员有杨宽麟、杨锦魁(美籍中国人)、黎宗尧、阮渭泾、顾海田、关颂声和干事郝瑞满、宋愚溪、董守义等人。会上讨论通过后，于9月27日邀集了天津上层人物一百多人，在英租界的规矩堂(Masonic Hall)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由杨锦魁担任主席，并请颜惠庆到会演讲，会上大家还一起聚餐。天津的联青社就算正式成立了。1928年6月1日美国国际联青社发给天津联青社一个许可状(Charter)，表示天津联青社已取得了国际间的合法地位。从这天起，天津联青社在每礼拜三的中午聚餐、开会，不论遇到什么节日，从不间断。在1927年到1952年的二十五年中，除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联青社不得不停止了四年的活动以外，其余二十一年中一直未间断过，这期间先后入社的有百余人。

一般的周会，到会的社员总是三十多人。此外社员们可以

邀请亲朋一起参加，作为“来宾”。例会由全体社员轮流担任主席，讲员的餐资，由当日的主席负担。主席的面前放着一个红色的木鱼，用以维持秩序，类似惊堂木的作用，这可以算是中国联青社的一个创作。开会前大家一起唱《嘿，嘿，这一群都在这儿》（Hail, Hail, The Gangs Are All Here），闭会时再一起唱《分别歌》（Parting Song），这些歌都是国际联青社统一印发的英文歌曲。

参加联青社的社员，要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否则很难参加活动。仅就例会来说，每星期三中午要在一起聚餐一回，这就需要一笔开支。1936年前后，天津联青社经常在法租界的大华饭店聚餐，餐费是一块大洋。青年会的干事出席联青社的活动，算是办公，餐费可以报销。餐费还算是较为固定的开销，周会上还有许多额外的开支则是无法估计的。例如，社员在入社时必须报清家庭成员及生日，这些材料由福利委员会主席保存。每当一个社员本人或家庭成员的生日接近开会的日期时，周会上就有一位被指定的司仪官向这位社员道喜。一道喜，这位社员就得拿出相当数目的钞票来捐款。除过生日道喜外，生孩子、搬家、买新房子或汽车、工作上得到提升、生意上赚了钱等等，都要道喜。反之，如果有社员在会上办错了事或说错一句话，甚至叫错一个名字，司仪官马上会来罚款，被罚的人只好掏钱认罚。这些“收入”在例会结束时，都交司库入账。记在“捐款与罚款”名目下，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人社费、改社名费、临时捐款、踹票等等，都要钱。这众多的开支，单靠固定薪金收入是难以支付的。

表面上看，联青社是极端自由散漫的，其实它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组织办法，它有六项宗旨：（一）增进本社社员与各

地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之友谊。（二）使社员对有关公民、经济及社会之切近问题，得有更优之启迪。（三）以热诚服务之方法赞助适当之慈善事业及社会活动。（四）提倡以活泼、公正之精神，办理公民事务，而不涉政治，不分党派。（五）建立健全之人格，以发展真实之爱国心，使与形式上的爱国心有别。

（六）以勤慎、活泼之服务精神，单独与团结施行基督教青年会所定之各项工作。此外，联青社还将“以义务为权利”定为联青社的社训。

## （二）天津联青社的组织机构概况

天津联青社在组织、领导和纪律、成规等方面，都比较严密。天津联青社有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董事部，它包括社长、副社长、司库、记录书记和通讯书记以及四名董事。此外还有一个由上海“区（中国）监督”指派的“华北监督”，管辖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四处的联青社。华北监督由一名深孚众望的天津社员担任。区监督则由美国的“国际联青社”从上海或香港的社员中指派一名合适的人选担任。区监督经常同美国的国际联青社保持联系。天津联青社社长每年年终要向华北监督报告一年来的社务工作；华北监督要向区监督报告他所管辖的四个城市联青社的活动情况；最后区监督再向美国国际联青社报告中国各地联青社的工作情况。当时中国的联青社除华北外，还有华南（包括香港、福州、广州、厦门）、华中（包括上海、南京、苏州、芜湖、汉口）、华西（包括重庆和昆明）。除由区监督向美国国际联青社汇报外，国际联青社还有印好的固定表格，直接从美国发往各地，每半年一次，由各地联青社的通讯书记填报。表格内容是详尽地调查各城市联青社的各项活动情况。我

从担任天津联青社的通讯书记之始，就负责此项工作，一直干到结束。

天津联青社董事部要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的前两天（即星期一）的晚上召开一次会议，会议由社长主持，九位董事轮流做东，在自己家里准备一桌饭菜，饭后开会。会议一般是商量会务活动、吸收社员、经济开支、会程安排及组织各种委员会等等。现就其中一些内容简述如下：

1. **合理安排** 每年年初的第一次董事会，要把全年五十二个礼拜三的周会日程安排下来。每月的第一次例会都是事务会议，这一天不请外人演讲，不约亲友参加，专门讨论社务，或是吸收新社员入社。但一月份的事务会议又固定为新社长（社长任期为一年）就职典礼，十二月份则为选举社长、书记及董事。此外还将年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指定为年终报告会，由社长与各执行委员向全体社员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

2. **组织各委员会** 联青社内部将社员分别组成九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由一名董事任主席。这些委员会是：学习委员会、民教委员会、会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联谊委员会、体育委员会、音乐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出版委员会。此外还有中外会务联谊委员、会员委员和财产保管委员三人，分担各项具体工作。

3. **吸收新社员** 天津联青社有一度红极一时，一般人想加入是不大容易的。大多是自找门径，托人介绍，有的甚至自付餐费或托人带去作客。如此这般，原因何在呢？联青社的社员都是天津各界的中坚人物，同这些人结交，可以路子广，吃得开，有的甚至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因此不少人想挤进联青社。加入联青社，首先要有两个社员作书面介绍，写明被介绍人的

职业和履历，交给会员委员作初步审查，然后提交董事部作初步研究。如果大家一致同意，在社员例会时把个人的姓名书面提出，征求全体社员意见，并要求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如有一个人不签字，即作罢论。全体社员同意后，再交回董事部，在下一次董事部会议上，以投黑、白豆的方法表决。赞成者投白豆，反之投黑豆。投豆后由社长当众打开。如有一粒黑豆，即作罢论。如全体通过，由会员委员通知介绍人并转告申请人，填好入社志愿书后，在当月的事务会议上正式参加入社仪式。入社仪式由社长主持，新社员在介绍人陪同下进入会场，全体起立，由社长提出如何遵守社规、出席例会、忠诚参加服务工作以及支持基督教青年会的各项工作等问题，新社员一一作了肯定回答之后，社长宣布“某人已被本社吸收为正式会员”，此后才开始其他活动。这时还得给新社员起个社名，经本人同意后就永远在社内使用。此后这个社员每次出席会议时，都要佩带印有自己的姓名、社名、职业分类的社徽。

天津联青社对职业分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社员中每一种职业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但实际上所要吸收的社员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都适合于联青社的要求，联青社便另外找些理由吸收该员入社。例如银行业原有花旗银行买办金峻轩和大通银行买办章以吴两人，后金城银行副理杨固之加入时，就以他兼任的太平保险公司经理职，划入保险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资耀华划为商业储蓄业，等等。总之名目越分越细，以避免违反联青社的规定。

在美国的“国际联青社”每年要召开一次国际性年会，邀请各国各地的区监督参加，并依其路程远近，给予旅费补助。天津联青社的发起人之一阮渭泾曾于1948年8月15日至20日，

代表中国华北区参加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滨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国际联青社年会。那次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出席代表，增进各地联青社之间的友谊，并重申要在世界范围内，凡是有基督教的城市都要推广联青社运动。

在宣传方面，国际联青社有一个月刊，名《联青世界》，按期发到世界各地。天津联青社也一直编辑出版一份英文季刊，名为《天津联青社季刊》，专门报道天津联青社的活动，除社员人手一册外，还分发到全国各城市联青社，并送美国的“国际联青社”。

### （三）天津联青社的一些活动

1933年我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平青年会做训练干事，当时常听到有关联青社的一些情况。一次，领导我受训的美国人甘霖格约我参加了北平联青社的周会，地点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那年的社长是北平花旗银行买办孟广礼。餐后由齐如山先生讲梅兰芳的戏曲艺术。由于我从小就喜爱京剧，所以听起来备感兴趣，因之对联青社开始羡慕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青社的活动。

1934年夏，我被聘来天津青年会工作，担任少年部主任干事。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的英文秘书。由于少年部的工作是联青社社员们所支持的，加之兼做陈锡三的英文秘书，因此陈时常带我到联青社去作客，有时候我还在会上作演讲。记得1934年我在联青社作过介绍在青岛燕儿岛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沿岸国际少年夏令营活动情况的演讲。这次夏令营都是中学高中生，除中国学生外，还有日本、菲律宾的青年。这次活动由北美协会主办，由甘霖格担任指导。以

后在1935年和1936年分别在烟台和威海举办两次天津青年会少年夏令营，均由我主持，所参加的营员多为联青社社员的子弟。正是这个原因，我每次为筹备夏令营而举办募捐的国际音乐会时，联青社社员都乐意解囊。

1934年和1935年冬天，天津联青社在西湖饭店举办过两次“联青夜”活动。我和其他几个能讲英语的青年会干事，都被约去参加招待工作。当时西湖饭店是天津最考究的第一流饭店，房价昂贵，一般人很难涉足。但由于该饭店的东家雍剑秋是青年会董事长，因此对联青社的活动是免费借用的。“联青夜”那天，西湖饭店门前一反以前之冷清，变得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几百位“名门”豪贵携眷带女去参加盛会。会上除聚餐、跳舞外，还有一位从檀香山来的女人，表演了一段夏威夷草裙舞。另外还有摇彩和各式各样的大赛卖。办法很特殊，所有到会的人在进门时必须到“联青银行”换买临时流通券，其他钞票禁止使用。因此所有带朋友去的人，一进门就尽量买足流通券，否则用钱时拿不出，显得小气。但有一条规定，所换临时流通券必须当夜用完，不得退换，否则作废。总之，这一夜的活动收入，足够维持天津联青社所办一切服务事业的全年开支。

1936年初夏，陈锡三在北美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留学进修，于是由我代表总干事加入联青社，正式成为天津联青社社员。我的主要任务是保持青年会与联青社的关系。因为联青社的成员，无论是从经济或是从会务活动方面，都是青年会的重要支柱，有人把他们比作是青年会的“奶油”。

1937年天津沦陷后，天津联青社的例会迁到旧法租界新华大楼银行俱乐部去举行，其他各种活动照例进行。服务工作除原来在沈王庄和鼓楼西两地开办的一所诊疗所及两所儿童义务

学校外，又在西头慈惠寺与西广开怡兴里开办了两所义校，一所是工读，一所是义小。由我直接领导，一直办了几年。所有经费开支，统由联青社捐助，青年会代办。

这期间“联青夜”还照旧举办，不过内容有了一些变更，把草裙舞一类的节目改为小蘑菇等人的相声了。一次梅兰芳先生来津演出，联青社社员赵道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梅先生请到联青社。大家闻讯喜形于色，都想看看梅先生着便装的样子，同时想听他演讲。那天银行俱乐部里大有人满之患，连青年会最老的董事陈芝琴也出席作客。席间由章以吴主持仪式，当他请梅先生演讲时，梅表示：只是来参加聚餐，没有准备讲话。结果使很多人大失所望，不了了之。

一次联青社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公开论坛”，这是按联青社的惯例，在一个月中碰到第五个星期三时，便要举行一次范围扩大些的例会。这次会议采用辩论会形式，辩论题目是“妇女应否在家庭？”由联青社社员王鹏讲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道理。另外把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请去，由他讲妇女不应留在家庭的道理，经过辩论，结果郑汝铨获胜。

1941年以后，日本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银行俱乐部，联青社的聚餐例会又改到旧英租界马场道的美国俱乐部。一次，我约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到联青社讲肺结核病的防治问题，当场激动了社员朱继圣，因为他的长女不久前因患肺结核，由于发现较晚不幸夭亡。于是朱大力支持郭的防痨建议，通过青年会组成了专门委员会，促使天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院，由郭德隆任院长，朱继圣一直担任该院董事会的董事长。郭院长出国期间，我曾代理了九个月该院院长职务。

联青社的活动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后，日军在天津进入租界，才停止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联青社很快恢复了活动。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兼任招待盟军委员会主任，我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该委员会当时的任务就是把美军招待好，为此经常举办大规模的跳舞晚会，联青社的许多上层妇女和大家闺秀常常作为舞伴去参加舞会，当时联青社主持其事的是杜用文，为此他很得杜建时的赏识。

1947年10月9日晚，天津联青社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在天津胜利联欢社举办了庆祝晚会，到会的除联青社社员及其眷属外，还有市长杜建时。一些年龄较老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益友会的会员也参加了晚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杜建时在会上作了演讲。益友会的老会员向联青社赠送了“以友辅仁”的锦旗，并请来宾在旗上签名留念。会后的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1947至1948年间，我先后访问了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中小城市，多次参加了那里联青社的聚会和活动。在波士顿时，“国际联青社”通讯书记柯兰姆斯热情地约我到他家和他的海滨别墅共度周末。他让我看了他办公室的各种档案，我也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天津联青社的活动情况。在回国途中路经格兰莱比斯（Grand Rapids）时，“国际联青社”国际联络工作负责人麦克利曾约我同去参加了几处联青社的聚会，他向社员们介绍我时说：“在联青社没有‘外国人’，只有‘海外社员’。”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参观时，我还曾通过青年会的同事们了解了有关美国联青会的活动情况。总的来讲，美国联青社给我的印象是，美国各地的联青社都没有中国联青社的社会地位高。这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现象。

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当时天津的国民党政府除了杜建时经常利用联青社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外，《大公报》记者、国民党分子严仁颖和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秘书梅炳才，也先后挤进了联青社，并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反共论调。一次严仁颖在联青社说：“只要共产党一来，黄金将涨为无价之宝，股票就一文不值没人要了。”在解放军围城时，严仁颖说：“共产党在津东攻打天津是采用人海战术，让老百姓打先锋，死人无数，惨不忍睹。”他在逃离天津之前，还向联青社社员们表示：我受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教育，不能与共产党合作。

天津解放后，联青社仍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社员中除少数人逃往国外，其他人依然吃吃喝喝，过着昔日自由散漫的生活，对各项政治措施及运动采取漠视态度。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后，社员中不少人成了五毒俱全的“大老虎”，联青社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天津联青社从此也自行解散了。

附录：天津联青社历任华北区区长的社员：

年份	社员姓名	社名
1933——1935	阮渭泾	Dollar
1936——1938	杨锦魁	Paul
1939——1940	章以吴	General
1941——1947	阮渭泾	Dollar
1948——1952	杜用文	Hull

（写于1964年）

## 对《原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 务活动》部分史实订正

徐 宗 尧

我最近看到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年1月编辑出版的《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一书中舒季衡所写的《原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活动》一文（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其中有些与我亲历的事实不相符合之处，仅就舒文与我的经历所知分列如下：

### （一）关于蒋介石加委汉奸门致中为

#### “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名义事

我所亲历的事实是：自日本投降后，军统华北特别站电台发生故障，有一天（不是次日）戴笠着由舒季衡台长收转我电报一份，其主要电文是戴笠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任命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着我速将这份电报送交门致中。舒转交戴笠电报时说：他着宋梅村陪同我前去北平，并说宋梅村认识伪清河军校教育长刘竹笙，必要时可请刘帮助。我和宋梅村到北平与刘竹笙联系，说明来意，刘竹

笙当即给门致中打电话介绍我和宋梅村前去会见的事，这时门说：他已接受了蒋介石任命他为河北省绥靖军总司令名义，婉言谢绝，没有会见的必要，并说明我们来晚了一步。我同宋梅村在当天下午就回到天津。我当将门致中未接受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司的原因情况，向戴笠据实作了汇报。

这时我获得情报说：“山东省会所在地济南治安危急可虑。”我将戴笠以蒋介石名义发表门致中为国民党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这份电报，把河北省改为山东省，门致中改为杨毓珣，仍用戴笠以蒋介石名义发表杨毓珣为国民党山东省先遣军总司令（这时杨是伪山东省省长兼任省保安司令），负责保卫济南各城市治安。我将这份电报交由济南组组长解宠天送交杨毓珣，同时将这一紧急措施报请戴笠备案予以追认。

可是舒文写道：舒季衡接电文后，“即派宋梅村送往北平，因当夜铁路被切断，即由铁路局派专车边修路边前进，直到深夜始达。翌日，即在宋梅村监督下，举行就职仪式。两天后宋梅村回津，门致中特派一上校科长和秘书陪同来见舒季衡，要求与军统直接联系，舒同意派一电讯人员去北平，驻门致中部电台，并规定密码、呼号、波长和通讯时间，交温崇刚带去。舒又通知军统局总台按规定试通。温在门部住了一个月后，门部改编为国民党第9路军始行撤回”等情况。我当时任军统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舒转来戴电后，我偕宋梅村等亲与门致中间接交谈的情况如上文所述。舒文所述与史实不符。至于舒文又说门致中派人与彼联络，并派电台驻门部等情况，我作为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对此一无所知。虽然门致中、宋梅村、刘竹笙等当事人均已故去，但史实必须明确。

## (二) 关于逮捕张树森的前后经过

日本投降后，天津主要街道上突然出现“天津总站长张树森”的治安布告。我认为以个人名义出布告来维持天津治安，其中必有问题，当经华北特别站直属通讯员李鸿举（他的掩护身份是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查清张树森其人，原系军统局派到天津建立“天津总站”，张到津只活动三天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张被捕后投降日本，帮助日本宪兵队工作，深得日本宪兵队的信任。这时日本宪兵队为保护日本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抬出张树森来，叫他出面沿用原“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的名义来维持治安。主要成员计有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蓝振德、天津流氓高显宗、天津日商洋行经理孙绍亭等人，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积极在当地招收青年扩大编制，有些站员身佩臂章在街上执行检查任务，所用枪械弹药都是日本宪兵队发给的，张树森还向伪天津市商会借经费，据说正在筹措尚未付给，闹得天津社会秩序异常紊乱。我当将这些情况报告军统局，戴笠复电是由舒季衡电台收转我，因华北站电台发生故障。主要内容着我“设法将张树森等一千人犯逮捕看管起来，待局本部派法律专员前去审讯，如兄站逮捕张树森有困难，可与门致中联系帮助”。我认为在天津有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李鸿举所部，自己有足够力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和李鸿举在9月初间，先派便衣宪兵把张树森的住宅包围起来，接着我们叫开张树森的大门，出示李鸿举的名片，张的随从人员拿着名片传达后，张树森立即来到客厅会见，李鸿举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张树森先生。”我当即掏出手枪对准张的胸部说：“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前来逮捕你，把手举起

来不准动。”李鸿举把张树森的手枪收缴过来。这时张的同伙孙绍亭等在楼上见事不妙，正想跳楼逃跑，也都被捕获。由李鸿举派人用汽车将张树森等犯送到北马路伪北平宪兵司令部派驻天津宪兵大队部寄押。后来李鸿举在天津皇宫饭店逮捕了蓝振德，在北京逮捕了高显宗和蓝振亚，共逮捕了三十多人（确数忘记），全部看管起来，听候处理。

逮捕张树森等后第二天，日本宪兵队渡边等二人到驻津伪宪兵大队请求会见大队长，我和李鸿举研究叫吕柱青和朱云峰去会见，渡边提出：“请问张树森身犯何罪把他逮捕起来。”吕答：“日本宪兵队无权过问，也无可奉告。”接着渡边提出“是否可以保释，如不允许，就去北平向华北政务委员会去交涉，要求释放。”吕答：“我们奉令逮捕张树森，但不能擅作主张随便释放，你们去北平上告，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当天下午，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派警务处长（姓名忘记）前来天津指责李鸿举为什么逮捕这么多人，是奉谁的命令？这位处长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要找幕后人。这时我不得不出面了，我说：“李鸿举是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奉我的命令行事的，现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们还听日本人的驱使，不觉得可耻吗？”这位处长的口气很快变软了，并且用黄南鹏的名义提出要求说：“将张树森的随从人员取得铺保释放，随传随到，是否可行。”为了缓和当前的局面，当时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转告黄南鹏，明天下午二时我同李鸿举到北平去，让黄南鹏在家等候面谈一切。次日我同黄南鹏会见时说明逮捕张树森等犯经过的情况，因时间关系，李鸿举来不及向你汇报，是我主张把事办完后再汇报不迟。黄南鹏说：“紧急措施这是应有的事，我没有什么意见，警务处长回来报

告，这样办理很满意。”

回津后，我将以上逮捕张树森、孙绍亭、蓝振德、高显宗、蓝振亚等犯人及经过详情和缴获的手枪汽车等数目，连同“天津总站”名册一本，上报军统局备查。之后，我接到戴笠复电：着我把张树森等犯包括找到铺保随传随到的案犯的档案、缴获的花名册、手枪、汽车等全部移交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接收后具报备案。根据电令我派李鸿举、吕柱青、朱云峰三人负责按移交清册点交，然后报告备案。

在这件事情上，舒文说：（1）军统复电说，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着舒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逮捕审讯具报。舒持电与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商议，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恐见责于军统局，心有不安，认为这是立功的良机，即主动说不必去北平找门致中。在舒季衡转交给我戴笠电报时，我考虑门致中曾婉言谢绝接受戴笠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门致中为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名义，如果找门再次谢绝，那就不好了。我在天津有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李鸿举的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戴笠所交给的任务。据此，我不禁要问：“如果戴笠直接给你的电报办理此案，你就直接去找门致中，何必来找我商议呢？”我逮捕张树森等经过，已是有据可查的史实，怎么说“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等等，这样就把事情颠倒了。

（2）戴笠因华北站台发生故障，着由舒季衡电台收转我电报一份，主要是着我将张树森一千人犯逮捕看管起来，待局本部派法律专员前来审讯，因此我没有审讯。舒文说“连夜由徐宗尧审讯”等情况，这也不是事实。还有日本宪兵队抬出张树森沿用“原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名义，在天

津街道上张贴布告，主要是维护日伪人员的利益，张树森在天津招收青年时，这部分人都知道在日本宪兵队指挥下工作，张树森的抗团已经变了质了，舒文却说：“其中学生及刚到津的抗团分子都是受骗者。”这样说的目的所在，令人费解，抗团人员尚在，可以澄清事实。

### （三）舒文所述我任华北站站长

#### 期间与事实不符之处

在叙述之前，先将我这一段经历具体事实说明如下：

1942年8月，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平津特别组少将组长，组部设在彰德西冠带巷25号，当时我的化名叫徐开明，掩护身份是伪剿共第一路军司令部参议。由于是年8月到1944年5月，“平津特别组”改为“华北特别站”，我任少将站长，先后建立了九个组：（1）彰德组，组长李英；（2）北平组，组长曲福乐；（3）天津组，组长刘一轩；（4）苏北组，组长任晋文；（5）开封组，组长郭咸蕴；（6）新乡组，组长康振东；（7）东北组，组长林家岳；（8）济南组，组长解宠天（1945年5月成立）；（9）唐山组，组长刘凤鸣（日降后成立）。

1945年5月间，华北特别站由彰德迁移天津市河东李公楼前街裕记胡同24号（现改为河东区李公楼前街吴江胡同24号），这时我的化名叫徐涛（以汪伪军第三师司令部参议为掩护身份）。华北站部设有站长徐宗尧，秘书王祯祥，会计杨国文，译电员李淑英，交通员朱云峰、何忠勤，收发报务员兼技师熊文炎和收发报务员吴勉之夫妇，直属通讯员刘清溪、张世五、



关一非、李鸿举等人。

我与舒季衡发生横的关系，是1944年冬戴笠给我打电报说：“天津独立台长舒季衡领取经费非常困难，着由兄台就近予以接济。”舒派其妻徐爱莲去彰德领取经费，当时规定了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乘平汉铁路几次客车何时到达彰德车站。我派秘书王祯祥穿伪军服戴上校阶级前去迎接，但未接到舒妻，我怕舒妻出事，当即去电报询问，戴笠复电说：“舒妻因身体不适没有动身，以后另规定日期联络吧。”1945年5月间，华北特别站部迁驻天津时，戴笠又来电报：着我按指定日期和地址给舒季衡送去经费，送到后上报备案。我与舒季衡就这样发生了横的关系。

日本投降后，我同站部台长熊文炎携带两瓦特半收发交直两用报机（收报用交流，发报用直流）到北平组台找左荫棠，他查电台发生故障，原因是波长被移动，当由左荫棠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络试通后，我和熊文炎回津当晚与军统局联络总台取得联系，联络总台告诉熊文炎稍候给你介绍负责专台联系，以后与专台多次联系未见出来，因此我找舒季衡说明站台发生故障的情况，请舒台转告军统局负责专台与华北站台，按规定日期和时间认真互相联系。这样，电台联络成功。

舒文中（188页第10行）写道：“由于该站电台都是小型特工发报机，功率只有两瓦半，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情报无法发往重庆，工作展不开，徐听到日本已接受投降消息时，更加焦急，遂想起曾给舒季衡送过经费，按原接头地点，找到舒说明处境，舒即向军统局代拍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我认为舒季衡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华北特别站由重庆军统局共计领到两瓦半收发交直两用报机五部，都是军统

局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新型电台，它的特点是体积小，使用起来与五瓦特功能效果相同，而且携带很方便，并不如舒文所说：“该站两瓦半电台，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军统局内电讯专家，也不能把不能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的发报机给在日伪敌后工作单位使用。

#### （四）关于接收日伪物资问题

舒文中（188页第17行）写道：“徐站曾抢收日伪大批物资饱入私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各接收单位劫收日伪财产饱入私囊贪污腐化这是事实，但是并非都是如此。我愿以如下事实说明问题：戴笠在日本投降后来过天津三次，如我抢收日伪物资饱入私囊，肯定地说舒早就检举我了，即使舒不检举，在我起义后，多年的改造学习生活中，自己不坦白，也早被其他知情者揭发检举了。

我想以北平解放后，我在清河训练大队学习时，交待我处理戚文平献交日寇银块和鸦片等经过情况，来证实我当时的行为。

日本投降后，律师张达对我说：“日本驻津部队将掠夺的银元熔化成银块若干吨（忘记吨数）、鸦片六万两，没有来得及运走，就秘密移交给伪军‘戚部队’，现在戚部队改编为‘津静边区先遣军’，司令是戚文平，有一部分部队驻在天津市的李公祠，另一部分队伍驻在郊区。”听到这个情报反映，我觉得非常重要，当即托请张达律师向戚文平解说：“这是敌人掠夺的中国财产，属于国家财富，应当归公，不能藏匿不交。”经劝说后，戚文平同意将银块和鸦片造具清册献交出来。东西仍留原地，由戚文平保管，听候处理。

此事经向军统局请示，戴笠复电让把这批银块和鸦片移交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我将这份电报交给孙连仲的代表池峰城看后，他表示要转报孙连仲派员于明天同戚文平前往天津接管。最后结局，据池峰城说：由孙连仲的侄子孙绍庭到天津把六万两鸦片移交给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数十吨银块由孙连仲在蒋介石首次到北平时，当面递了个签呈，请求移交给河北省银行接管，作为该行资金，蒋介石批准了。

### （五）关于张筱勋

舒文（188页）说：“在徐宗尧调保定之后，张代理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实际情况是：

1945年10月间，我奉戴笠电令，着我到保定接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所遗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缺，着由张筱勋接任（不是代理！），交接后向局本部备案。天津站成立后，华北特别站被撤销。张筱勋于1945年12月间，调任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1946年4月，调任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

1947年张筱勋的前妻把他藏匿接收的数十部日本电台想暗中出售，被中统局天津区侦悉，将张妻捕获，中统局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毛人凤亲带执法人员到北平，将张筱勋逮捕，押在军统局北平看守所内，经审讯核实后，在看守所内将张筱勋枪决了。

### （六）关于接收谷良民大楼问题

日本投降后，因站务繁忙，河东地区交通感到不便，我着直属通讯员李鸿举找到原伦敦路楼房一所（门牌号忘记，是在日

伪天津市市长官邸大楼斜对面），进该楼大门迎面就是三层灰砖瓦楼房，楼后有一空院，楼旁有平房数间，是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指派看楼房家属在此居住（忘记姓名）。日本投降后，有一伪军司令部刚刚搬走。我觉得这所楼房很合适，但是楼房旁平房有看房家属在此居住，感到不便。想到临时救急暂住，我决定（约在九月中旬）将军统华北特别站搬进去住的。

舒季衡在该书（188页第14行）写道：“徐即将其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部迁至成都道芷江路的一所白色大楼内（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该楼原是国民党军人谷良民所有，被日本占据，徐予以接收过来。”舒文所谈与事实有出入。当时为我站办公地点，我和吕柱青曾由当地派出所所长（姓名忘记）陪同看过一座大楼（大楼颜色忘记），这座楼房非常宽敞，里面家具全无，无法使用，因之没有去住，更谈不上接收。舒文所指恐系即此。

此外，我要指出似是而非的两点，其一是（188页第14行）“舒即向军统局代拍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如果说是军统局电报允许徐在天津公开活动，那还说得通，但从舒的文字语气上又似不是这样，舒是天津独立电台台长，不是徐宗尧的上级，有什么权力“允徐”不允徐呢？其二是舒季衡在该文（第182页第5行）写道：“1944年冬军统局司令舒季衡在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不知军统局何时来了个“司令”。

（编者按：据查“司令”系“电令”之误，是我会校对不慎，特表歉意）。

对舒文史料所载各节，以上意见请天津市政协文史办予以订正。

## 关于天津出大殡的陋习

迟 叟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杨绍周先生《解放前天津吃红白饭儿的》一文《奢靡婚丧几例》举出殡二例，民国九年（1920年）李纯出殡与隆聚顺卞家出殡。于后一例说，

大概是隆聚顺经理卞荣卿的母亲，这位老太太有存款二十万元，儿子为母亲的生荣死哀，又另提出现款五万元，扬言连同老人的存款尽数办理丧事。……总其所花殡葬费用仅用了老太太存款二十万尚有富余，……（页242—243）

这一例开头称“大概”，颇疑出于展转传闻，故与事实颇有出入。

我家过去在天津富户中亦曾以出大殡著称，当时识者即讥之为“劳民伤财”。

我生也晚，在民国元年。往日闻家中长辈言，得知在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1895年），我家颂清卒于甲午八月十九日（1894年9月18日），以在中日战争期间，丧事从简。（其实比一般中产之家仍费得多）及荣卿奔生母之丧（甲午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13日），去前丧仅四个月，踵事增华，办得视前为奢。虽也引起一些议论，但在当时清朝制度尚有君臣品级的限制，风气不似后来的奢靡无度，物价亦远较后来为低，所费自不能与二三十年后比拟。而且我家尚未析产，私房纵有

存款，也绝难达到20万元之数。当时荣卿之上，尚有父叔三人无论在隆顺或隆聚，他均不能担任经理之职。凡此种种，杨文所云，皆属传闻失实，亦为讲掌故者之所忌。

就我所知，我家遇有丧事，老辈比中年以下者为隆重。甲午、乙未之后，老辈丧事有：煜光夫人（1898年）、士清夫人（1901年）、荣卿嗣母（1908年）、煜光（1909年）、颂清夫人（1912年）。析产以后，有宝廉（1916年）、世清（1922年）。诸丧均出大殓，但未闻有何特出之处。最后在1926年有世清夫人、翊清夫人及荫昌三丧。其中以翊清夫人丧事办得最为讲究，用钱也最多，可说在我家丧事中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之举。当时家中就有人说，“这次白事，要好好看看。以后丧事花钱再多，也不会采取这样的形式了。”但是全部丧葬费用尚不足五万元。在前此30年的1895年，简直无法想象，怎样才能把这20万元浪费掉！

出大殓是旧日天津富户的陋习。其兴衰起伏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如讲地方掌故，最好结合历史实际，实事求是，不离大格。当然，个人见闻纵广，也有一定局限性，正赖互相印证，以求一是，庶免给后人以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印象。一隅之见，尚望读者指正。

·以史鉴今·

## 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管理

——读宋则久和国货售品所有关史料

天津市工商联名誉主委 乔维熊

近日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所载几篇有关宋则久的史料和《天津国货售品所（总务部公布留底）摘录》一文后，颇有感受和启发，我认为这是值得企业家和企管人员一读的史料，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

宋则久先生是天津国货售品所（即今和平路中华百货售品所的前身）的创始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他的业绩早已为工商界所熟知。早在六十年代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就刊登过有关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史料，以后天津市政协又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宋则久及国货售品所的史料，这些史料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历史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宋则久和国货售品所的资料也引起一些海外史学工作者的注意，日本学者林原文子女士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她曾专门写了《宋则久与天津提倡国货运动》的论文送我阅读，听取意见，后以日文出版，在海外发行。

对于宋则久和国货售品所的事迹，我除了从一些书刊上间接了解外，还曾多次听宋则久的外甥、我的老同事李志道和当年国货售品所的几位副经理、我的老朋友吉玉如、傅景韩、赵孟然等人讲过，因此印象颇深。值得一提的是赵孟然先生，解

放后虽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为了收集和撰写宋则久及国货售品所的有关史料，他不计较身居临建之苦，多次自费发信给在北京、济南、西安等地的友人，广泛征集资料。他曾表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意义重大，是我们老年人热爱祖国、报效四化的良好机会和渠道，我们老年人士要响应“抢救”主动“抢交”史料。他在重病缠身时，还夜以继日地整理撰写，并告诉家人不许乱动他桌上的资料，以免遗失，同时委托他人继续完成撰写工作。他这种对史料的责任感，给我印象很深，更增加了我对宋则久及国货售品所史料的重视和兴趣。以前所发表的有关史料虽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但近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新发表的史料，我认为又有两方面新的补充：

第一，从宋则久的实业活动和生平轶事中，使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

纵观宋则久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具备以下四点：

1、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不少中外经济学家都认为企业家的精神就是在业务经营上的创新精神，否则不能成为企业家，更成不了优秀的企业家。宋则久的一生就是不断创新的一生。他出身于天津一个小钱庄商人家庭，只受过私塾教育，从一个布庄学徒经过磨炼，而成为天津当时屈指可数的大绸缎庄经理。但他并未满足，在当时“新政”潮流影响下，抱着振兴实业、谋求国家富强的事业心，跟着当时北方实业巨子周学熙，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宋则久担任了工商研究会会长，聚集人才，调查行情，改良产品。他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使之成为辛亥革命前天津民族工业的一个典型。之后，他又创办了十三个织布工厂，产品远销东北、



西北各省，成为与进口洋布竞争的有力对手，引起日本商人的注视。此后他又创办国货售品公司，提倡国货，兴办实业，同时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了许多努力。他“实业救国”的决心始终不渝。他还为自己刻了“不息则久”的石章，鞭策自己时时振奋，不断以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振兴实业。这种精神实在是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2、企业家必须不怕困难，不畏压力，敢担风险，百折不回。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中，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在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困难面前，敢担竞争风险，把压力当作动力，把困难变为成功的条件，百折不回，永往直前。宋则久也不例外。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列强对我国虎视眈眈之际，国内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加之治安紊乱，兴办实业谈何容易！但宋则久所以能不畏艰辛，排除重重障碍，集资办厂，是因为他有热爱祖国、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思想和实现“实业救国”的志向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因此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成为爱国工商界的一面旗帜。以后尽管宋则久屡遭打击和迫害，国货售品所几易其名，在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打击下国货售品所已奄奄一息，但宋则久并未退缩，而是费尽心血，绞尽脑汁，终于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险境，以八十一岁的高龄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宋则久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慨地说：“感谢中国共产党，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一定大有希望！”

3、企业家必须善于捕捉时机，果敢决策，知人善用，具备经营管理的才能。综观宋则久的一生和国货售品所的发展，在几次面临巨大风险的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除了宋则久具有强烈的“实业救国”的事业心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他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善于捕捉机遇，谨慎而又果断地决策，及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谋求企业的生存和继续发展。这在很多记述宋则久的史料里都有所反映。宋则久知人善用，把几个志同道合的副理，根据每人的人品、才能、学识和经历，分配在各个重要岗位，有职有责，分工合作，团结得如同一个人一样。这是使国货售品所能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各种旧势力逞狂的旧中国，得以生存并逐步扩大发展四十年之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优秀企业家还必须具备为国家、集体和社会献身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宋则久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教会的基督教信徒，同时又是一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他在将全部精力用于经营企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如办学校，开工厂，办各种慈善事业，提倡新风尚等，受到当时工商、宗教、新闻、知识各界的好评。这种献身精神，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家来说，就是要在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提倡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为国家、集体和社会多做贡献的献身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努力做出贡献。反之，如果一个企业负责人没有奉献精神，庸庸碌碌、鼠目寸光，孜孜于个人名利的追逐，甚至以权谋私，最后必然导致企业亏损，个人身败名裂。既害了国家、企业，也毁了自己。历史是面镜子，必须引以为戒，时时警惕。

第二，从《天津国货售品所〈总务部公布留底〉摘录》一文中，使我们看到近代我国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迄今仍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我认为大致有五个方面值得借

鉴：

1、企业的组织机构。研究中外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首先是从企业的体制和组织机构入手。国货售品所虽是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所办的私营民族企业，而不是国营或集体企业，但从史料看，它的组织机构仍有值得借鉴之处。国货售品所的组织精炼，办事效率很高，它的创始人宋则久，无论从哪方面讲，在国货售品所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但他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因此深得同仁爱戴，这样在企业遇到困难时，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即使同仁蒙冤坐牢也无怨言。这在史料中有所反映。作为企业领导人，宋则久的品质是值得学习的。

宋则久是虔诚的基督徒，从史料看，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华百货售品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中，有两位是基督教会牧师，即王馨斋和康德馨。这反映了该企业在发展中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出宋则久把基督教为社会服务的教义作为企业的精神支柱，维护企业发展。

另外宋则久在用人上是严格物色，精心培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决不迁就和滥用。例如在1945年4月公布的《本所首领人制度之说明》中，说明经、副理名额安排、分工负责、会议制度及制度的长远意义。比如“经理额设二人，防偏谬也；遇事皆须经过经副理会议，避免独裁也”等等，足见宋则久用心良苦。从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因人设事，滥用私人，而是因事用人。这与一般企业那种职责不清、无人真正负责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史料提供的《董监经副理到达各分所分庄待遇规定》，对路费、吃饭、住宿、坐车都有明确规定，严格掌握，公私分明，针对今日我们一些企业滥用公款，

贪图享受，谋取私利，吃喝成风等腐败现象，尤足借鉴。

2、企业的规章制度。一个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健全。俗话说，“国有国法，铺有铺规。”没有制度，企业就不能正常运行。从发表的国货售品所有关规章制度来看，可以看出这家私营企业的制度有以下四个特点，即“全、细、小、严”。

①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国货售品所的规章制度相当齐全完备，既有企业中上至董、监事与经、副理，下至职员、学徒、伙友全体同仁的分工制度和办事细则（参阅该资料1926年12月20日公布的《正副经理负责人办事细则》和1931年1月19日公布的《同仁须知》），同时又有各业务部门、门市部和分所的管理规则，诸如会计（账桌）、稽核、文牍、广告、批发、零售、货房、外栈、杂活等等都有具体规则。（参阅该资料1930年6月30日《门市部管理规则》、7月5日《庶务规则》；1931年1月6日《办事必读》，1月19日《总发货人须知》，1月9日《照料人须知》；1934年3月17日《分所章程》等）

②细。即制度非常细致周详，尤其表现在人事管理制度上，除同仁进退升迁、人事调动、人员培训、工作管理外，还包括职工的生活、穿衣、吃饭、就寝、起床、请假、骑车、学习各个方面，可以说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参阅该资料1927年11月25日《职工对调办法》，1929年6月10日和1942年3月7日《关于穿制服的规定》，1929年8月29日《关于成立四育会规定》等）

③小。企业中很多琐碎细小的事情，也在制度中加以明确规定。如1931年1月19日公布的清理废物办法；1927年11月13日和1931年6月10日两次规定的公共报纸管理办法；1929年7

月15日公布的公共信纸使用办法等等，都是一些小事情方面的规章制度，此外象洗涤私人衣物、食用商品糖果、电灯管理等，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如果不管，照样会使企业开支浪费，坐吃山空。现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浪费纸张、水电，拿吃商品糖果等已经司空见惯，“企业有什么，职工家里有什么”，“世界上有个加拿大，我们来个‘大家拿’”，这种公私不分、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的风气在一些企业中已屡见不鲜，不但影响了企业的效益，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样下去企业必定会亏损甚至濒临破产倒闭。国货售品所这种“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管理办法，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这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④严。企业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执行起来同样要严格认真，国货售品所的资料中反映出他们在这方面是如何严格按制度办事的。如1929年11月11日公布的一则记过处分布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资料中还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国货售品所当年的确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前面提到的那则处分公告，被处罚的傅景韩是当时国货售品所负责人之一，他违反规定照样受到处罚，真正体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作法，就因为如此，国货售品所的规章制度才能得到职工的自觉遵守和认真贯彻执行，从而维护了企业的正常秩序。反之，如果企业没有规章制度，或订了制度也不认真执行，有法不依，或“刑不上大夫”，或“法不责众”，那么不管订多少规章制度也无济于事！行笔至此，不胜感慨。

3、企业的人事管理。搞好一个企业，有一整套良好的人事管理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作为企业经营者，必须善于协调和

驾驭企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宋则久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作法，从公布的资料看，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①公开职工任用。宋则久在人事管理上既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戒律，如不用私人，特别是不用“三爷”（即少爷、舅爷、姑爷），同时又创建了“轻人情，重学业，藉课堂知识以造就有用人才”的公开招考学徒规则。旧式商店招收学徒全靠人情举荐，1929年宋则久担任敦庆隆经理后，打破了门第观念，提倡学校教育，大胆提出公开招收学徒办法，而且沿用十年，收效甚大。他创办国货售品所后规定：投考资格为初中毕业或有同等学力，年满十五岁以上，不限家世，以方出校者为合格。考试内容分作文、外语、珠算、口试、体检等八项，考试合格者即予录用（参阅本资料1938年7月14日条款）。

②注意职工培训。在公布的国货售品所的资料中，有很多地方反映了这方面的制度和办法。如1929年8月31日、1930年7月5日、1939年9月18日等公布的条例中对培养职工的品德、人格、精神修养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在业务培训方面，也有一些要求，如1930年12月21日、1933年3月16日等公布的条例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③奖罚严明。从发表的史料看，国货售品所的人事管理特点之一就是奖罚严明，养成职工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从而保证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如1927年7月8日一个学徒赴钱铺归款，私自中途他往闲逛，以玩忽公务，当即被辞。此外象1928年2月23日、1929年7月5日、10月16日、1932年11月27日等日的公告，都反映出国货售品所奖罚严明的管理制度，很有现实意义。

④关心职工生活。这是国货售品所在人事管理方面另一个

显著的特点。国货售品所创办之初，职工待遇较低，后业务好转，职工生活逐步得到改善，除吃饭、穿衣得到改善外，在文化娱乐、个人卫生、休假疗养等方面也都有很大提高，并规定了职工的生活补助和退养金、抚恤金等待遇制度。这在当时旧社会对职工福利待遇能考虑得如此具体细微，实属难能可贵。宋则久对职工一视同仁，职工也因此爱店如家，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共谋售品所的发展。这些在发表的史料中有许多处可以说明，本文不一一列举。现在不少人反映，我国经济生产问题，不是由于技术落后，而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够完善，换言之，主要是人的管理问题。国内外许多成功的企业证明，在人事管理上有一条原则，即“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方，做合适的工作，给予合适的报酬。”一句话：使人尽其才。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往往忽视了细微的思想政治工作及适当的业务安排等等，特别是如何关心职工生活，使之“爱厂如家”，对照国货售品所的经验，确有不少值得吸取和深思之处。

4、企业的财务管理。企业经营者必须注重效益，坚持走科技进步的道路，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千方百计地实现“少投入，多产出”这一总目标。这方面，国货售品所的经验有不少借鉴之处。如1928年3月28日公布的现金管理制度；如1928年6月29日公布的职工在本店买货规定；如1929年11月7日公布的利用纸篓中未破的大小纸盒打包的要求等等，都从细微之处对企业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减少开支等方面提出很好的具体要求，使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效益。

5、企业的市场竞争。企业经营者必须时刻注意市场需求的变化，信息灵通，出奇制胜，方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国货售品所当年能赢得良好的信誉，并能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大致具有两个特点：

①发挥广告和宣传的功效。如注意装璜，它在1929年10月30日的通知中说：“装璜亦广告之一种，关系营业进行。现订由十一月一日起，各部自行筹划，以美观省钱为主，每月变换一次，或繁或简，随时翻新，屋内外悬旗结彩等事，一同办理。”在1930年3月7日的通知中说：“货物与广告关系密切，以后如有新品或各种货物应广告示……万勿疏忽。”广告包括报纸广告、墙壁广告、游行广告和传单广告四种，并分别制定了具体办法。同年6月27日又公布了《门市部货物陈列规则》，提出陈列货物要“美观、安全、易拿”。类似这样的通知公告，在国货售品所公布的资料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②讲究服务态度。国货售品所在这方面规定也是非常细致的。如1929年4月8日通知售货人员：“楼下前后卖完了货，想着往楼上让一句‘请楼上看’。请各卖货人注意，如买主欲买咱楼上的货而不愿意上楼，即请将货拿到楼下。”1933年7月15日通知中说：“无论何方得罪买主，皆为本所之损失。”关于注意服务态度，热情待客等具体规定，还有很多，本篇不详细举例。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国货售品所三令五申讲究服务态度，迎合顾客心理，真是“把顾客当作股东，当作上宾。”与此同时，为了维护信誉，他们还非常注意货品质量，“不拿有毛病的货对付买主”。（见1927年8月2日公布）。通过这些措施，国货售品所不但在激烈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转”的市场竞争规律，而且抓住顾客心理，充分利用广告宣传，开拓市场，从而保证了该所四十



年兴盛不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阅读史料，对照我们今天一些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不是很有些值得虚心借鉴之处吗？

**总之，**《天津文史资料》第47辑所刊登的有关宋则久和国货售品所的史料，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不但弥补了已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对今天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值得企业领导者一读，同时也值得从事经济理论工作和关心企业改革的人一读。由此我也得到一些启发，如果我们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能把全国各地、各行业和著名企业及企业家的史料都“发掘”整理出来，加以编辑发行，以史鉴今，不是能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到更多的作用吗？温习历史，总结经验，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建国四十年来“一面倒”学习苏联的路我们已经走过了，“全盘西化”的路历史已证明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只有在总结自己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按照中国现有的国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 46—50辑总目录

辑数·页数	题目	作者
-------	----	----

### 民国史资料

- |        |                    |      |
|--------|--------------------|------|
| 46—99  | 回忆在国民党空军的战斗历程····· | 高文庆  |
| 46—123 | 印度兰姆伽美军训练中心概况····· | 王伯璘  |
| 46—131 | 我在卡拉奇的受训生活·····    | 梁 深  |
| 46—138 | 我驾机起义的前前后后·····    | 岳哲安  |
| 47—1   | 铁衣曾照古中原·····       | 李汉魂  |
|        | ——抗日战争回忆之一         |      |
| 48—1   | 铁衣曾照古中原·····       | 李汉魂  |
|        | ——抗日战争回忆之二         |      |
| 49—1   | 张之江回忆录·····        | 张之江  |
| 49—21  | 张之江的一生·····        | 庞玉森  |
| 50—79  | 回忆南口战役·····        | 刘翼飞  |
| 50—90  | 河南战役·····          | 刘翼飞  |
| 50—104 | 滦东战役逸事·····        | 林宪祖等 |
| 50—115 | 蒋桂战争中的冯玉祥·····     | 黄建平  |

### 工商经济史料

- |        |              |     |
|--------|--------------|-----|
| 46—175 | 天津木商业概况····· | 施子厚 |
|--------|--------------|-----|

- 46—192 天津的木商业琐谈……………张云华
- 46—199 我所知道的天津几家木商号……………杜振华
- 46—205 德和木号的兴衰史……………王植如
- 
- 47—39 辛亥革命前后宋则久的实业活动……………宋美云
- 47—45 宋则久轶事……………宋廷璋 刘炎臣
- 47—61 李景林勒索宋则久始末……………宋廷璋 刘炎臣
- 47—66 天津国货售品所《总务部公布留底》摘录……………
- 
- 48—44 河北省银行史实记略……………姚博岩
- 48—52 我在河北省银行的见闻……………沈日新
- 48—57 中国通商银行简史……………刘嘉琛
- 48—72 交通银行发展概述……………刘嘉琛
- 48—79 天津私营银行社会主义改造概述……………刘续亨等
- 
- 49—53 天津纺织品批发业的兴衰……………高孝伯等
- 49—70 解放前天津大纱布庄概述……………李焕章等
- 49—81 天津谦祥益概述……………宋广林
- 
- 50—122 天津羊圈业始末……………穆静荪
- 50—128 敌伪时期天津的屠宰场……………刘家才
- 50—134 天津牛奶业发展述略……………李若愚 曹梅村等
- 50—139 天津的牲畜集市交易一瞥……………王受朋

### 文化教育史料

- 46—1 我在光华书局时与鲁迅的交往……………沈 涛

- 46—8 三十年代我和郭沫若的交往.....沈 涛
- 46—27 抗战前天津文艺界杂忆.....吴云心
- 46—45 回忆天津知识书店.....叶笃庄
- 46—53 知识书店往事回忆.....杨大辛
- 
- 46—18 记天津革命诗人黄白莹.....肖义芳
- 47—124 八十自述.....吴云心
- 47—144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袁 静
- 47—156 我的创作生涯.....何 迟
- 47—185 笔耕生活漫录.....阿 凤
- 
- 46—64 1944年赴大理考察记.....郑天挺
- 
- 48—162 京剧耆宿尚和玉生平轶事.....张宝年
- 48—168 回忆我的戏剧生活.....杨慕兰
- 48—181 从艺生涯自叙.....张世麟
- 
- 49—41 张之江与中国武术.....庞玉森
- 49—95 津沽画家传略.....刘芷清
- 49—118 我与版画.....杨 元
- 49—128 赵元礼生平事略.....刘炎臣
- 49—137 书法家吴玉如的一生.....吴同宾
- 49—148 忆天津音乐家杨芝华先生.....陈嘉瑞
- 49—162 广东音乐在天津.....陈嘉瑞
- 
- 48—98 投身护理事业六十年的回顾.....余韫珠

- 48—113 愿将毕生献给护理事业.....陈路得  
48—137 天津市护理教育沿革.....袁艺菊 贾怀珍  
48—156 天津市护理学会概述.....王桂英

### 城市建设史料

- 46—147 天津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演变.....朱建斌  
46—160 天津市道路发展小史.....张雅亭  
  
50— 1 引滦入津工程建设记实.....陈培烈  
50—33 根治海河十四春.....董一林 王克非

- 50—50 我所知道的道清铁路.....张冲霄  
50—73 应尚才与粤汉路 4—8—4 型机车.....应建之

### 宗教史料

- 50—143 天津基督教联合会概述.....霍培修  
50—158 回忆天津的联青社.....杨肖彭

### 社会杂相史料

- 46—214 满族官宦人家的旧礼俗.....张寿嵩  
46—234 解放前天津吃红白饭的.....杨绍周  
  
47—204 天津“鼓楼东姚家”轶事.....姚惜云  
47—243 天津解放前乡祠卞家述略.....卞迟叟

### 质疑·订正·补充

47—257 对《回忆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一文的补正……………王家琦

48—206 对涉及溥仪生平之三篇文章的若干考证

和补正……………王庆祥

50—169 对《原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

部分史实订正……………徐宗尧

50—179 关于天津出大殡的陋习……………迟 叟

### 以史鉴今

50—181 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经营管理……………乔维熊

### 小资料

天津《商报》(46—44) 解放前天津连环画市场的演变(46—63)  
天津海风社(46—98) 我与天津勤华墨水厂(46—198)  
解放前的天津化妆品业(46—213)

文信书局小记(47—65) 卞氏小学之创办(47—155) 师恩难忘(47—184)  
戴愚盒轶事(47—203)

北洋海军医学院沧桑(48—161) 多才多艺的演员——张健声(48—180)

忆张幼宸先生(49—69) 天津著名画家张城事略(49—127)  
赵元礼谈养生之道(49—136) 张和庵作画(49—172)

金溪河大桥修复记(50—49) 津门名刹大佛寺(50—157)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

作者 =

页数 = 1 9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